

社會主義者

2009年 第2期

Socialist

Summer Issue, 2009



“要有耐心和勇气，我们还要活下去，我们还要经历惊天动地的事呢……”

——“红色的”罗莎·卢森堡(1871-1919)

目录 Index

社评 Editorial

1 虚张声势的20国峰会协议

政治经济 Politics & Economy

2 经济危机之下中国会比美国更糟糕吗？

6 目击经济危机下中国东部沿海

9 “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

理论研讨 Theory & Study

12 如何应对经济危机？

18 “富人政治”与“阶级民主”

历史回顾 History & Review

20 纪念卢森堡与李卜克内西遇难 90 周年

26 李大钊：现代青年活动的方向

工人斗争 Workers & Struggle

28 透视保定一棉(依棉)工人护厂抗争

三农问题 Rural Society

34 经济危机、农民工和农村

国际纵览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36 法属瓜德罗普岛总罢工胜利结束

平等权利 Equality and Rights

38 三八节，女大学生访谈

41 美国：为反对第8项修正案而斗争

电影影评 Film Review

43 《贫民窟里的百万富翁》

我们的立场 What We Stand For



2009 年 4 月 2 日，G20 国峰会在英国伦敦召开，与会各国通过 11000 亿美元的空头方案，场外合计约有 20 万群众走上街头抗议资本主义制度。



2009 年 3 月-4 月，河北保定市依棉集团上万工人因企业改制和公司遣散工人罢工长达 10 天，2000 多人集体步行“旅游”上访；当局出动上千警力遣返工人，停止集团管理层职务，目前罢工仍在继续中（详情见 28 页）



2009 年 3 月海南省东方市感城镇发生青年骚乱和村庄冲突，2000 多群众卷入，1 人死亡，数十人伤亡，财产损失数百万，当局出动 1000 多武装警察强行镇压。



虚张声势的 20 国峰会协议

——强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以更为自由的“市场”方案来应对处于危机中的国家

在简短的 20 国峰会于 4 月 2 日在伦敦结束，各国在会议上针对未来金融业的管理达成一系列新的承诺和声明。除此以外，各资本主义国家都承诺要协调他们应对危机的战略并避免走向贸易保护主义。在去年 11 月的上一届 20 国峰会上各国也曾作出类似的许诺，但之后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显示在 20 个国家中有 17 个国家实行了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以保护本国经济。

事实上资本主义国家在会议做出的许诺往往是不可做数的而且也不可避免地包含有许多保留内容，自然本届伦敦的 20 国峰会也不例外。《金融时报》20 国峰会的闭幕公报分析后得出的结论是“虚张声势中隐含着巨大的分歧”。如同往常一样，它不过是将众多旧的方案和项目改头换面后重新隆重推出，当然同时也少不了提供一些含糊其词的空头许诺。“当将所有的方案金额累计起来可以达到 11,000 千亿美元，但真正新的承诺不到 1,000 亿美元；其余的是过去早就准备好的，与 20 国峰会并无什么关系。（《金融时报》4 月 3 日）

谁能真正从中获利？

11,000 亿美元中的 5,000 亿美元被用于贷款给近崩溃的国家以偿付他们到期的债务，这些款项将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进行处理；2,500 亿美元将用于增加出口信贷，另外还有 2,500 亿美元是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增发“特别提款权（SDR）”，另外还有 1,000 亿美元将用于帮助发展最贫穷的国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增加的资源将主要用于挽救银行和帮助最富有资本主义国家的出口。另外，参与峰会的 20 国自身可以以“特别提款权”的方式拿回 2,500 亿美元中的绝大部分，而正是这些最大的经济体控制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投票权。

英国援助组织“为贫困而战”（War On Want）的总裁约翰·希拉里指出，“由于 20 国峰会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当前危机的根源，数以百万计的人将为此付

出高昂的代价。20 国峰会决定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可动用的资金提高 3 倍，事实上是在帮助这个缺乏合法性的机构死而复生，可以使它继续用自由市场条件来残害那些向它求援的国家。”

20 国峰会的主持人英国首相戈登·布朗曾经在会议期间宣布，“华盛顿共识已经死了”。他希望通过这使我们相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新自由主义和金融资本的扩张已经到此结束了。但现实中，“华盛顿共识”是遭受到了沉重打击，但它并没有死亡。它仍然得以在参与峰会的 20 国集团和那些被迫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规定条件而求取借款的国家中借尸还魂。冰岛、拉脱维亚、匈牙利、罗马尼亚和其他国家最近都接受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紧急贷款，而为之付出的代价是大规模削减预算、冻结公共部门工人的工资、解除管制和限制支出。

处于悬崖边缘的欧洲

匈牙利预计新政府不久就将宣布新的大规模削减预算的方案——包括减少儿童和家庭津贴、减少养老金、降低政府给予国有铁路的补助等。一位罗马尼亚国家投资银行的代表说道，“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签定的协议是要付出代价的，这个代价就是‘节衣缩食’”。

中东欧国家以及土耳其这些被看作是处于转型期的欧洲国家，随着如山般的债务加重，危机也在继续深化。而且日益恶化的全球性危机表明目前所采取的措施并没能减缓资本主义危机的恶化。许多国家，甚至包括一些西方国家如爱尔兰，已经站在了崩溃的边缘，银行的信贷坏帐还在与日俱增。

由于担心有增无减的经济崩溃和社会动乱，迫使参与峰会的 20 国集团各国想法增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金量以制造出一种他们可以从容应对危机的假象。但是与此同时，危机正在恶化，贫困正在增加，全球资本主义离 1930 年代恶梦的大萧条只有咫尺之遥了。

《社会主义者》是你的杂志。我们真诚地希望朋友们能帮助我们杂志的发展与传播，提出你的宝贵意见，提供相关工人斗争、失业问题、官员腐败、环境保护和青年生活等各方面的信息。愿我们与社会主义理想一起成长。

《社会主义者》杂志社 Email: shehuizhuyizhe@gmail.com

中国劳工论坛 (www.chinaworker.info): cw.china@gmail.com

经济危机之下中国会比美国更糟糕吗？

任 平



世界资本主义正经历着80年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而中国也受创甚重；大规模的失业、国际贸易的崩溃和地产价格的下降。以下为《社会主义者》杂志的任平对马克思主义网站中国劳工论坛 (www.chinaworker.info) 的政治编辑文森特·科洛 (Vincent Kolo) 进行专访：

中国经济的衰退会有多糟糕？

非常可怕！全国将近有 3000 万农民工失业。具体倒闭和停产的厂家数字并不清楚，但仅仅从 08 年 10 月-12 月，广东省就有超过 2 万家企业关闭。还没有其他大的经济体经历过如此突然的衰退。因为中国更大而且拥有多得多的贫困人口，所以从很多方面而言，中国的经济危机比美国更糟糕。事实上在 2008 年最后一个季度，真实经济增长率从 1 年前的 10% 下降到了 0。因此，无论官方统计数字如何表述，中国事实上已经陷入了经济衰退。也许由于经济刺激方案的实施，可能在今年稍后某个时期出现一定程度的恢复，但这并不意味着会回复到过去十年间所有过的迅速经济增长。当时由于全球经济的发展而带来的高速增长已经彻底成为历史。这也是为什么一些经济学家预测中国的经济衰退会呈现“W 字型衰退”，即在 09 年下半年经济有所恢复，然后在 2010 年又陷入衰退之中，到那时全球经济将一团糟。

许多国际机构预测中国 2009 年 GDP 增长在 5%-7% 之间，甚至总理温家宝最近也提到中国今年可能无法达成 8% 的增长目标。他说，“目标并不意味着一切”。而这一在人大会议期间的阐述在被翻译成外语时有意给忽略了。中国的命运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和世界性经济恢复紧密相连，但世界性经济复苏少还需要二年之久，而且即使出现经济复苏也是新的严重衰退后出现的非常软弱和动摇的经济复苏。在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制度面临着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债务、生产能力过剩和利润率的崩溃——所有这些现象早已为马克思所警告。因此，当不少人仍然认为这个危机将是一场短期危机，在很短时间内就会云开雾散回复到‘常态’，我们绝对不会这样认为。我们认为，除非劳苦大众能成功地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和市场独裁体系，并建立一个基于全面就业和民主计划控制的社会主义社会，否则今天所见到的一切——才会是从此开始的‘常态’。

为什么中国受创如此严重？

首先原因在于贸易崩溃。WTO 预计今年全球贸易衰退 10%。今天中国的出口占全国 GDP 的 40%，而国内消费只占 37%，而且这一不平衡一年胜于一年。换言之，中国领导人们把他们所有的鸡蛋放到一个篮子中，——国际贸易的篮子中。现在出口以相当于年 25% 的速度正迅速下落——这会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并且由此产生的“北京危机”与纽约或华盛顿的后果一样严重。中共领导人试图将指责转向美国以逃避自己的过错。但是他们是超级全球主义者——他们的发展模式导致中国经济的现在开放程度甚至要远胜于如日本、台湾和南韩等国在目前这一经济阶段开放的模式。

而且不仅是国际贸易使中国经济遭受重创。同样包括资本的逃离——‘热钱’——大量涌入中国的资本都是下注于人民币的升值，并且往往流入投机特别严重的地产行业。尽管政府对资本进行严格的控制，但大量的‘热钱’仍然在迅速逃离。而且 2009 年迄今的海外投资与同期相比也只有四分之一。预计 2008 年最后 3 个月逃离中国的资金有 1 万 6 千 4 百亿人民币 (约合美元 2400 亿)。这些钱主要是来自于香港和台湾的资金，但也有部分是中国大陆的资本，大量流入他们认为相对安全的货币如日圆和美元等。政府能做什么呢？它只是宣布新的投资监管规则以便使外国投资变得更容易。在新的规则下，几乎九成 [来自于海外资本家的] 申请案例不需要北京的审批，地方政府可以直接作出决定。这些政策——虽然表面上可以对抗危机——但也正在增加地方政府的经济实力并使各地经济趋向不同的方向。北京在去年连续三次提高出口退税，在今年 4 月达到了惊人的 15%。政府想尽办法挽救私营部门。退税的金额相当于政府花在健康和教育费用的总和，而其中一半流向了外国公司。我们社会主义者认为“应该国有化而不是补贴——这些公司应该由工人阶级接管重组后成为民主的计划生产的一个部分以满足人们的需求。

房地产市场在中国的经济中扮演怎样的角色？

地产泡沫已经开始破裂，这对于经济方面又是额外的打击。这一情况所类似于在日本、美国和其他的国家所发生的。虽然中国仍然处在早期阶段。但北京和上海等城市住宅价格下跌 20%-25%。这一下降的幅度其实和许多美国城市的情况一样糟糕。今年银行给房地产市场注入新的信贷资金可能会使地产市场的危机有所减缓。最近的数据显示销售有所攀升，但价格并没有随着上扬。许多城市的价格仍然远低于他们在 2007 年的房地产价格，所以假如一旦信贷枯竭，地产市场可能会迎来新一轮的下跌。

全球范围内我们看见由信贷所驱动的金融泡沫的崩溃，但中国有它自己的泡沫——巨大而不受控制的信贷扩张。在中国借的银行已经失去控制长达数十年之久，而且其中庞大数额的“类似次级贷款”的项目将永远无法还款。如果坏帐充分暴露，银行也将不得不接受政府的援助，这就如同 1990 年代所发生的状况，只是这次情况可能更糟糕。而且由于技术层面而言，通缩[价格下跌]已经到来。而如果一旦确认这变为长期通缩后，就意味着会增加企业偿还贷款的成本而使它们丧失利润，并最终演变成为一场价格战。因此正在中国所发生的情况非常类似于其他地方已经发生的：救助银行和其他部门意味着将不断提升政府债务，然后当到达某一转折点时，政府无法继续获取借款的时候，他们就会攻击工人阶级和其他底层人民的利益以企图达成所谓“预算平衡”。这是我们在日本已经见到的，而且奥巴马政府已经准备挥舞大刀削减社会预算。中国政府尤其不愿意增加财政赤字，因为对于通货膨胀历史性的恐惧，特别是由此引起的 1949 年和 1989 年的社会巨变。所以，虽然他们现在更担心通缩和需求消失，但对当局而言对于通货膨胀也有本能的恐惧。

确实如此，在中国购屋者多使用他们自己储蓄付房款，这就减缓了因地产价格下降而给银行带来的影响，但是这也只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作用。但许多银行的贷款仍然与地产紧密联系，即使这贷款本身不合法也是如此；因为地产投机所获远远高过制衣或电子厂。而且许多贷款还借贷给建筑繁荣行业——工厂、道路和发电厂等等——这些行业已呈现泡沫经济的特性。我们应该牢记 1870 年代的第一场世界性‘经济大萧条’就是始于美国铁路投资泡沫。即使最终的生产型投资也会转变为金融投机——因为这在资本主义是不可避免的。美国 140 年前的铁路泡沫与中国 21 世纪年代的庞大投资泡沫相实在是在中是一个脚注。

社会主义者的解决方案会是将转移所有‘多余的’工厂全部转化为全民所有权，重新组织起来将他们纳入一个整体的经济计划。所有的大公司和银行都应该由工人和群众民主控制，不再需要所谓的“干部”指手画脚。而资本主义的方案是——我们正在现在在中国见到的一

——它们会摧毁过剩生产能力，关闭成千上万的工厂和使数以百万计的人失去就业机会。

中国可以推进国内消费以弥补出口下降？

他们[政府]对此老生常谈达数年之久，一直说要‘再平衡’经济，但是什么也没真正发生过。而相反过度出口和有限国内市场的之间只是进一步在扩大。你不需要聪明过人就能想出为什么：中国人作为主要经济的驱动却没有多少真正大消费能力。这即使中共方面的构想通过经济政策来确保为世界资本主义提供廉价的劳动力平台。今天，消费正在衰弱，因为受到经济危机的打击而导致削减工资和冻结工资增长。农民工的收入比去年每月下降了 100 元甚至更多。而中央政府也冻结了最低工资。

在数年相对收入下降之后，所有的工人都遭到的严重的收入减少。工资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从 1998 年的 53% 小降到了 2007 年的 41%。类似工资下降的趋势在全球范围内普遍存在——而这也正是新自由主义政策的一个基本特征——但哪里都没有中国下降地这么明显。考虑到这些数据，哪里可能有钱用于进一步增加消费？

新的刺激措施将无法改变这一趋势。主要经济刺激方案仍然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以帮助大公司。我们支持赶上基础设施，但问题在于腐败、缺乏管理和地区竞争，只要有新项目上马必然导致大量的浪费和重复生产。也许会增加一部分“非常规的”临时工作机会，但这些工作必然如同奴役一样尽可能趋势寻找更便宜的临时的劳动力，因为全职的员工更难以解除合同，他们相对有一定的权利。

政府的经济刺激方案是否能避免经济危机？

对经济刺激方案最大的考验是他们能在多大程度上创造就的就业机会。通过经济刺激措施，一些工作岗位会产生，但绝对无法到达所预期的规模。即使经济每年以 10% 的速度增长时，也只能带来 1% 的就业增长。而如今经济增长将降不到一半乃至更低，由此可以想见失业率会出现爆炸性增长，而这个情况已经正在发生。所以经济刺激方案只能非常有限地缓解问题。

在 4 万亿人民币的经济刺激方案中，中央政府要求银行尽可能多提供信贷看起来似乎能够刺激经济。但我们需要透过表面现象看实际发生的情况。第一，许多新的贷款，大约三分之一，被投入到股票市场进行投机。这充分说明了这些国有大公司的高管们作为寄生虫的投机本性，因为他们是主要的额外信贷的接收方。

第二点，许多国有企业在目前状况下并不需要新的‘刺激’贷款。这是很关键的一点，他们已经拥有大量的现金——现在企业存款大约等于居民存款，也就是 GDP 的 23-24%。相对于国际标准而言，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高；因为很多外国公司都几乎被债务埋过了他

们的脖子。尽管具有如此众多的资本储备这些国有公司，主要是钢铁、建筑材料、汽车等大型工业行业，仍然在缩小投资规模。首先是因为需求的减少，其次在于利润的下降。所以即使释放更多的信贷，政府也很难实际解决任何问题。这就好比田径赛时使用违禁药品——你可以得到短期内的出色表现，但长期而言对身体极其有害。

而且目前的释放信贷和基础建设这一切都以一种非常无效率和腐败的方式进行着——没有辩论或者讨论哪里或者哪些新的项目计划是真正需要的。也缺乏对于环境问题一个长期和综合的考量。因为危机和投资下降，原有的环保标准也被置之不理。批准新建设项目的从 5 天下降到了 2 天，而这不得不以牺牲安全标准和环境为代价。由于经济刺激方案中每 4 元人民币的投入有 3 元需要来自地方政府和公司，所以各省都倾向于使用他们自己的公司和商业集团进行健身，而丝毫不从整个国家的层面进行考虑这是否有益于整个社会和工人阶级的发展。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银行的实际状况和政府的财政收支比官方公布数据的情况糟糕得多。中国将发生大规模的公共债务的增加。中央政府今年的财政赤字预算是 9500 亿人民币，而去年的赤字不过是 1800 亿人民币。虽然目前广泛引用的数字说中国的公共债务不过是 GDP 的 18%，但假如将所有隐形债务包含在内，这一数字可能达到 GDP 的 65%。这就将和法国和德国处在接近的水平线上，而远超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建议的 50% 上限。我并不支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观点，我认为中国真实的债务状况远比官方数据糟糕，甚至可能超出我们的预想。另外，为了配合经济刺激方案需要投入大量资金，但地方政府已经不再能够轻易地依靠出售土地而获取资金，从而第一次出现官方允许地方政府在资本市场销售债券来筹集资金。这就意味着中国将开始出现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我们看看美国今天所发生的一切就会知道结果如何。我们应该牢记在 1990 年代之时，当时的日本几乎没有政府债务，但经过了 5 次乃至 6 次庞大的经济刺激措施之后，日本政府今天为支付政府债务的利息就相当于税收收入的 65%。

中国的经济衰退对世界经济意味着什么？

这就像新倾覆的多米诺骨牌一样，一张非常巨大的多米诺骨牌。甚至仅在六个月前资本主义经济学家们还寄望中国、印度和俄国能拯救世界经济。现在俄国 2009 年经济可能出现 -5.6% 的衰退，而印度经济也已明显减速，而且中国将会比它们两个国家加起来带来更大的冲击。中国是世界最大的金属消费国和第二大石油消费国。因此，中国出口的崩溃将迅速影响世界原料市场，并导致如澳大利亚、智利和委内瑞拉等依赖能源或矿产出口的国家。

中国目前也带动整个亚洲经济的进一步恶化，给日本可能会带来长期严重的效应，因为今年日本的失业人数可能翻倍乃至达到 3 倍。日本自从它成为一个军事裁国家之后，还没有经历如此的戏剧性的出口和贸易下

降。这将导致整个亚洲的局势不稳定，并在未来数年内导致严重冲突，甚至可能是军事冲突。中国对亚洲的影响自 21 世纪初以来已经戏剧性地增加，并充分利用它的软权利——贸易和投资——赢得影响和联系。但随着危机的加深，这也会成为一把双刃剑。如同中国领导人可以把所有问题都指向美国进行指责，那么其他国家也可以进行民粹主义地对中国攻击而赢得国内的支持。今年稍早，印度禁止了中国玩具的进口。而且它在亚洲不是仅仅当然，在厄瓜多尔和那里的委内瑞拉已经出现抗议以反对中国对他们油田和其他矿产的控制。在澳大利亚，右翼的种族主义的亿万富豪莫道克与中共官方具有紧密联系的目前也出版了一个所谓“四月傻瓜”的故事指责中国商业集团企图买下墨尔本棒球场，一个当地著名的运动场所。这个编造的故事引发了一系列网络抗议以反对将“澳大利亚”资产出卖给中国。命”的涌起。

危机将会如何影响与美国的关系？

（中美关系）是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中最为重要的一组关系，而且也是最具有矛盾性的一组关系，我们在中国劳工论坛（chinaworker.info）上有文章进行专门这方面的解释。希拉里·克林顿[美国国务卿]曾在北京说过“美国和中国如今坐在同一条船上”，在某种意义上这是真实的。在一个层面上，他们之间是战略对手；但在另外一方面，因为他们之间的经济关系如此紧密，他们必须进行合作；但这是一种三心二意而互不信任的合作。克林顿对北京的访问任务主要为“促使中国继续购买美国国债”所支配；因为没有外来的资金，奥巴马就无法供给他巨大的 7800 亿美元的经济刺激方案，也无法策划来年的 1.5 万亿美元的赤字。中国如今已经成为了美国的银行，拥有 7274 亿美元（几乎是 5 万亿人民币）的美国国债。远超过居第二位日本 6260 亿美元。中国央行持有被称为‘代理证券’的美国房利美和房地美的 300 亿美元债券，而两房事实上已经由于地产泡沫崩溃了而靠美国政府勉力支撑。所以中国总共持有美国超过 1 万亿美元的政府支持的债券。这在中国国内也引起了哗然。政府怎么能继续向美国贷款而且回报率极低，国债在 2009 年头 2 个月的利率只有 1.6%，而与此同时政府在公共花费上却对待自己的国民吝啬之极。

在下一个阶段这将会成为最主要的战场。从北京方面的立场而言，它庞大的美元储备不再用来防止人民币汇率上升。因为在今天的形势下，如果北京放松通货控制，人民币汇率会下跌而非上升。中国的美元储备将更多成为向华盛顿施加压力的工具，以防止美国会出台伤害中国经济的政策。中国总理温家宝日前在国内清晰地表明了这一立场，要求美国领导人“保证中国资产的安全”。他反对奥巴马的凯恩斯主义公共支出计划会失去控制。这通常是银行界对一位新当选的政客的呼吁。但也正如最近的《华尔街日报》所指出的，温家宝并没有多少其他选择。日圆和欧元也许可作为部分储备货币挑战美元，但绝对无法取而代之。北京方面宁可和“已经有所了解的恶魔”华盛顿打交道，但两者间的关系会进一步恶化，尤其是假如北京方面企图削减其庞大的美元储备。假如美元的价值崩塌，这将彻底振荡整个全球金

融体系并开始新一轮金融危机。从这一点而言，目前北京方面没有太多的选择。当然这些情况并非如石头一样是僵化不变的。在某些情况下，有些“同船的伙伴”也许会被赶出由“克林顿国务卿所掌控的国际关系之船”。

而另一方面，目前的全球性经济危机可能使以中国为首的亚洲经济体作为区域经济增加其在世界经济的权重和力量，尽管目前它们在诸多方面正遭受着打击。假如工人阶级不能够起来在国际范围内推翻资本主义制度，那么经过一个阶段的经济大破坏后，那么新的全球平衡会重新浮现，这次可能会倾向东方。这一总的趋势

对于中国的精英们来说是欢欣鼓舞的。中国的资本、银行和企业将会大规模对外输出，相较于此中国目前所进行的海外投资只是处于初级阶段。这将进一步促使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对抗，而这次危机可能产生的这种辩证的观点已为历史背景所证实。如 1929 大萧条之后，美国实际上受危机打击的程度远比欧洲严重。但伟大的革命家托洛茨基就在 1933 年预见到，经过一段时间的紊乱，美国将会从危机中摆脱出来而变成全球资本市场的老大。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资本主义就会解决所有的问题而安静而无损害地得到发展；但它的全球经济霸权的地位将得到增加和稳固，并使它在国内和国外都处于更加爆炸性的矛盾场面。

文森特·科洛(Vincent Kolo)就中国未来工人斗争的展望

经济危机将给工人斗争和阶级觉悟的发展带来何种影响？



大变革即将到来，我们正在目击它的发生。中共的官方媒体和警察当局已为群众中日益增加的反对资本主义情绪所震惊，新毛派主义和其他社会主义思想正在赢得日益众多的支持者，同时另一方面即使自由主义民主派也提出“08 宪章”要求实现“真正的资本主义”。这会是一个崭新的阶段，许多旧有的思维方式和偏见将会被一扫而空。但是中国社会是一个极其复杂和阶层分化非常明显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事件的进程往往在不同的人群和阶层中充满种种矛盾。所以很难出现一个单一的或者统一的发展进程。但是之前的阶段，虽然群众对于深化的不平等和严重的镇压有诸多不满，但中共当局手中仍然有经济增长这张“王牌”，而今后这样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据统计 2008 年群体事件数量达到 12 万起，几乎是 2004 年的翻倍。政府有充足的理由担忧今年的状况和危机带来的效应。但进程本身绝对不是单一反而会充满矛盾。在过去的一年中在全国十个城市中出现了一连串的出租汽车司机罢运事件，这充分说明工人们正在互相学习和参照他人的经验。他们也提出了要建立他们自己组织的要求。这一思想在未来数年内会如海啸广为传播。保定依棉集团纺织工人罢工事件也是一个极端重要的例证。一些工人根据他们自身经历，在面对永无休止的私有化和难以记数被践踏的空头承诺之后，已经喊出了“全国总罢工！”的口号。

但是由于缺乏有组织的工人运动使得愤怒会失去控制，并可能导致暴力恐怖主义的发展。因为日益增长的底层穷苦百姓和青年人会自然地将这视为‘可行的答案’——对腐败统治者反击的手段。今天工人们通过跳楼和自焚的自杀方式表达他们绝望的抗议。从这种自我毁灭到开始针对个别的资本家或官员进行暴力攻击其实只有一步之遥。固然如今中共领导人一直为西藏和新疆所发生的暴力事件担忧；但参照这些少数民族的例子，完全会发生被压迫的汉族青年个人制造炸弹或攻击警察的事件。但我们认为（个人暴力恐怖主义）注定是一个会破产的策略。马克思主义者一贯反对恐怖主义，因为统治者只可能被群众运动所推翻。但是，如果工人被继续压制无法作为一个整体而发出自己的声音，如果他们的罢工一再被暴力粉碎，那么这种暴力恐怖袭击完全可能会转化为一种更为常见的现象。

中共的统治会受到威胁吗？当前的经济危机可能导致什么政治后果？

简短的会答就是“是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这将成为威胁其政治生命和执政权利的危机。在过去的历史上，这一政党曾经深深扎根于社会之中，作为一场重大革命的政治代表它曾带来过广泛的社会进步。但是最近，正是其自身开始攻击和侵蚀这些社会进步的要素，禁止任何有组织的反对力量结果使它维持政权的支柱只剩下确保经济快速增长。而全球经济危机已经在冰岛、拉脱维亚、比利时和匈牙利造成政府的倒台。当然中共绝不会如此容易就垮台，这不会是一个简单的一次性行为，而更可能是一个过程：危机的逐步加深和政治上日益失能，逐渐增多的内斗和分裂，中央政府和不同省份间的冲突，越来越多的政策上的左右摇摆。但是毫无疑问现在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一个前所未有的时期，当局已经有所感知而莫名恐惧。而对我们而言，关键性的问题是工人阶级的自我组织——工人作为一个具有自我阶级觉悟的阶级必须在下一阶段各种可能的事件中加诸他们的烙印，建立一个独立的劳工运动并以此为平台赢得其他被压迫阶层，如农民和少数民族群的支持。我们早已见证了诸多‘颜色革命’——让中共深感恐惧的一系列事件发生在乌克兰、格鲁吉亚、吉尔吉斯斯坦乃至菲律宾，它们都具有类似的特征。但问题在于这些群众运动最终的结果只是由另一翼的统治精英取代了另一翼的统治精英；由于他们仍然保留在资本主义框架内，所以没有根本性的群众的生活和所处状况。这种发展趋势在中国也是可能会发生的，但是如果工人阶级不能真正占据社会和政治真空并提供一条彻底变革的出路，那它不过是结束了精英们某一状态下的统治而开启了新的状态下一不同形态的统治，也许会是相同的统治精英具有更多的‘民主化’特色，也或许可能出现更为国家主义和军事主义的统治方式。固然存在着诸多不可避免的复杂性，但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有理由对未来保持乐观的态度，因为资本主义危机的出现为今后一代人乃至数代人提供进行独立工人斗争和组建独立工人组织的可能性，而这对于中国的未来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将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

政治经济 Politics and Economy



目击经济危机下中国东部沿海

陈勵志组稿

富裕变成了贫穷与困苦的源泉。——傅利叶

从 2009 年春节后,《社会主义者》杂志在东部沿海的香港、广东、浙江、上海、江苏和山东等地进行了随机性的粗浅调查。鉴于条件和能力的限制,我们所获得的事例和数据不能说具有全面的代表性,但它们都是来自于第一线的真实案例,本文所用图片都是本社人员拍摄所得。

走投无路的粤港经济圈

香港的大排档更火了,因为中环的白领们都不得不放弃西餐厅而到街边‘搵食’(找食物,吃饭)了。电讯盈科的千余外勤工人走上街头、机场的货运运输工人罢工抗议、安保公司的尼泊尔警卫静坐示威,在这座一个便当(盒饭)也要 30、50 港币的城市里,普通劳动者每月不过 7000 多港币收入。在经受了 1997 年金融危机以来长达 10 年的经济不振之后,这次经济危机给民生带来的打击已经不堪重负,愤怒而无助的香港人不得不走上街头。



香港的天蓝了,因为珠江三角洲成片的工厂“仆街”了。2008 年 1、2 月份合计中国全国工业用电量同比下降 10%,广东省 2 个月下降合计超过 20%。深圳盐田港 1 月份集装箱总运量下降达 10.57%;港内堆存的集装箱 80%是未曾装货的空箱。全国第三大机场——深圳机场的货运站,即使在过去一贯繁忙的工作日的上午如今也是空空荡荡。无论是广深公路还是深圳连接关内关外的道路都异乎寻常的通畅,原本要塞车 2、3 小时的道路现在 45 分钟内顺利到达。



深圳和东莞等地的房租已经在 08 年 11 月和 09 年 2 月降了 2 次，下降幅度达到 2、3 成；原本一个月房租 2000 元的小吃店，现如今房租降到了 1600 元左右，却还空在那里乏人问津；而因停工和倒闭空闲的厂房更是鳞次栉比；依靠房租为生的村委会和本地居民收入锐减 50、60%，他们一下发现原来“富足而无聊的包租公”生活一去不复返了。



深圳关外与成片的招租广告成鲜明对比的是廖廖无几的招工广告，前两年因为“民工荒”而“求工若渴”的工厂即使还开工招人的也挑剔异常：只要女孩子，好管理；只要 16-26 岁，能加班；只要初中毕业的，会学习；只要有经验的熟手，上手快，800 元最低工资，不干随你。

根据广东省官方的统计，春节后到 3 月份共有 1000 万农民工重返广东省，500 万以上没有工作；而全省直到 3 月底能提供的新增岗位不足 200 万，至少 300 万无业农民工滞留广东。而同时广东“九三”学社的知识分子给省政府的建言是，限制外地农民工，把就业机会留给粤北的本地工人。2009 年广东省有 33 万应届大学毕业生，而到目前为止签订就业协议的只有 3 万多人，不过 8% 的签约就业率是有统计以来最低的一次。



随着经济危机的发展，企业欠薪、停工和倒闭的现象继续发展，由此不仅带来的治安日趋恶化的问题，甚

至部分地区出现为了追偿欠款、税收，海关、警察乃至武警为争夺倒闭企业的资产而发生武装对峙的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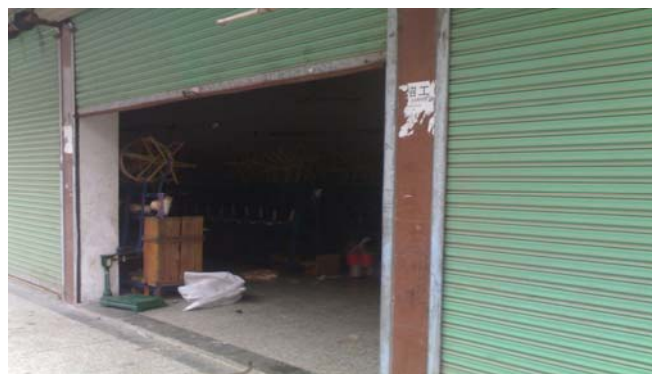
苟延残喘的长江三角洲

3 月 19 日，位于苏州的耐克直属工厂准备关闭工厂，但微薄的赔偿实在无法让工作了十几年的员工接受，所以发生工人罢工抗议。工人并与前来管制的警察发生暴力冲突，数人被警方拘留。前几年，相较与广东，长三角地区一贯自认为产业结构较完善、社会保障完善、治安状况安全、劳资冲突并不算激烈。但随着经济危机的逐步发展，自去年 11 月份上海闵行发生因裁员赔偿而导致工人与警察发生暴力冲突以来，类似的事件越来越多，“温情脉脉”的江南水乡也终于要“图穷匕现”了。

苏州号称一市的 GDP 等于西部 2、3 个省份的 GDP，是台资企业和高新电子企业的“半壁江山，但自年初以来，短短 2 个多月内，美国半导体、松下电子等约有 40 多家世界前 1000 强的外资电子企业关门停产，继富士康减产之后，昆山的仁宝电脑也已决定减产一半，许多去年通过每天加班 4 小时以上“血汗模式”能拿到收入近 2000 元的员工，如今由于开工不足，最高只能拿到 800 元左右的收入。据说由于大量在苏州打工的人员没有返回，整个苏州地区增加手机空号 120 万个。



号称“中国私营经济大本营”温州自去年第四季度以来，有近 20% 倒闭关门。根据浙江省工商局发布的《民企生存状况报告》，2008 年浙江省共有 2.2 万家登记在册的企业注销，为 6 年来最高；而这些都还是合法注册的成规模企业，浙江多如繁星的“作坊类”私企并不注册，故实际倒闭数字不低于此 10 倍。



作为长三角中心城市的上海，从 08 年下半年起工业产值和投资就开始双双下跌；众多跨国公司和财团纷纷撤离上海；英特尔关闭浦东的封装厂，美国应用材料公司裁员 2000 人；摩根斯丹利等投资商出手上海的放地产；根据万宝盛华 3 月份推出的雇佣前景调查显示，预计上海今年第二季度的雇佣指数是-4%。就连顶级办公楼的高级白领也已经开始习惯于带饭上班的日子。

进退维谷的环渤海经济圈

2 月，寒风中青岛，市委旁的街边花坛，一封一笔一划誊写工整的上访信，本一件简单的乡干部贪污腐化打击报复的举报。经过 6 年多的县、省、京的上访、截访、申诉、劳教，曾经家庭和亲风华正茂的乡村农机员，正如“北大孙东东叫兽科学推断”，他成了“99%”中的一个，一个妻离子散半癫狂的“上访疯子”；但不变的是还是那一笔一划誊写工整的上访信。



不远处就是市劳动职业介绍所，权充门面的招工看板上还在翻动着，但工作寥寥无几；相反在职业介绍所外沿街或站或坐着 2、300 名寻找散工的男女老少。有斜依着自行车，车前筐里搁一把粉刷的滚筒中年男子；有枯坐在地上面前放着一块写有“水电工和手机号”的老年人，也有胸前挂着一块纸板，寻找保姆工作的小姑娘。



2 月底召一次全省大学生招聘会，媒体上堂堂皇皇地 400 多企业到场，招聘岗位 5000 多。但据知情人透露，其中有近半数企业都是迫于地方政府压力前来“聊以充数的”，并不准备招聘任何新毕业生。而且政府经办人员也颇为明白，“你们来人在那里坐着就行，招不招，招多少都是企业自己的事。”



山东省 2008 年 GDP 居全国第二位，以青岛为首环渤黄海的半岛是主要的劳动力流入地区，而非半岛地区的山东其他地区则是劳动力流出地区。半岛地区以出口导向的电子产品、食品加工为主；而非半岛的地区则以资源型工业、煤炭、木材、电力和汽车制造等为主。山东省就宛如中国“候鸟式出口经济”的一个缩写。在这次经济危机中，与日韩经贸关系极其密切的半岛地区受创严重。日本出口剧降一半，众多世界知名企业停产减员；而韩元对美元的汇率下降近 30%，数百多韩国资本家无法继续经营又不愿面对裁员赔偿索性潜逃回国。



整体而言，中国东部地区受经济危机影响已经逐渐显现，甚至就连沿海省份出国合法和非法打工的工人回国人数也已开始大面积上升。随着全球经济危机的进一步恶化，与世界市场紧密相关的东部沿海地区恐怕苦难会更为深重。

“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

陈励志

“生产是否过剩，是经济繁荣还是危机的先行指标。”——K. 马克思《资本论》

3月“两会”期间，人大新闻发言人仍然放言，“中国不存在美国式的金融危机，也没有什么经济危机”。是的，“中国确实不存在美国式的金融危机”；因为中国的经济危机是“有中国特色的”生产过剩危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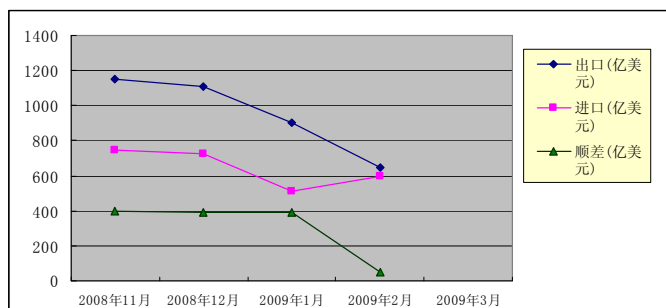
近30年来中国的经济高速增长很大程度都得益于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贸易，中国“出口依赖型”经济增长模式与美国“债务驱动型”经济模式的成为21世纪资本主义经济“完美匹配”双发动机。然而如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经济体（也就是中国出口的主要消费体）陷入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重重困难中，中国的经济又如何可能独善其身呢？

“处于拐点”的国际贸易

中国的国际贸易与国内消费市场的关联度不大，而与世界市场的需求密切相关；但由国际贸易所带来的顺差却与中国经济的整体关系密切。在过去数年来出口顺差一直占中国GDP的10%左右，而这一数字几乎等同于中国经济增长的份额；中国的经济和就业增长一直依赖于此。

中国的具有惊人的过剩生产能力，但这都是完全为配合西方经济体过度消费而存在的2008年，金融危机使全球金融资产挥发50万亿美元，仅亚洲近10万亿美元；美国到3月份超过1250万人失业，失业率达8.1%为26年来最高点。而国际市场的需求（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的衰弱，使原本依赖于廉价劳动力、牺牲民众福利、环境和政治权利的中国出口模式彻底崩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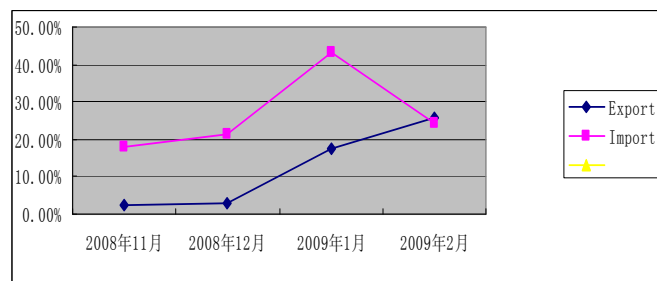
2008年11月-2009年02月进出口数据一览表



自08年11月出现7年来首次出口下降以来，4个月的进出口数据完全能反映相关问题。3个月内贸易顺差从从2008年11月创记录的450亿美元跌到2009年2月不过十分之一的48亿美元。中国经济增长的发动机——顺差——开始停转了。而目前进口下跌逐渐开始放缓，而出口承接进口前几个月的跌势呈现出的雪崩式反应；

未来数月内为促进投资和基础建设的刺激方案可能会使进口下调进一步放缓，使中国在今年出现许久未有的贸易逆差。2月份，对日本贸易出现8.6亿美元的逆差开始佐证这一点，中国需要从日本进口大量的计算机、机床和其他精密配件以确保工业体系的运转，而这一硬性需求的下降幅度相对有限。

2008年11月-2009年02月进出口同比下降表



等待爆炸的“失业黑洞”

中国的“失业率”永远如黑洞一般，无人确切知晓。人力资源部的城镇人口登记失业率2008年底的失业率是4.3%，社科院的调查失业率为9.4%；而人民大学人事学院教授所作的“访问失业率”高达24%；而我们估计真正的劳动力富余可能达到30%。只要你明白政府的城镇登记失业率中，不包括2亿多农民工，不包括600万当年大学毕业生，不包括千万下岗工人，也不包括任何男性年龄在50岁以上，女性年龄在40岁以上的城镇人口就明白其中奥秘了。中国各地的失业金只等于当地人均收入的20%左右，远低于欧美国家的福利标准；

而且这前提还必须要你在社保个人账户已经有足够的失业基金；数千万失业农民工由于户籍问题根本无法享受这一微薄的保障。

3 亿人面临就业问题,而且由于经济危机的发展,“营业越是清淡,要从已有的营业额取得的利润越大。开工时间越是短,要从这一时间中取得的剩余劳动时间越是多”,仍然生存的企业为在竞争中维持生存,只会进一步地压缩人力成本,尽可能少地使用工人,以维持更高的利润率(也是剩余价值率),为此只会造成失业人口进一步上升



根据社科院的调查,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失业人群已经呈现出“青年化、高学历、长期失业”的现象;很多城市都出现了长期失业的年轻人,有整日无所事事沉迷于网络游戏者,有因衣食不着铤而走险进行犯罪的,也有因为求职不成而精神失常的。而随着经济繁荣和技术发展,即使是新一代的农村地区和不发达地区的“第二代农民工”和“农民工第二代”的生活和思维方式也与他们的前辈截然不同。多数受过初中以上教育的“80后”农民工即使经济危机面前也“不愿返乡、不能返乡和无法返乡”。由于大规模的征地造成耕地过少和农村经济的凋零,使他们“无法返乡”,由于缺乏农业劳动(特别小生产劳动)的技能和现实中对于农业劳动无法带来的现金收入,使他们不能返乡;而现实中农村生活水平的低下和落后,也使他们不愿返乡。但同时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和社会保障体系的缺失,他们在城市中又缺乏基本的生活条件和长期的经济出路。很多年轻人因此不得不采用反社会和“非法”的方式进行生存,其中相当比例从事于黑社会犯罪与色情服务行业。最近在海南东方市发生的“3-22”事件中已经有明显显露。



当然随着经济危机的深入,过剩的失业人口,尤其是其中的失业大学生与青年农民工;面对现实所面临的经济困境和当局的政治专制必然会对现存体制的合法性与合理性提出根本性的质疑。他们并将最终意识到只有来自于基层的自我团结和自我组织并对现行体系的彻底变革才能最终找到个人与整个社会的出路。

“贫富悬殊”的消费

促进消费是增加中国内需的关键。官方统计数据显示CPI减缓,但消费总额却一直在增长。而且据反映,相对于CPI的下降比例,其中比重并不高,但最关系普通百姓生活的日常消费品的价格上升了,特别是蔬菜和水果的价格在不同城市都有普遍的上涨。而政府打着“惠农”幌子的“家电下乡和汽车下乡”中,政府部门提供的购买补贴往往都流入到流通商的手里,而由于信息不对称和物流成本,同样的产品农民消费者仍然承受着比城市中昂贵得多的零售价。

另一方面,占有中国人口不到15%,但却拥有着80%以上消费能力(而其中0.4%的家庭拥有70%的社会财富)的中国中产及以上阶层的消费热潮则与全球经济危机的气氛截然不同。贸易全球化和消费主义带来的“闲暇阶层对于奢侈品的物崇拜”,这一点对于中产阶级尤为重要,因为只有消费主义的存在——也即对于非必需型奢侈品的挥霍型消费——才能强化中产阶级自我认定的阶层归属意识。根据《21世纪经济报道》的数据,截止2009年1月,中国奢侈品消费总额达86亿美元,占全球市场的25%,首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国(日本是世界第一大奢侈品消费国)。面对经济危机,全球一线奢侈品商场摆脱困境的举措竟然是战略性地向中国内地的二、三线城市进军。

事实是无论在任何新殖民世界的资本主义国家中这种消费需求与国内市场供应必然出现天然的不匹配,因为奢侈品的定义是与所谓“时尚的资产阶级文化”想联系的,实质是对于西方化的市场拜物相关。根据奢侈品集团LVMH2008年的报告显示,中国奢侈品消费能力有5成以上(大约50亿美元)是流向海外的,与国内市场基本无关。大量的中国中产以上阶层趁着人民币汇率升值在国外旅游购物的规模更得到进一步促进。根据招商银行的一份调查显示,拥有白金以上信用卡的少数富豪阶层月刷卡消费超过得7万元人民币,在境外消费的意愿是国内消费的5倍以上。而当局的政府消费行为也反应了这一需求。据统计,中国官员公款吃喝、出国和公车一年花费超过9000亿元人民币,占财政收入的20%;如2009年初中国政府率领的采购团在英国所下的22欧元定单中的三分之一(近8亿欧元)是用于购买劳斯莱斯汽车、路虎越野车和捷豹轿车等高档车辆。

所以,当政府一边高叫促进内需,一边却在海外挥霍之时,整个社会经济运作出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现象。一方面,“具有消费需求”而又“无力消费的”普通阶层随着社会整体生产规模的缩小和普通民生品价格的上涨在进一步缩小消费;但另一方面“非理性消费”但“仍

然具有消费能力”的中上阶层却将大量的消费能力投入到无法转化为再生产，也无益促进流通的有限的奢侈品消费市场中。正如马克思在《剩余价值学说史》中所提及的“生产过剩的危机和绝对的需要有什么相干呢？它只是和有支付能力的需要有关系。”是的，合理的需要被抹杀了，而有消费能力的挥霍浪费在大行其道。



饮鸩止渴的“凯恩斯主义”

世界范围内随着经济危机的发展，原先信奉“新自由主义”的经济体和经济学家纷纷改换门庭，转而试图采用凯恩斯主义以摆脱危机。但凯恩斯主义果真是解决经济危机的灵丹妙药，还是可能进一步的火上浇油？

凯恩斯主义认为是由于“消费倾向”和“灵活偏好”等主观心理因素导致个人消费不足和投资不足；所以只要改善心理因素和增加措施以鼓励增加消费和投资，就能摆脱危机。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又岂能长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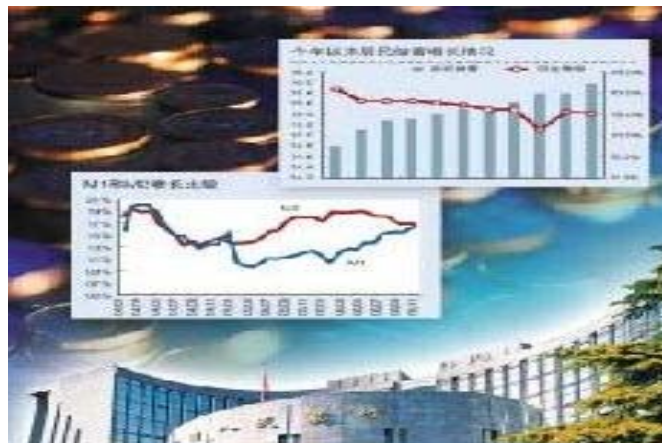
前面我们已经讨论过消费不足的原因是在于最广大劳动者的“无支付能力”，而且由于生产过剩，正如马克思所论述的，“把这种情况（经济危机）认为是由于生产资本的缺乏，是再错误也没有的了。生产资本正好在这个时候是了过多。”所以，其实根本不存在投资不足的问题。

但资本主义各国的救援方案都着力加大货币投放量，促进流通市场的流动性。无论是美国政府通过的上万亿美元救援计划；还是中国 4 万亿刺激方案和 9500 亿元的赤字都是如此。而且这也很好解释为什么中国总理温家宝如着魔般地将强调增强“信心”（心理因素）。这种通过扩大政府开支、促进公共工程而达到通货膨胀的手法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危机问题。它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和一段时间内暂时缓和生产能力的增长与广大人民相对需求缩小之间的矛盾，但在现代过度投机的金融体系和迅即的技术与流通手段下，即使这种缓和矛盾的能力和可维持的时间也值得怀疑。

就中国经济本身而言，出口依赖模式决定了其无论如何加大基础设施建设与公共工程的投资建设都不能解决问题。因为中国的社会财富构成决定了绝大多数普通劳动者无力消费，短期的政府开支必然会通过税收等方式（哪怕是对于高收入群体与垄断企业的高额税收）转嫁到普通劳动者身上。由于他们的真实收入的日益降低，生活更加贫困，从而使生产与消费进一步脱节，也会使危机更为深刻。

历史也充分佐证了这一问题，我们得知 1930 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中，在 1929-1933 年间美国加工业的工人人数减少了 38.8%，而工资总额却降低了 57.7%；即使在所谓罗斯福“新政”的时代，凯恩斯主义大行其道，美国经济也并没有真正恢复；在 10 年的时间中，失业率一直呈现反复振荡，最终是依靠二战的爆发才使美国真正摆脱经济危机。

近 2 个月中国政府 1 万 5 千亿的信贷和预算中的财政 9500 亿财政赤字会使市场的流动资金进一步过剩。当大量过剩资金没有合适的生产部类可以投资生产之时，必然会涌入相对易于投机炒作的金融领域或将某些产量有限的产品转化为投机品以谋取利益。如最近中国股市在经济基本面没有明显改善的情况下，出现暴涨暴跌必然是新注入投机资金带来的结果。而同样房地产市在明显供应过剩的情况下，仍然在一线城市维持坚挺的房价，而政府新投入的数千亿公共住房建设资金其实在帮助房地产公司实现“廉价融资”。此外其他日常消费品领域出现的非正常价格上涨也可归结于此。



随着要克服的限制越来越大，采用的克服手法也越来越强硬。由此值得关注的是在今后数月内，目前最关键的问题是：中国所面临的这场危机将发展成为一场类似于 1930 年代长达 10 年的世界性大萧条还是如 1970 年代痛苦不堪而难以克服的欧美“滞胀”危机？

只要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无论是凯恩斯主义也好，还是其他“千奇百怪”药方除了帮助资产阶级加紧向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转嫁危机，维持高额利润，并不能从根本上消灭经济危机；只有消灭资本主义制度才能真正消灭经济危机。

如何应对经济危机？

——资本主义危机、群众觉悟和社会主义纲领

彼得·塔菲 (Peter Taaffe)

英格兰和威尔士社会主义党 —— 工人国际委员会 (CWI) 英格兰和威尔士支部



2009年3月，300万法国人走上街头参与总罢工

工人阶级如何才能应对 1930 年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的影响呢？大规模的裁员已经成为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和整个当今世界的一个重要特征。公司老板和他们的政府正在疯狂地将他们所创造出来的灾难转嫁给工人阶级和众多中产阶级。

世界资本主义制度走入了一条死胡同，任何还算严谨的这一制度的代理人都明白不存在迅速摆脱危机的出路。您可以任意挑选各种预测：无论是英国财政大臣阿利斯泰尔·达林 (Alistair Darling) 所说的“60 年来最糟糕形势”还是新的工党政府教育大臣埃德·鲍尔斯 (Ed Balls) 说的“100 年来最糟糕的”！众多资产阶级评论家现在开始同意我们的分析，认为这至少是 1930 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甚至还可能超过它。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危机有可能比那时更糟糕。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扩展使得这次冲击比 1929 年前所谓的‘镀金时代’时存在的冲击更广泛和更深远。出于这个原因，它已经成为历史上最国际化和最普遍的经济危机。美国、西欧、日本、东欧、俄罗斯、亚洲、澳新太平洋地区和拉丁美洲，所有的地区全部卷入了经济下降的漩涡之中。它所扩散和发展的速度与规模早已超过 1930 年大萧条的最初阶段的状况。

1929 年的那场危机肇始于股票交易所，扩展到金融部门，并无情地席卷所谓的“实体经济”。今天的危机是由金融垮台所引发的，进而冲击工业，现在又重新开始影响金融部门。1929 年危机的全面影响只有在一段时间后才能感觉到——在法国的影响是两年或三年之后——而这一危机以其即使不算摧毁意志，也是以惊人的速度吓唬着世界资本主义制度的代表们。1929 年危

机用 3 年时间表现出来的结果现在 1 年里就可能呈现出来。

这一危机的特点是生产过剩，大量供过于求的商品，老板正努力通过使工人阶级大规模失业来解决生产过剩。但是，这甚至也导致中产阶级的‘过剩’，他们和工人一起被逐出工作场所。换言之，中间阶层的无产阶级化，这一资本主义繁荣期的特征，也得到了进一步的表现。而这反过来又在削弱和破坏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

工人组织的投降

资本家在将出现的进一步经济崩溃所带来的社会后果面前颤栗。他们唯一值得安慰的是不必面对来自工人阶级的有组织的挑战，这是因为之前的工人组织早已为如英国工党领导人托尼·布莱尔和他在欧洲及世界其他地方的社会民主党中的同类所彻底堕落。他们一古脑地全部站到了资产阶级的一边，这其

中也包括当时斯大林主义的崩溃及接踵而至的亲资本主义的思想泛滥。结果是，工人阶级当面对他们来之不易的权利和社会地位最大的挑战的时候，他们却在政治上早已被解除了武装。

由于缺乏领导和组织，当资本家以危机为借口侵害工人阶级利益的时候，群众不可遏制的怒火使他们自发地涌向工厂和街头。这就发生在当爱尔兰政府设法消除老年人的保健福利的时候；而当残忍的资本家关火柴盒那样轻易地关闭整个工厂之时，在威特福德水晶工厂

(Waterford Crystal)和戴尔计算机工厂发生了工人占领工厂或者威胁这么做的举动。同样激烈的场面也同样出现在上周末考利和牛津的宝马迷你车工厂，工人们前所未有的抗议甚至引发了工人和主管间的拳头相向。然而，要使这一工人阶级本能的反抗转化为一场持久的运动就需要有明确的政治纲领，其中包括斗争口号和组织。

而工会领导们也有着同样的投降行为，实际上进一步有助于残酷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对世界范围内工人阶级和穷人的侵害。由于资产阶级不再需要面临一个有组织的工人阶级或害怕工人运动的反抗，因此无节制地疯狂地冲向无管制的资本主义。人们将工人组织的前领导人视为新自由主义战车上的基本不发挥作用的第五个车轮。工会领导人完全的优柔寡断就是证明他们向老板和政府投降的证据，从而使后者可以将一危机的负担转嫁到工人阶级和穷人的身上。

但人民群众其实很清楚谁当为此负责。在意大利，作为底层思想状况的“晴雨表”，学生在示威时高喊：‘我们不会为你们的危机而买单’。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工厂在工人阶级的眼皮底下被关闭的情况下，工会领导人所表现出来的卑躬屈膝投降的态度，和我们能从劳工运动高层处所听到的‘共渡时艰’的陈词烂调。20世纪30年代托洛茨基写道工人阶级，甚至人类所面临的危机总而言之是工人组织的领导的能力危机。然而，今天不同的是我们面临的不仅是领导能力

的危机，而且还是一个组织层面的危机或者说缺乏工人阶级组织清晰纲领的危机。

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过这样的鸿沟——‘剪刀差’——资本主义危机的客观形势和工人阶级可能前景之间的鸿沟，其中重要是在于缺乏组织，尤其是缺乏群众性政党。由于无情的宣传屏障，尽管经济危机冲击很严重；30多年来新自由主义政策的现实和在政治和经济道路上的没有有其他可供选择使得即使在工人阶级中间依然残存着对‘市场’不可避免的默许。虽然许多人震惊于经济崩溃。但即使在许多工人中间甚至还有人依然抱着根深蒂固的想法认为当前的危机是暂时的，至迟到明年年底就将结束，到我们迟早可以返回到“晴朗的”经济高涨期。

暗淡的经济前景

而这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又为‘大众’媒体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评论家中的某些人进一步强化。但是，另一部分经济学家已经得出结论‘晚会已经结束了’。例如，《独立报》的肖恩·奥格雷迪(Sean O'Grady)在1月份就曾直言宣布：“高失业率会长期逗留不去。”在美国的大萧条期间，失业率直到1943年才重新降回到1929年的水平，而这是通过破坏性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才使美国经济走出经济泥潭。这会是美国奥巴马总统所遭遇的前景，因为他正在设法与雪崩般的裁员和每月增加的60万失业人口进行斗争。在未来的一年左右，美国和英国的失业问题将达到劳动力的10%；在现代环境下其影响类似于大萧条。

而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尤其是原来被认为能对经济危机免疫的欧洲地区，形势反而更加糟糕。之前欧洲央行的声明认为欧元区将躲过由美国经济所带来的最恶劣影响的观点已化为泡影。整个欧洲大陆已经加入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泡沫的总破裂之中，而日本也是如此。最新的预测，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可能下降近10%。作为巨大的出口导向机器的日本正减速后停止，2008年最后3个月里下降了

3.3%，年下降率可达12.7%。欧洲的经济发动机德国也已加入了这个行列，而欧洲大陆上那些较小的经济体——爱尔兰、西班牙、意大利、希腊、葡萄牙和英国——也正步冰岛的后尘陷入国家破产的风险。

对群众来说，这好像是今天还阳光明媚和风旭日，而第二天就陷入寒冷和黑暗的冬夜，其中根本没有秋天的过渡。西班牙和爱尔兰的命运比起大多数国家而言在债务驱动的建筑和房地产市场的“繁荣之路”上走得更远，这在2月份英国《观察家报》关于萨拉戈萨

(Zaragoza)的报道中得到充分说明。房地产建设热潮的崩溃意味着一年内该座城市的失业率飙升75%。到今年年底，西班牙的失业率可能会从已经不可接受的14% (330万工人)猛增到20%。工人阶级愤怒到无法忍受，成千上万的走上街头抗议要求“罢工！罢工！罢工！”。

西班牙所发生的一切可能会发生在一系列其他国家，其中也包括英国；并将可能挑起革命性的爆发。如果没有明确有觉悟的领导层，骚乱将不可避免并导致部分青年走上恐怖主义的死胡同。希腊所发生的爆炸性事件表明在某个特定阶段一小部分人中间的无政府主义和恐怖主义的情绪是显而易见的。而摆脱机会主义领导人的麻痹影响是大规模群众运动的唯一出路。

英国炼油厂罢工：混乱和清晰

来自英国发电站和炼油厂的建筑工人自下而爆发的罢工中充分表现了这种愤怒。这是一个用来衡量工人阶级觉悟和面对不同政治倾向的

“实验”。鉴于我们处于新自由主义的黑夜之中，希望在部分工人，在某些情况下也许是大多数工人，中不出现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情绪是完全乌托邦的幻想。然而，正如已经在我们的周报《社会主义者》中所表明的，这场争论中并非如此。从本质上说，罢工是反对资本主义采用奴隶般的工资进行‘向下的恶性竞争’，反对欧洲老板们精心策划的反工人阶级的立法，也即欧盟

工人指令(European Posted Workers Directive)和欧盟本身

这在一些工人头脑中被扭曲成民族主义，并通过如下的口号反映出来：“英国的工作岗位留给英国工人”。这一口号最初由首相戈登·布朗在一次新的工党大会的演讲中创造出来，企图以抗衡极右翼的英国国家党（BNP）。没有领导的明确指导，不仅在英国而且在其他地方，工人有这样的初步反应也不足为奇。但是，这只是罢工不成熟的一个特点，但很快就为众多有觉悟的社会主义者所阻止，尤其是社会主义党的同志工人更是如此，为所有的工人包括移民工人争取同样的权利、工资和工作条件。在俄国革命中，沙皇的总参谋部人员害怕一个布尔什维克在工人中出现，他就会象‘饱和溶液中做种子的晶体’那样活动（导致析出更多的晶体）。正如托洛茨基所说的那样，能够在激烈的气氛中把大多数人吸引过来。我们在有社会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其中一些是社会主义党的党员）参与的这个罢工中看到了类似情况，罢工完全克服了民族主义或种族主义的任何的内容。明确表示声援意大利来的移民工人，包括用意大利文印刷的宣传传单和坚决要求所有工人能够同工同酬。

正如可预见的，一些既没有出现罢工现场又不愿意听取罢工工人真实思想的极左翼团体站在完全错误的立场上。例如，英国社会主义工人党(SWP)把注意力集中在批评“英国的工作岗位应该留给英国工人”是罢工的主要口号和特征。但却罔顾如下事实：罢工工人在罢工纠察线上赶走了来宣传的英国国家党（BNP）的成员。此外，更重要的是罢工取得实现部分工人控制的重要成就，工会能够参与新工作岗位的安排。当然，正如一花独放不是春，但在这个行业和其他地方的工人现在有了一个鲜活的例子证明，即如何在复杂局面下捍卫工人的生活水平，而同时克服民族或种族分裂，并确保工人阶级实际的胜利。

罢工之后，负责‘调解’工作的英国咨询调解和仲裁局（ACAS）

的结论是外国合同工人的工资并不比英国本国工人低。这是不正确的，因为他们完全忘记掉了派遣劳工有时可能在其周工资或月工资上得到和‘国内’或全职工人相同的工资。但是，他们并没有带薪休假、节假日和其他福利，这些都是全球范围内的老板们正在试图取消的东西以便作为一种手段提高其利润率。这同样适用于这一争端。这一直被ACAS掩盖着，并且为名誉扫地的专职工会官员所默许。这些全职工会官员尽可能使自己与非官方的罢工保持距离，以免可能违反英国严厉的反工会法。但是这一争端带来了积极的成果，而且由于社会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的介入以及工人的斗争经验和使民族主义被扫地出门。

大部分的极左派团体不理解群众运动将如何演变，特别是对于其最后阶段的性质。这不会以完美的形式出现。正如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英国十七世纪资产阶级革命领袖和护国公）毫无保留地形容自己脸上充满瘤[当他要求画师必须如实画出他的脸部缺陷，（pimples, warts and all）]。如果这些极左人士处于1905年俄国革命的情况之下，毫无疑问，他们会首先谴责加彭神父（Father Gapon），因为最初是由他带领群众在沙皇的旗帜下向“我们的父亲”沙皇进行请愿。但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力主参与运动的列宁甚至在最初阶段与加彭神父进行协调，（按照那些极左人士的观点）列宁他们应该提出将神父从示威活动中驱离作为参与抗议示威的前提条件！他们将如何应对1907年詹姆斯·拉肯（James Larkin）用天主教的绿帜和新教的橙旗将天主教和新教工人共同组织起来以反对老板？

在没有对种族主义或民族偏见做出任何让步的情况下，因为我们所刚刚历经阶段的现实情况，社会主义者完全有必要采用合适而技巧的方式去接触现有工人阶级和了解他们的政治前景。我们无法象历史上的俄罗斯圣人那样“奢侈地”面对“我怎么去莫斯科？”的问题时回答道：“如果我是你，我不会从这里出发”。工人阶级，尤其是经

历了相当长一段所谓“社会和平”时代的工人阶级，绝不会象罗马神话中的智慧女神弥涅耳瓦一样从主神朱庇特的脑袋里蹦出来，突然介入到实际斗争中去。

满腔的阶级仇恨

工人阶级的愤怒日积月累，这已为去年在希腊爆发的‘半起义’状态和1月29日震动法国的反萨科齐大罢工所表现出来。虽然在不久之前，萨科齐还嘲讽道：“尽管他损害法国工人和青年，可哪里有什么罢工？”回答他的就是罢工中所展示出来的反抗意志，参与示威的范围和人数远远超出工会领导的组织者所预期的。超过200万工人涌上法国各城市的街道。面对罢工萨科齐感受到了潜在的具有爆炸性的情绪，所以立即对学校的学生让步希望能以此手段来制止运动。但这并没能阻止罢工的发生，运动中已经弥漫着1968年运动的气息。

然而即使是在政治上一直是欧洲工人运动先锋的法国，目前工人阶级对未来的前景与1968年时的工人也有着重要的区别。矛盾的是在于今天的资本主义经济形势比1968年时糟糕得多，而1968年历史上最大的总罢工是发生在一个持续繁荣的背景之下。那时在工人和学生中有一个广泛的社会主义甚至是革命性的觉悟。但正如我们所指出的过去三十年的变化，尤其是工人组织领导人向资本主义投降，使目前群众的情绪远远落后于1968年。所以当前存在着混乱的前景认识和政治意识。

因此，毫无疑问所有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的群众都满怀怀着对那些被视为目前的经济灾难的主要肇事者，即金融家和银行家的阶级仇恨。英国议会和美国国会半公开的审判已经揭开这一序幕。在法国群众走上街头表达自己的愤怒；而且这一愤怒很明显同时针对针对银行家和总统萨科齐；即使萨科齐绞尽脑汁地企图把自己和银行家们划清界限。但是假如即使在法国还没有出现一个广泛的反资本主义觉悟，那么在其他欧洲国家这种意识可能更少了。

希腊的情况有所不同，已经出现了显著的革命前的形势。这反映了希腊资产阶级和它的国家体制已经彻底破产，大规模的工人阶级和青年对他们的贫困状况的绝望以及他们为此准备斗争的态度为起劲所发生的三次总罢工所证明。这也反映了资本主义执政党的彻底无能——新民主党和前社会民主的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PASOK）——以及新崛起的工人政党左翼激进联盟（SYRIZA）。于之相伴的是希腊面临的暗淡的经济前景。经济形势是如此的绝望以至于评级机构穆迪对它的经济降级可能导致资本主义投资者将拒绝购买政府债券。这可能会导致经济崩溃，而反过来可能看到希腊自动离开或将被逐出欧元区。

它也可能预示着一系列国家部分甚至彻底的破产，如 20 世纪 30 年代欧洲和新殖民主义的地区拉丁美洲那样。如果债券交易商开始拒绝购买政府债券，西班牙、葡萄牙甚至爱尔兰将轻而易举地加入希腊所处的状况。面对这种情况，统治阶级将毫不犹豫地诉诸措施更野蛮地攻击工人阶级的工资和生存条件。在这种腐朽的资本主义情况下工人阶级的生存条件就像一个人处在向下运行的自动扶梯上只是为了保持它的位置而不得不疯狂地向上奔跑。

声名狼藉的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的理论家相当平静和‘冷静’地辩称通货紧缩（与价格上升的通货膨胀相对，价格下降、消减生产规模和大规模失业）的是保证他们利益的最佳途径。通货紧缩和通货膨胀是资本主义硬币的两面，而且往往工人阶级为此付出代价。《金融时报》一位作家道出了其中秘密，他冷静宣称公司将受益于通货膨胀，因为部分债务将消失；那些有着固定利息债务的公司将受益。另一方面：“更高的通货膨胀比其他情况更能让越来越多的公司和工人同意削减真实工资。这既对目前缺乏竞争力的公司有益，而且是[资本主义]社会所热衷的，因为减薪比失业更公平”。换言之，工人

阶级必须付出代价，而利润如果无法增加也必须保持。

显然，资本主义和工人阶级已进入了一个残酷的新时代。极其重要的问题是如何缩小潜在的资本主义旷日持久的危机的客观形势（实际上是一系列的危机）和如何使得意大利青年的口号：“我们不会为你们的危机买单”能够具体实现之间的鸿沟。这里所提及的——正如最近的英国炼油厂的罢工和在考利（Cowley）850 名被解雇工人用 1 小时时间所表现出来的愤怒一样——需要形成一个战斗性的纲领。显然，从过时的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新社会整体转变必须实现。

这场危机又一次证明了如卡尔·马克思所描述的，虽然在过去一段时间为压倒性多数‘知识分子’所嘲弄的，经济繁荣和萧条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周期性。不平等是无法在资本主义框架内得到克服的，就如同克努特（Canute，公元 9 世纪丹麦和挪威的国王）也不能改变浪潮的方向一样。不平等是资本主义的实质，并且为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关系所清晰显示出来。正如马克思指出的，资本家购买工人阶级的劳动力是为剥削它。工人阶级只取回了他们新创造的价值的一部分，其余是无酬劳动，即被资本家所攫取的利润。正如托洛茨基指出的，阶级斗争无他，就是争夺分配剩余产品的斗争。这种剩余产品越是被剥夺——尤其是当利润停滞或下降时，如目前的情况——阶级斗争就越加激烈。在这种情况下工人阶级在取得新的胜利之前首先要做的是必须有决心抵制资本的冲击以捍卫所有过去斗争取得的成果。

与资产阶级辩护士所认为的截然相反，资本主义，尤其是在新自由主义的阶段，即不能最好地也不是最有效地最大限度地提高生产效率，更非是有效地向世界各国人民分配产品的手段。尤其在柏林墙倒塌后，资本主义被作为一个无懈可击的而且不易于突然崩坏的系统，的想法曾经很普遍，但现在却完全不足为信。不用关注工人阶级自己“有水准”的期刊，就连捍卫资本主义辩护士们也承认了这一点：“保

守派...其实相信资本主义制度。任何了解资本主义的人都知道资本主义不时地会出现问题。保守的经济学教义认为经济衰退更象天气，有可能减轻其影响，但不可能改变其性质。”（彼得·欧本（Peter Osborne），《每日邮报》右翼政治专栏作家。）

过渡路线

不用及美好的未来，如果资本主义今天崩溃；我们工人阶级将为此买单。这也就是（政治评论家）欧本所说的暴风雨天气本质；在这个世界中，当工人沉浸在大规模失业的痛苦之时，国家却成为了资本主义的保护伞。但我们并不打算为此买单，我们需要完全更人道的制度。社会主义必须成为工人阶级的政策。即使《新闻周刊》也甚至宣布：“我们现在都是社会主义者”。然而不幸的是这还无法代表这一制度绝大多数受害者，也即工人阶级和底层穷人的情况。因此，在社会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的纲领中把要求实现民主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作为至高无上的理念提出时，也有必要在目前的情况下提出战斗性的过渡要求。

对 1914 年前的社会民主党而言，这一路线被认为是不必要的。因为它的纲领被划分为社会主义思想的最高纲领和日常的最低纲领。而决定性的变化是在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导致在俄罗斯革命爆发和由 1917 年革命引爆的整个世界和欧洲的群众斗争和革命的浪潮。在这种变化的形势下，争取最基本的改良，乃至捍卫过去已获得的成果都被作为直接对抗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局限性的斗争形式提到了议事日程。布尔什维克因此制定了过渡纲领作为桥梁——考虑到工人阶级日常诉求的情况下——将现实的觉悟水平与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联系起来。俄国革命时期这也是必要的，因为工人阶级不同部分对于前景认识不同并且会随之变化。这在列宁的出色的小册子《大难临头，出路何在？》中得到了总结。

追随列宁的脚步，托洛茨基为革命的第四国际制定了过渡纲领：垂死

的资本主义和第四国际的任务。这一纲领产生于 1938 年，当时托洛茨基正确预计即将发生毁灭性的世界大战。灾难性的战争之后将爆发革命浪潮，而在这一进程中过渡纲领以及它的诉求可以发挥关键作用。革命浪潮的确到来了，但社会民主党和斯大林主义介入其中在战后的局势下挽救了资本主义。而之后这为发达国家带来了 1950 年至 1975 年的经济繁荣，或者说壮观的经济烟花，奠定了政治前提。结果是托洛茨基的思想虽然在革命时代风行一时，但在这一时期却从来没有得以实现。

一些组织，例如社会主义工人党(SWP)，因此放弃了过渡纲领和过渡路线。我们捍卫托洛茨基的方法；但同时认识到有必要对在繁荣期所产生的一些诉求根据不同的条件做适当修改。但是，对于目前英国、欧洲和世界各地的工人运动所面临的形势而言，即使我们不是全面采纳 1938 年托洛茨基过渡纲领的所有诉求，当时的诉求对于目前的斗争也是至关重要的。而且事实上，现在这些诉求甚至比 1938 年撰写时更具有现实性，因为目前所发展的条件与当时所预期的阶段是极其类似的。例如托洛茨基要求，在面对风行一时的大规模失业时候，需要（社会）提供“工作或确保基本的生活费用”。而我们今天就要求，“有益的工作，或者能维持生活的收入”。工人阶级拒绝为此危机付出代价。让老板们来支付！如果他们不能保证工人阶级最起码的生存条件，我们也不能负担他们的政治制度！

国有化

在这个经济危机爆炸性的时刻，不仅有必要接受工人阶级部分关于工资和工作条件的诉求而且还应关注政府的作为或不作为。一个恰当的例子就是针对银行的怒火，这不仅是针对已经暴露出来的骗子，如伯纳德·麦道夫（Bernard Madoff）和艾伦·斯坦福德（Allen Stanford），而是针对将自己整个行业破产，并威胁把整个社会包括工人阶级推向深渊的所有银行匪帮。他们允许国家介入以通过大规模

的救助来拯救他们。然而，失败的右翼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参议员麦凯恩却并不买帐。他把国家债务的增加描述为“盗窃子孙的财富”。但是正是他的“护法使者”右翼共和党人前副总统切尼宣称，“里根当局证明[美国政府的]赤字不会带来问题”？而且这也并没有阻止麦凯恩连同其他共和党人考虑全面国有化银行的问题。

资本主义政客们可以接受国家救援，只要它是完全沿着资本主义路线并具有明确前景今后会将‘国有化的’行业归还给当初破坏这些行业的私人口袋中。英国的一些评论家已经设想，银行国有化后在国有部门内预计保留 9 年左右。

虚伪的麦凯恩和他“动人的”对后代的关心掩盖了伊拉克战争可能总计达 3 万亿美元的巨大开支，而正是他本人完全支持这场战争。麦道夫（Madoff）腐败案件的金额相对于美国政府通过‘私有化’建筑业来‘重建伊拉克’而获取的现金相比实在算不了什么。独立报的帕特里克·科伯恩评论说：“入侵之后真正掠夺伊拉克的是来自美国的官员而非巴格达的贫民窟”。在一个案例中，为政府审计的工作人员说，“由‘一托盘一托盘百元美钞’构成的 5780 万美元被运往负责伊拉克中南部的美国会计主任处，他自己还站在成堆的钱边拍照留念”。虽然到底有多少钱被劫略了可能永远不会为人所知，但迄今至少有 1250 亿美元（合计 880 亿英镑）消失了。这只是一个例证，不仅美国而且世界各地的资本家都在利用国家作为巨大的摇钱树搜刮财富。

现在提出的诉求，尤其是在英国和美国提出的诉求，需要救助的不应是银行家，而应该是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甚至国有化的诉求也不象过去阶段那样受欢迎——因为它针对的是应该为混乱负责的银行家，而迫使奥巴马当局和布朗政府实施，尽管这也并不合乎他们的胃口。这是因为迄今在英国和事实上在美国的所实行的部分国有化经验已经渐与大众的意见疏远。这些部分国有化的企业董事会仍然保留着

未变的守旧的资本主义性质。目前还没有出现类似于 1948 年由工党政府接管煤矿时，红旗招展和工人阶级欢欣鼓舞的庆祝场面。这是因为，如北岩银行在完成国家收购后，开始大规模的收回无力还款的按揭房屋，解雇 4000 名工人；而之却是给仍然在掌管银行的资本家们保有巨额的奖金。这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一种形式，而并非如旧工党中的改良主义者所鼓吹的迈向社会主义的一个步骤，当时旧工党仍然是一个具有底层群众基础的工人政党。

需要民主计划

在另一方面，‘市场’实在无法提供任何出路。例如在英国，1999 年有三分之二的就业机会并不是由自诩“具有企业精神的”私营企业创造的，而是国有行业提供的。这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破产的一种承认。此外，私营行业内公司结构根本并不是如市场经济支持者所宣称的‘精英管理（才能主义）’的典型案列。事实上经济危机的影响是如此具有震撼力，以至于越来越多资产阶级作者也不得不开始揭示新自由主义条件下所谓“管理和运作”的真实本质。例如，《观察家报》的西蒙·考尔金（Simon Caulkin）把众多大型商业企业的结构比作斯大林主义的镜像而非是理想中的资本主义企业，——包括著名的英国电信（BT）在内，据已透露的信息政府可能计划将已近崩溃它进行重新国有化。跟据他（考尔金）的说法，它们“在公司结构和战略上所具有的吸血僵尸般的特征”与斯大林主义具有相当的相似性。

他宣称这种管理制度相当粗暴：“他们对公司高管热脸相迎，但对客户却冷屁股相待”，很多管理者更关心的是利润指标而不是生产有价值的产品。按照惯例被认为世界上最有管理效率的企业通用电气（GE）将公司收入的 40%——也就是说 600 亿美元——用于行政支出和非直接运营费用。西方大公司的高管与命令经济下斯大林主义政党高干间具有比人们所承认的多得多的共同点。由此可见，接管这

些公司并建立一个由工人控制管理并实施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制度将是多么的便宜和有效率！

考尔金的文章本身就是对马克思的论点的承认，正如马克思在 19 世纪时所讲述的——即使是资本主义工厂的内部管理也是计划的一种表现。马克思说过，当工厂体系应用于作为一个整体的经济和世界之时，也就将描绘出通过消灭市场而实现民主社会主义计划的形态。而且现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大公司——尤其是垄断企业——具有完全与前苏联相同的头重脚轻的官僚架构。所以解决方案即不是斯大林主义也不是资本主义‘市场’，而是民主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这也就意味着需要工会、工人组织和小商人等阶层的代表参与监督公司帐目，以便告知劳动者公司的实际情况并相应地筹备运作计划。

为（思想）鸿沟搭起桥梁

在这一阶段之所以需要过渡纲领是由工人群众中觉悟与意识的混乱。但随着事件的推进，这种意识将会进一步振荡和转变。但是，依靠过渡路线和过渡纲领——也就是与时俱进地采纳托洛茨基的方法和来自于工人阶级自身的斗争经验——就完全可以有助社会主义觉悟的发展，并可以减轻首先在政治上最先进的阶层和之后在广大的工人群众促进这一思想的中发展。这就为今天劳动群众的觉悟和向社会主义思想的转变之间架起了桥梁。宗派主义者不需要这样一个桥梁，因为他们并不打算与广大工人阶级站在一

起通过共同学习和互相帮助来促使阶级觉悟的转变和增加对于社会主义的认同。

对英国、欧洲乃至世界范围内的工人阶级而言，我们已经进入一个全新的时期。即使奥巴马通过经济刺激方案设法使世界和美国的资本主义衰弱能有所缓冲——事实上这一可能性本身就是不确定的——但这场危机目前所带来的形势已经完全不同于之前的形势。世界经济充其量只能顽固地依靠大规模失业维持着如“患贫血症”般（极为衰弱）的增长。以为（大规模的失业）这如同身体中的脂肪组织，是一种机体衰退的症状。但资本主义不会自动地从历史舞台上消失。这就有必要存在一个强有力的大规模群众性的手段以帮助提高工人阶级群众的理解水平——而正是过渡纲领的帮助——可以促使这个衰败的制度转向社会主义。

假如没有采取这一路线，那么即使在面对目前的经济灾难之时，对于劳动人民来说也将存在这种危险，即无法马上拥有什么明确性的替代资本主义的方案。什么是可行的替代办法。例如，在汽车行业，由于大规模裁员和工资被大幅削减，工人们会有一种本能的想法，即他们目前的产品“没有市场”。但是，由于先进技术和技能的存在只用投入很少精力就可以实现汽车产业的变革，从而从当前面临着巨大产能过剩的市场转向生产其他有用的产品，其中包括绿色的和环保的大众交通工具。全世界所有人都迫切需要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环保的

公共运输系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就出现了生产上的这种转变；但鉴于今天资本主义的混乱，目前这是完全不可能的。这样就提出了需要一个取而代之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要求。

在下一阶段，日益恶化的客观形势和工人阶级觉悟之间的鸿沟将逐渐缩小。大量层出不穷的事件——尤其是爆炸性的事件——将确保这一时刻的到来。在深渊的边缘，劳动人民将正面资本主义制度——虽然有时未必已经明确地拥有取而代之的想法。然而，如果工人阶级能将社会主义理念与日常斗争结合起来连接起来，坚定地信奉过渡纲领和过渡方法，那么重启示社会主义和革命觉悟之路将大大地缩短，而且为此付出的痛苦也会少得多。

工人绝对不为承担资本主义危机而付出代价！向大规模的失业说不，特别是向新一代青年要永远依靠失业救济维生的可怕前景说不。以民主的和社会主义的方式国有化银行，由工人阶级、工会和小商人等阶层代表参与组织。一个民主的社会主义国有经济部门本身将提出进一步国有化的问题，其中就包括掌握社会经济命脉。只有在这条（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工人阶级群众才可能获得希望以反对早已停滞而腐朽的资本主义世界。

*英文原文刊于《今日社会主义》（Socialism Today）2009 年 3 月期，中文版为本社翻译。



2009 年 4 月 2 日英国伦敦青年反 20 国峰会和争取就业游行

“富人政治”与“阶级民主”

弘毅

“富人参加选举，我认为有积极意义。如果一个国家法制比较健全的话，财富代表着一个人的能力。老百姓可以不选出最富的人当社区领袖，但是老百姓绝不会选一个穷人当社区领袖。”

以上这段话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党国英回答《中国新闻周刊》专访时所说的。在该杂志 2009 年第一期中在有“富豪竞选村官为哪般？”专题，含《龙门村：1300 万竞选村主任的背后》与《裴寨村：“逼宫式”选举真相》2 篇文章。

在陕西韩城市龙门村村委会换届选举工作中，新当选的村委会主任王文选在选举当天把他自己的 1300 多万元存款单复印在宣传单的后面，并承诺当选的第二天就给每一个村民发放两万元现金；河南新乡市一名煤老板被村民推上村委会主任后个人出资 3000 万元为村民建别墅并带领全体村民入股建水泥厂。

其实这些报道并不是什么新鲜东西了，我们甚至早已耳熟能详。同样，报道本身也没有带给我们过多的震撼，也没有真正地明确道出“富豪竞选村官为哪般？”的原因。反而是文末对党国英的采访起了点睛之用。党国英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可能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个说明乡村富人开始关心公共事务了；另一个可能村委会主任的岗位的确有含金量，捐出 2000 万元可以获得更多的回报。”

可从该期的那两篇报道不难看出尽管文中的富豪关心公共事务，但归其根本原因还是党国英所提到的第二点可能，这些积极参与政治的富人们即使不是为了个人通过政治行为获取经济利益，也是为了贯彻作为一个阶级的有产者的统治意志。如报道中所述，王文选是因收购煤气厂和煤气管道铺设问题遇阻，他需要通过竞选获胜来用权力清除障碍，而且该村能获得巨额土地租用费用。王富豪当选后可以轻而易举地“赚回”选举成本。河南那名煤老板则看中的是裴寨村下上亿元的煤矿资源。也就是说富豪竞选村官为哪般？——就是为了钱，为了资本的扩张！

正如卢森堡提到过的，“政治权力是实现经济利益的工具，除此无他。”所谓“富人们”参政议政的积极性其根源就是如何使用“政治”工具实现“先富”这一个根本目标。当“中共”当局一边仍然在使用官方教科书教导学生说西方资产阶级国家的民主是“金钱民主”

而大肆批判资产阶级民主时，同时自己也大力推行“金钱选举”，任由“学术吹鼓手”和官方杂志吹嘘“富人政治的必然性”。由此可知，所谓“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下推行的“基层民主选举”根本就“金钱民主”！

官方杂志《红旗文稿》2009 年第二期里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副所长房宁撰文高唱《民主还是中国的好》。《理论前沿》批判“民主的”美国目前有百万富翁超过 800 多万而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多达几千万同时；绝口不提中国农村低收入人口即使按中国的官方标准达到 4320 万人，若按世界银行每天人均 1.25 美元的“国际标准”计算，则要近 3 亿人口处于国际贫困标准线之下。根据 2006 年统计，中国最富有的 0.4% 的家庭控制着超过全国 60% 的财富（与此同时美国的比例不过是 5% 的家庭控制着全国 60% 的财富）；3000 多名亿万富豪中，2900 多人竟是中共及政府高官的亲属与子女。而“人民代表大会”与“政治协商会议”两个“橡皮图章”机构中所谓的“人民代表”与“政协委员”中，先富起的来的“知本家”与“民营企业主”不知凡几，而真正的工人与农民又有几位？

1850 年马克思在《新莱茵报》上发表评论说：“民主是什么呢？它必须具备一定的意义，否则它就不能存在。因此，全部问题在于确定民主的真正意义。如果这一点我们做到了，我们就能对付民主，否则我们就会倒霉。”

民主本身是一种人类社会文明的制度工具，绝非什么“洪水猛兽”。但资产阶级尤其是那些老牌帝国主义国家致力于宣传所谓“完美的议会民主”并进行广泛的宣传以灌输“市场”和“民主”是孪生兄弟的假象。在现实中资产阶级对“民主制度”完全采用的是实用主义的态度。假如民主政治可能威胁到他们的利润和权利的时候，他们就会随时准备抛弃“民主制度”而转向专制独裁。马克思、列宁和托洛茨基都曾经清楚地描述过英国和法国对于他们在印度、东南亚和非洲的殖民地从来没有给予过一丝民主。而即使在当今时代，所谓“民主的”美国曾经于 1965 年支持印尼的苏哈托的政变，1973 年支持智利皮诺切特的政变，以及如今仍然极端不民主的沙特阿拉伯当局。

正如托洛茨基曾经所说明的，资产阶级为了统治随时准备或者“计人头”（议会民主）或者“打破头”（军事专制或者法西斯专制）。这一关于民主真相的基本想

法其实也是新自由主义的主要观点，如自由主义“大宗师”哈耶克就反对将“民主观点教条化”，反对“将如今多数人的观点视为政府统治合法性的唯一准则”（《经济自由与代议制政府》（Economic Freedom and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尤其是哈耶克和他的信徒最为反对民选政府对于经济的干预，例如限制资本家获取利润的能力。所以，哈耶克并不反对如果民主制度转向错误的方向，也就是反对资本家的利益的时候，必要时“应该终结”民主制度，

只要可能的情况下，资产阶级愿意选择“民主”制度，因为相对而言运营成本较低——军事警察专制需要消耗大量的资源，官僚和军官们会为自己谋取权利带来的利益。同时资本家也希望能有一套“监督和权衡”的制度以确保国家机器不会因为拥有过大的权力而失去控制，如智利皮诺切特时代或者穆萨拉夫控制下的巴基斯坦。即使是在那些发达的工业国家或者地区，当面临威胁到“资本主义体系的生命”的时候，资产阶级不会因为舍弃民主制度转而选择皮诺切特或穆萨拉夫而在道德上有什么两难。而真正阻止他们这么做的往往不是什么民主原则而是工人阶级的力量与斗争意志。历史上事实是工人运动、工会、女性组织和工人的政治党派在为普选、女性的政治权利、集会自由和罢工自由等基本民主权力斗争。

而在作为一个政治实体的国家中，所谓国家的民主制度体现的也无非是这个国家中统治阶级的意志和社会中阶级力量的对比。早在古希腊城邦时代，就存在“奴隶主民主制”，但这种民主只存在于也只可能存在于作为统治阶级的奴隶主阶级之中，与人口中的大多数一奴隶一实无多大关系。难道奴隶主会与奴隶共享“民主体制”进行集合意志表决吗？今天的“资产阶级民主”固然是要比“奴隶主民主”进步不少，那也是由于强大工人运动的存在而带来的结果。

虽然披上了一层“咸与民主”与“一人一票”的外衣，但综观历史却不难发现，资产阶级国家制度下的民主最终体现的还是统治阶级——资产阶级——的意志。无论是国会也罢、全民公决也罢，莫不如此。就以美国为例，经济危机袭来，两院决议通过的上万亿各种援助方案首先还是用在大银行金融集团之中，数百万损失惨重乃至无力偿还房屋贷款而被迫流离失所的普通民众早已放在等而次之的位置。

而且即使今天“西方民主制度”所有的“进步”成果实质上也都是数百年来工人与底层群众努力奋斗得来的。若没有欧洲工人前仆后继的社会运动与革命，恐怕普通“无产无恒心”的劳动者是享受不了“一人一票的”全民普选权；若没有美国内战，恐怕美国黑人也无从实现其投票权，但即使被奴役的黑人已被明文“解放”，却在实践中也很难实现，否则何来上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若没有全世界妇女的积极抗争与北欧和苏俄的妇女斗争率先争取到妇女选举权，资产阶级政府们何时会主动让女性与男性在政治权力真正平分秋色？

资产阶级民主与无产阶级民主终归不是一回事，无论罩上多少“普世价值”与“人权至上”的政治外衣，其内里的实质还是经济不平等与“权贵统治”。而最近，原本挂着“无产阶级专政”外衣实质是“官僚党阀专制”的中共数十年来的开放之果也就是吸收所谓的“西方先进文明”的过程，搞出的李代桃僵的“基层民主”，民众基本权利尚未享受一二，但“金钱民主”之弊却已大行其道。而“党国精英”们更是迫不及待地的喊出了“没有自由的私有经济，就不可能有民主。”恐怕就差堂而皇之诉求“民主政治就是富人有、富人治、富人享的政治（Democracy is the government of the Rich, for the Rich, by the Rich）”。

早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共产党创始人李大钊先生就在《平民政治与工人政治（Democracy and Eegatocracy）》和《平民主义》两文中清晰阐述了不同阶级的民主制度差别和民主的本意。正如李先生所说的，“纯正的‘平民主义’就是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一切特权阶级，完全打破，使人民全体，都是为社会国家作有益的工作的人，不须用政治机关以统治（GOVERNMENT）人身，政治机关只是为全体人民属于全体人民而由全体人民执行的事务管理（ADMINISTRATION）的工具。...只有无产阶级的平民政治才是纯化的平民政治，真实的平民政治，纯正的平民政治，”

本来是近百年前，先驱们早已理顺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概念与事实。但到如今，却被今天这帮堕落无耻而又披着“中共”外衣的“富人帮闲”们故意搞得糊里糊涂，如坠云雾之中。若细细分析其实本也不奇怪，30年来的所谓“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本质上不过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卷土重来而已；既然如此，那么所谓“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基层民主”到底是什么东西也就一目了然，其最终走向无非与“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同流合污，一丘之貉。但今天鉴于“官僚专政”和“权贵统治”之需要，就连这种“虚情假意、半真半假、粉饰太平”的民主还只是“帮闲们”口中的“建设目标”，不过党国英之流毕竟已经喊出了某些人的真心话——“资本主义民主万岁！”

此辈孜孜以求而“毁人不倦”，胡说八道什么“老百姓绝不会选一个穷人当社区领袖”，且不说历史事实与此相差何止千里。但就今天中国那伙子“先富代表们”到底是些什么货色？即使在现在如此“亲富和崇富”的环境之下也纷纷陷入牢狱之灾，看看那些富豪的贪婪无度下流无耻的“创新能力与光辉业绩”，也就一目了然了。其实事实是清晰明了的，现存于中国及世界上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制度”根本无法真正表达什么‘全民的集合意志’，最终体现的无非是处于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意志。只有由劳动者和底层群众掌握经济与政治权力，选举产生自己真正的代表，砸碎资本主义捆绑无产者劳动奴隶的铁链，并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才能实现真正的民主！

历史回顾 Historical Review

纪念卢森堡与李卜克内西遇难90周年

——罗莎·卢森堡震撼人心的革命遗产

彼得·塔菲 (Peter Taaffe)

英格兰和威尔士社会主义党 ——工人国际委员会 (CWI) 英格兰和威尔士支部



1919年1月15日，德国工人阶级最优秀的大脑和最伟大的英雄——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为嗜血惨败的德国军方所杀害。懦夫般的社会民主党领导人诺斯克 (Noske) 和谢德曼

(Scheidemann) 却在背后支持了军方这一无耻的罪行。在今天这一重要纪念日里我们很有必要重新审视罗莎·卢森堡留给我们震撼人心的革命遗产。

那些杀害他们的人，其中士兵奥托·兰格 (Otto Runge) 具体执行了谋杀，不仅对于德国革命的失败是具有决定性，而且也与 14 年后希

特勒和纳粹党的胜利有着密切联系。协助杀害罗莎·卢森堡的凶手逃跑的海军军官威廉·卡纳里斯 (Wilhelm Canaris) 20 年后掌控了纳粹控制下的德国军事情报部门 Abwehr。许多其他纳粹政权的重要人物当时也同样“嗜血成性”，并在未来将这种行为加诸于自己的国家和整个欧洲。当时曾经欺骗新成立的工人和士兵委员会代表的冯·法鲍尔 (Von Faupel) 在 20 年后成为希特勒驻佛朗哥统治的西班牙的大使。为保皇派将军所熟知的代表人物少校库尔特·冯·施莱歇尔 (Kurt Von Schleicher) 在 1932 年担任德国总理，并成为希特勒以

及纳粹的领路人。假如德国革命取得胜利，那么历史也许就不会记录下由这些声名狼藉的法西斯主义分子所犯下恐怖罪行。罗莎·卢森堡假如没有被残酷地杀害，作为德国工人运动的领导人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随后直至 1923 年的各种事件和革命胜利中就可以发挥即使不是决定性的、也将是至关重要的作用。

卡尔·李卜克内西，一位英勇的群众领袖，与罗莎·卢森堡站在一起反对德国的战争机器和淌满普通士兵鲜血的堑壕战；不仅对于德国人、对于法国人和其他国家的国

民，他都是一位不知疲倦地反对一战的工人阶级国际反对派。他著名的口号——“主要敌人在自己国内”——燃起了群众的反战的情绪，尤其是当战争中尸体堆积如山之时。

但是在此纪念日更应值得特别注意的是罗莎·卢森堡，因为她对于马克思主义思想和理论的理解以及为此在实际工人阶级运动中的应用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许多人攻击罗莎·卢森堡的“错误路线”，特别是所谓她缺少对“革命政党”和组织的必要性的认识。历史上进行这些攻击的人包括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者。而其他一些人声称罗莎·卢森堡是他们“自己人”，则是因为她强调“工人阶级的自发作用”似乎符合“反对建党的情绪”；尤其是年轻一代之中，这是对于斯大林主义官僚遗产及与其相呼应的前社会民主党感到厌恶而带来的产物。但是全面分析罗莎·卢森堡的思想，并充分考虑她思想成熟和发展的历史环境，则证明了这两种说法都是错误的。

她犯过错误，“假如你能给我举出一个从未犯过任何错误的人；那么我会证明你是个笨蛋。”然而即使在近 100 年后的今天，我们阅读她的主要著作，仍然可发现它们是如此鲜活，与现实具有相关性——尤其将之与“现代”劳工运动中陈旧的上层思想比较之时。它们可以启发我们，特别是对于正走向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新一代。

举例来说，她的小册子《社会改良还是革命？》并非是简单地阐述马克思主义思想，同时包含对于改良主义的反对和渐进式的改良变化对于社会主义转变的影响。它是用来反对主要的“修正主义”理论家爱德华·伯恩斯坦。伯恩斯坦正如今天众多的劳工运动和工会领导人一样，虽然最初他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且还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共同创始人恩格斯的朋友，但在 19 世纪 90 年代后期和 20 世纪初期经济繁荣的压力下，伯恩斯坦企图“修改”一些所谓已经不再起作用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他著名的格言“运动就是一切，没有最终目标”代表

了那个阶段德国社会民主党试图和正在扩张的资本主义进行调解的思潮。

正如列宁和托洛茨基所做的一样，罗莎·卢森堡不单驳斥了伯恩斯坦的思想，而且其精辟的分析不仅有助于我们对当时资本主义制度的理解，并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助于我们对于今天资本主义制度的理解；并帮助我们认识改良与革命之间的关系（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出发，这两者之间不应该是互相对立的）和许多其他问题。她写道：“最好能证明伯恩斯坦理论错误的恰恰是在那些著名的“调节手段”——即信贷、完善的交通、托拉斯——得到最大发展的国家中，最近的危机（1907-1908 年）是最具有暴力性的。”而在当今世界性经济危机的阴影之下，这难道不正是如今深受债务影响的美国 and 英国经济的写照吗？

社会民主党支持战争

此外，罗莎·卢森堡是极少数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就认识到德国社会民主党意识形态蜕化的人之一。它最终导致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国会中的议员做出灾难性的行为——只有卡尔·李卜克内西一人例外——投票支持德国帝国主义的战争预算拨款。社会民主党和工会领导人已经习惯于在资本主义框架内进行妥协和谈判。这意味着社会主义的前景，特别是社会主义革命，在他们的意识中被推迟到不可知的未来时间。

这一思潮也为社会民主党在德国社会中权重的日益增加而逐渐加强。到 1914 年事实上社会民主党已经成为“国中之国”，成员人数超过 100 万，拥有 90 家日报、267 名全职记者、3000 名从事体力劳动和文员的工人、经理、商业主任和代表。此外，它在国会中拥有 110 多名议员以及 220 名州议会议员，和近 3000 名当选的市议员。除 1907 年，社会民主党看起来在选举中一直取得巨大成就。在工会里至少有 1.5 万名全职官员听命于社民党。用路德·费舍(Ruth Fischer)，未来的德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说到

“这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作为个体的工人生活在党内，党已经渗透到工人日常习惯之中。他的思想、他的反应、他的态度由他个人特性与集体综合而成。”这既是优点也是缺点。优点是因此社民党和工会在工人阶级内日益增长的力量得以体现。但是这也导致对群众中巨大活力的窒息，而社民党领导人对这一力量也有所低估，并使他们事实上开始日益敌视将在未来某一天不可避免会爆发的革命。

相较于 1905-1907 年的第一次俄国革命所带来的巨大社会爆炸效应，罗莎·卢森堡逐渐认识到社民党的保守，并与之笨拙的政治机器发生冲突。卢森堡是一个真正的国际主义者，她参与了三个国家的革命运动。最初作为波兰人，她是波兰王国社会民主党(SDKP)的创始人之一，在俄国运动中又成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RSDLP)的参与者，作为一名归化的德国人也成为德国社民党的重要成员。对比来自俄国的第一手目击资料中下层的力量和能量，她已经认识到德国政党和工会中日趋增强的官僚机器，在未来革命爆发之时，将可能成为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一个巨大障碍。

在这个层面上她甚至比列宁更有远见。列宁热情地投入到俄国运动中，他认为德国社民党是所有第二国际成员的“模范”，将其领导人如考茨基看作导师。托洛茨基指出：“列宁认为考茨基是其导师并尽可能地到处强调这一点。列宁在那个期间以及随后的若干年内的著作中，人们不能找到任何针对倍倍尔——考茨基进行原则性批判的踪迹。”事实上列宁认为罗莎·卢森堡日益针对考茨基和德国社民党领导层进行的批判有些夸大其词。在 1905 年列宁在名著《俄罗斯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中写道：“我在什么地方和什么时候曾经把‘倍倍尔和考茨基的革命主义’叫作机会主义？……究竟在什么地方和什么时候我同倍倍尔和考茨基两人间有过哪怕微小的意见分歧？……国际革命社会民主党在一切重大的纲领问题和策略问题上完全一致，这是绝对无可争辩的事实。”

列宁认识到在工人阶级的群众性政党中存在机会主义倾向，但是他没有将俄国的孟什维克与考茨基主义进行比较，而是与伯恩斯坦的右翼修正主义进行比较。这一情况一直持续到德国社会民主党于

1914年8月4日赞成战争拨款的臭名昭著的投票。除了最初的李卜克内西和此后的奥托·儒勒(Otto Rühle)两人投了反对票外，110名德国社民党代表中的其余代表都投了赞成票。事实上当列宁在社民党报纸《前进》(Vorwärts)上看到其支持战争，他首先认为这是由德国军事人员伪造的。罗莎·卢森堡并不是毫无准备，因为她已经投入到长期的斗争中，她不仅仅与右翼社民党领导人进行斗争，而且也与“左翼”和“中派”如考茨基的理论进行斗争。

托洛茨基也在其第一次提出不断革命论的著作《总结与瞻望》(1906年)中预见这一状况可能发生：“在欧洲各国社会主义政党当中，首先是在其中最大的政党德国社会民主党中随着广大群众转向社会主义并变得愈来愈有组织和有纪律，党内保守主义也愈来愈发展了。结果是，作为体现无产阶级政治经验的组织的社会民主党，可能在某个时刻成为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反动派之间公开冲突的直接障碍。”在后来他的自传《我的生平》中托洛茨基写道：“我不曾期望第二国际的正式领袖在战争期间能有任何重大的创举，但我也万万没有料到社会民主党居然能对本国军国主义者奴颜婢膝。

自发的群众行动

社会民主党的所具有的巨大力量，一方面使得它在德国和欧洲面临迫在眉睫的急剧变化时保持头重脚轻的官僚机构的惯性，另一方面则导致罗莎·卢森堡写作了其最著名的作品《群众罢工、党和工会》(1906年)。在该书中罗莎卢森堡总结了关于第一次俄国革命政治和组织上的观点结论。它深刻而有趣地分析了在革命进程中群众作为推动力的作用和其“自发性的”特征。它强调工人阶级的独立运动和工人阶级反对“官僚作风”的意愿，就

广泛的历史意义上而言，她无疑是正确的。

事实上许多革命都是在面临反对者的口头攻击甚至在工人自己组织的领导人破坏组织的情况下发生的。这同样可在1936年的西班牙革命中看见。当马德里工人最初进行武装示威，他们的社会主义领导人拒绝支持他们的时候，巴塞罗那工人——摆脱领导人的限制——自发起来在48小时内粉碎了佛朗哥部队。它引发了席卷从加泰罗尼亚经阿拉贡直到马德里的社会革命，最初阶段五分之四的西班牙为工人阶级所控制。另一方面1973年在智利当皮诺切特宣布政变时，由于工人阶级服从自己领导人的话而继续待在工厂里，那些最进步的工人被系统性地围捕和屠杀。

我们同样也看到由于没有向领导人申请“准假”，当1968年时一个自发的革命在法国爆发的时候，一千万工人占领了工厂达一个月之久。法国共产党人和“社会主义”联盟的领导人没有企图寻求通过一个工人委员会和工农政府的革命性纲领赢得胜利，而是使出他们所有的努力以破坏这个宏伟的运动。同样地1974年在葡萄牙，一场革命不仅结束了卡埃塔诺

(Caetano)的独裁统治而且在其第一阶段绝对多数人在选举中都站在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旗帜下。这导致在1975年国家没收了大部分工业。英国《泰晤士报》曾宣称“资本主义在葡萄牙死了”。不幸的是事实证明并非如此，因为来自下层工人阶级的主动和他们所产生的机会被浪费掉了。因为没有连贯性和影响力的群众政党和领导层将它们结合起来建立一个民主的工人国家。这些例子表明在残酷的反对资本主义斗争中工人阶级自发运动本身不足以保证胜利。

1918年11月德国革命的“自发”性质很明显。这种群众自发的革命爆发超越了社会民主党领导层所希望或期望的事情。如同主要的修正主义者伯恩斯坦，即使在1917年从德国社民党分裂出来独立社会民主党(USPD)的产生也并不源自其领导人，如考茨基和鲁道夫·希法

亭的任何有意识的决策。它的发展是因为工人阶级对德国社民党领导扼杀党内异议并支持战争的愤怒和反抗。“反对派”既没准备也不期望进行这个分裂。然而他们却与12万名党员和一些报纸分离出来。

总罢工

与罗莎卢森堡强调的“自发性”联系的是总罢工问题。在基于俄国革命的群众罢工这个问题上她采取了相当被动和宿命论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这影响了在她死后的德国共产党(KPD)领导人。但罗莎·卢森堡正确地强调了，革命不能在客观情况未成熟之时人为制造出来。

同时被马克思主义者称之为“主观因素”的群众政党和富有远见的领导等等的作用对革命形势转变为一场成功的革命非常重要。一个能成功的推翻现存社会制度的机会只可能持续很短的时间。如果这次机遇丧失了，它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会出现，工人阶级可能遭受失败。因此在一个关键时刻和一个明确的时间框架内，一个正确的领导层完全可以帮助工人阶级夺取政权。这就是在1917年俄国革命中布尔什维克所起到的作用。

1923年的德国革命是个反面例子。类似于布尔什维克曾经成功的机会已经形成，但由于德国共产党领导人的犹豫不决和包括斯大林在内等人对此政策的支持使机会白白丧失。这来源于之前的历史经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数十年内，‘不完全的总罢工行动’是工人阶级斗争的特征。在此期间，有不少例证表明政府在面对总罢工发生之初就惊慌失措，从而在群众还没有发起公开的阶级冲突之时就作出了让步。1893年比利时总罢工就是如此，当时由比利时工党号召的总罢工动员了30万工人参加，其中还包括天主教左翼团体在内。1905年10月的俄国发生了比这规模更大的总罢工，罗莎·卢森堡曾经评论过这场运动。在罢工的压力下，沙皇政府1905年就被迫修正宪法作出“让步”。

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状况——革命和反革命的形势——与之截然不同，伴随总罢工提出的是更为尖锐的政权问题。总罢工对马克思主义者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但我们不应迷信总罢工。在某些情况下，它是一个不恰当的武器；在1917年8月科尔尼洛夫叛乱时，无论是布尔什维克还是苏维埃（工人委员会）都没有认为应该宣布总罢工。相反铁路工人继续工作以便能够运送反对科尔尼洛夫的力量，并让科尔尼洛夫部队所坐火车出轨。除了上战场打击科尔尼洛夫的人外，工人们也继续在工厂里工作。同样1917年十月革命时也没有提出举行总罢工；布尔什维克得到了群众的支持，在这种条件下呼吁举行总罢工只会削弱自己而不是资本主义敌人。在铁路、工厂和办公室里，工人协助起义以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并建立了一个民主的工人国家。

在今天的时代，总罢工通常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问题，寓意着建立工人政府的选择。在1926年英国总罢工中，政权问题被提出，而且“双重政权”存在了九天。1968年在法国，历史上最大的总罢工也提出了政权问题但由于前述的原因，工人阶级没有抓住这个机会。

1918年至1924年的德国革命也见证了数次总罢工并部分试图朝这个方向（夺取政权的方向）发展。在1920年3月发生卡普政变，在当时代表容克的普鲁士地主和高高在上的帝国公务员在将军们的支持下掌握政权，但它却遭遇了历史上最完全的总罢工之一。如同1968年法国，政府“甚至无法印刷一份公告”，因为工人阶级瘫痪了政府和国家。而这一政变持续了100小时！然而即使工人阶级展示了如此惊人的力量，但它并没有导致向社会主义的转变，恰恰就是因为缺乏一个群众性政党和它的领导层以动员群众并建立一个民主的工人国家。事实上，罗莎·卢森堡的追随者在新成立的共产党中犯了极左错误，他们在最初阶段并不支持群众运动打击卡普政府。

革命政党的作用

领导层问题和建立政党的必要性贯穿于罗莎·卢森堡生活和工作的始终。有些对她的片面指责，就是批评她和托洛茨基“低估革命政党的必要性”。事实上，罗莎·卢森堡在社民党的整个政治生活中就一直是为了挽救这个组织内部的革命核心内核并使之远离改良主义和集权主义。此外她自己与雷欧·约基希斯（Leo Jogiches）一起在波兰建立了一个非常“严格的独立的政治组织”，一个独立的政党。但是由于她对于社会民主党内所存在的僵化与“集权”的厌恶，使得她有些时候反而“避之过甚”。她就曾经指责列宁试图在俄国建立一个民主政党的企图而认为它过于“集权化”。

关于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的分裂，罗莎·卢森堡曾经以她的方式作为一个“调和者”，就如同托洛茨基一样（他参加了“八月集团”）。她尝试团结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但布尔什维克1912年获得五分之四有组织的工人支持而决定与孟什维克正式分裂；列宁比其他人都更早明白孟什维克没有准备将斗争超出俄国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框架。列宁的观点为俄国革命所证实，孟什维克最终走到了阵营的另一边。在1917年的俄国革命之后，罗莎·卢森堡如同托洛茨基一样逐渐接近布尔什维克主义并成为其国际力量的一部分。

然而罗莎·卢森堡应负的主要责任是她没有充分组织一个具有清晰政治意识的力量反对社会民主党右翼和考茨基的“中派主义”。当时和之后都曾有人批评罗莎·卢森堡和“斯巴达克斯派”的支持者应该立即与社民党领导人决裂，尤其是当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背叛的时候。事实上，一旦列宁确信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背叛——包括“叛徒考茨基”——就已经呼吁立即决裂，并伴之建立新的第三国际。无论对于德国社民党的右翼还是“左”翼，政治上的决裂毫无疑问是必要的。罗莎·卢森堡这样做

了，将德国社会民主党视作一具“腐烂的尸体”。

至于组织上的结论与其说是原则问题不如说是战术问题。而且面对历史问题的“事后诸葛亮”并不见得高明。罗莎·卢森堡面临着与俄国布尔什维克完全不同的客观环境。由于布尔什维克大部分历史处于地下，而且是一个相对较小的由骨干组成的组织，其必须要求高度“集中”，但同时也没有放弃强有力的民主程序。而且俄国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有一个非常纷杂的历史，有过反对民意党和恐怖主义思想的斗争，有过1905年和1917年革命，有过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分裂，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等等。罗莎·卢森堡面临一个完全不同的情况，在一个“合法的”群众性政党内部作为少数派而相对孤立地存在着。

虽然她已经是一名归化的德国公民，但卢森堡仍然被认为是一个“局外人”，尤其是当她与社民党领导发生冲突时。尽管这样，当任何人阅读罗莎·卢森堡数年来的演讲和对党领导层的批判时，仍然能感受到她的勇气和光芒四射的毅力。她批评“白痴般执着于国会选举”，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选举至上主义”。她甚至与日益“只能用右耳听话”的中派领导人倍倍尔割裂。有次她和克拉拉·蔡特金一起，她对倍倍尔说：“是的，你可以撰写我们的墓志铭：‘这里躺着德国社会民主党最后两个男人’。她用一句精妙绝伦的格言惩罚了社会民主党中支持如今“联盟主义”的中产阶级领导人，“为进步乃至自由而行动，而不是与‘进步党人’和‘自由党人’一起行动。”

但是罗莎·卢森堡或她的支持者在马克思主义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即通过坚实的组织或政党发挥政治影响力的方面，没有进行充分发展。这并不是说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独立建立“政党”。但强有力的组织核心对于为将来的准备是极其必要的。而卢森堡没有实现这一目标，这对随后爆发德国革命产生了严重的后果。罗莎·卢森堡和雷欧·约基希斯正确地反对“不

成熟的分裂”。罗莎·卢森堡写道：“作为一个小的派别或者一小批志同道合者而离开总是可能的；任何人不想留在那里，自然也可以建立一个新的小派别或者新的一批志同道合者。但是以为依靠出走就能使得整个工人阶级可以摆脱强大而危险的资产阶级的禁锢而获得解放是不切实际的白日梦。

在群众组织中的工作

在群众性政党内进行长期活动的路线是完全正确的。这也是当初战斗派（Militant）如今社会主义党（SP）的策略；1980年代它在英国工党内得到了成功的发展。战斗派（Militant）可能自从国际左派反对派发展以来至少在西欧地区建立了最为强大的托洛茨基主义阵地。

这一路线——在某一个历史阶段具有正当性——但在另一个阶段，随着情况发生变化，尤其是当革命浪潮突然爆发之时，将可能会是历史性的错误。但罗莎·卢森堡和约基希斯争取尽可能在社会主义党内进行组织活动不能说是错误的，从这一点出发，才有后来独立社会民主党（USDP）的建立。事实上，列宁在俄国革命胜利之后急切地要求（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人）建立群众性共产主义政党而从社会主义组织中彻底分离的想法有时显得操之过急而不够成熟。1920年最初他提议法国的共产党人应该从法国社会党中迅速分裂出来，但同年由于阿尔弗雷德·罗萨姆（Alfred Rosmer）在莫斯科建议马克思主义者需要更多的时间来赢得大多数以加入第三国际的主张之后，列宁也就改变了他的主张。

即使是列宁虽然在1914年8月社民党的崩溃与叛卖之后提议从第二国际分裂出来组建第三国际，但他也表示如果事情没有如他所设想的那样发展，他也准备修改他的立场。举例来说，在关于第三国际的问题上他写道：“在不久的将来将会显示建立一个新的马克思主义的国际的条件是否已经成熟……如果这些条件没有到来，这将表明为了消除不良的影响仍然需要或长或短的继续的演化。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党将是旧国际内的极端反对派——直到能在不同国家内代表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工人协会的基础已经形成。”当1917年2月俄国革命洪水的闸门被打开之时，当群众真正登上了政治舞台之时，布尔什维克——尽管他们之前的历史经历——在苏维埃也只有大约1%支持率，即使到1917年4月也只有4%的支持率。

罗莎·卢森堡和约基希斯的真正的弱点不是在于他们拒绝分裂。而是在整个之前的历史阶段内虽然卢森堡在德国社民党内工作超过10年，但他们却没有在党内组织一个有清晰倾向的思想派别为今后的革命爆发作好准备。同样的指控——具有更充分的理由——也可以用于今天那些在更为广泛基础建立的政治组织和新的政党内活动的左派乃至马克思主义派别。他们往往不能在政治上辨别改良主义者或中派领导人。在意大利，重建共产党（PRC）内的曼德尔派（现在他们在PRC外建立了Sinistra Critica组织）是贝尔蒂诺蒂（Bertinotti）“多数派”的支持者，直到他们被逐出重建共产党。社会主义工人党（SWP）的德国组织（原“Linksruck”，现在的“Marx21”）在德国左翼党（Die Linke）内采取类似的政策而无法得到充分地成长。

政治上罗莎·卢森堡没有采取这样的行动，但她也并没有如列宁一样在组织上有所作为，没有准备经过锻炼的干部和建立今后可能的群众性组织的框架，而为德国之后发生的各种事件做好准备。关于这方面可见列宁对于罗莎·卢森堡于1915年发表的手册《尤乌斯提纲草案》。列宁一方面承认这是一本“极好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但同时他认为在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问题上，不应将帝国主义战争本质与民族解放战争的合理性混淆在一起。虽然列宁赞扬了卢森堡的小册子，但他评论道“在我们的脑海中这部作品来自于一个孤立的人[当时他并不知道罗莎是这本书的作者]，他没有在一个非法组织内拥有真正的同志可以设计真正的革命口号，并利用他们的结论和精神来系统性地教育群众。”

列宁和罗莎·卢森堡之间也有所不同。列宁系统性地训练和组织俄国最先进的工人们以坚决反对资本主义制度和它在工人运动中的影响。这不可避免地要明确组建一个团体，“政治派别”——它基于坚定的政治原则而组织起来。列宁之所以组织这一团体是为未来的战斗包括革命而进行的准备。

罗莎·卢森堡在第二国际所有的代表大会中都是重要的人物，并且代表流亡中的波兰社会民主党进行投票。她同时也是社会主义国际局的成员。然而正如皮埃尔·布洛（Pierre Broué）所指出的：“她除了拥有一小批围绕在她身边的朋友和支持者外，从来没有能够在德国社民党内建立起一个稳定平台，无论是一份报纸、一本杂志还是一群稳定的听众。”

然而日益增长的反战情绪扩大了罗莎·卢森堡和斯巴达克斯派的支持者与联系人。托洛茨基总结了当时她所处的两难困境：“最值得注意的是罗莎对于劳工运动所赋予的历史性和哲学化的期望——即为挑选（工人）先锋队而进行准备；与在实际中期待在未来发生大规模的群众性行动之间所存在的现实落差；而列宁则从未以未来即将发生（群众性）行动的奇迹而安慰自己，而是矢志不渝地挑选先进工人并持续不断地以他们为坚强核心并使用明确犀利的政治纲领来组建合法的或不合法的，群众性的或地下的各类组织。”但是1918年十一月革命后罗莎·卢森堡也开始了她挑选骨干的“热情工作”。

工人民主的纲领

此外，罗莎·卢森堡提出了非常明确的意识形态任务：“现在的选择并非是在民主与独裁之间作出选择。这一问题已经被置于历史进程之中：是资产阶级民主还是社会主义民主——就是社会主义阶段下处于无产阶级专政中的民主制度。无产阶级并不意味着炸弹、屠杀、暴乱和其他任何资产阶级代理人所说的混乱无政府状态”。这也就是对于那些任意扭曲马克思所提及的“无产阶级专政”概念的人的回答；

对于今天的世界而言，正如卢森堡所说的，（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意味着工人民主。但是由于斯大林主义赋予了它歪曲的含义，所以今天的马克思主义者为了能真正接近最优秀的工人，而不再使用这一词汇以免给所追求的未来世界提供错误的描述。这是如此不幸，包括“无产阶级专政”在内，众多的词汇如今被与斯大林主义相联系起来。基于同样的想法，我们如今提出的口号是建立一个以工人民主为基础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系。

德国革命不仅推翻了帝制而且以俄国革命的方式通过工人与水手委员提出了建立工人政府的萌芽。双重政权的时期开始了，资本家们被迫向群众做出巨大让步，如同意一天8小时工作制。但是社民党领导人如古斯塔夫·诺斯克（Gustav Noske）和菲利普·谢德曼（Philipp Scheidemann）却与资本家们以及反动的自由军团（法西斯主义组织的前身）进行密谋以实施反攻倒算。当时领导德国军队的威尔海姆·格隆纳（Wilhelm Groener）将军后来承认：“军官团只能与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政府进行合作……埃伯特（Ebert）[社民党领袖]做出了他的决定……所以我们形成了反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联盟……当时不存在任何其他政党在群众中有足够的影响力，通过军队的帮助得以重建政权。”此后给予工人的让步逐步被破坏，反对“布尔什维克恐怖”、混乱、犹太人以及“血腥罗莎”的宣传喧嚣一时。如反布尔什维克联盟的一些组织形成了自己的情报机构并设置了如其创始人所说的“积极反共反谍组织”。

为了反对俄国革命所使用过的“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口号，诺斯克（Noske）的社会民主党提出“一切权力归人民”的口号进行动员。他们试图以此为手段削弱德国的“苏维埃”。“制宪会议”的概念被提出以取代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的通过全国苏维埃以建立工农政府的思想。然而不幸的是，由于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失去支持而得到迅速发展的中左翼却陷于一片混乱之中，而使得建立全德委员会运动的机会白白丧失。

群众的愤怒与不满通过1919年1月的起义得到充分反映。在所有的革命中都能发现类似的阶段，当工人阶级意识到他们本已赢得到手的权益被资本家们重新夺走而不得不走上街头。1917年7月俄国工人的抗议是如此，1937年西班牙革命期间加泰罗尼亚的五一运动也是如此。对于当时德国革命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我们已经在2008年11月（第123期）的《今日社会主义》月刊和2008年11月4日（第555期）《社会主义者》周报中作出了相关分析。

德国在1918年十一月革命之后2个月内所处的形势就如同俄国二月革命4个月后的在当年7月所处的类似的状况。这本身也说明了在这个阶段的德国的政治事态发展的速度。假如考虑到在那个阶段，柏林面临着与全国其他地区彻底的隔绝，那么这样一次挫折或者失败就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由于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遭到杀害使这一状况变得更为严重。这就好比在1917年7月的俄国列宁和托洛茨基同时遭到暗杀。两位通过思想和政治意志领导十月革命胜利的领袖被杀害了。列宁——就个人而言极为谦逊——也深知当时他自己重要的政治角色，因而采取了相应步骤躲藏在芬兰，以避免落入反革命的手中。

尽管保罗·利未（Paul Levi）等人敦促他们尽快离开柏林，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仍然留在城里，而之后带来了可怕的结果。毫无疑问卢森堡所具有的丰富政治经验对于今后避免错误，尤其是德国革命中发展的错误，是一个强有力的因素——尤其是针对极左翼而言。尤其是在震撼世界的1923年事件中，假如当时具有罗莎·卢森堡所拥有的对于群众运动的敏锐直觉和改变周边环境的能力，或许就不会犯下海因里希·布兰德勒（Heinrich Brandler）和德国共产党所犯下的错误。他们放任而丧失了推进工人阶级革命和世界历史进程转变最佳的一次机遇。

卢森堡与李卜克内西都应位列马克思主义的先贤行列之中。由于

罗莎·卢森堡在理论上的独特的贡献，她完全应该能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托洛茨基齐肩而立。那些将她描绘为布尔什维克和俄国革命的批评者的人完全是错误的。她为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工作而欢呼。她1918年写于狱中的书——对布尔什维克政权的批评——是处于隔绝中的产物。当从监狱出来后，她被说服没有出版，之后也没有尝试出版。然而即使在她最不正确的作品中，关于俄国革命和布尔什维克她仍然写道：“在历史性的一个小时内，一个政党贡献了它的勇气、革命的远见和一贯原则；列宁、托洛茨基和其他同志采取了正确的举措……他们的十月起义不仅从实际上挽救了俄国革命，而且也挽救了国际社会主义的荣誉。”只是那些对于有着英雄传统的布尔什维克怀有恶意的敌人在她死后传播了这份材料以试图分化卢森堡与列宁、托洛茨基、布尔什维克和俄国革命的关系。

卢森堡在反对波兰独立的问题犯了错误。她在区分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问题上也犯有错误（即使到了1914年7月她仍支持主张统一二者的机会主义者），并如列宁指出的在经济问题“资本积累论”上也犯有错误。但是列宁同样说过“尽管她犯过错误，但对我们而言她始终是一只鹰”。因此，今天最先进的工人和青年有必要好好研究她的作品为社会主义斗争作好准备。

*英文原文刊于《今日社会主义》（Socialism Today）2009年2月期，中文版为本社翻译。

历史回顾 Historical Review

【编者按】

本文为革命先辈李大钊先生写于90年前1919年3月，原文首先刊登于北京《晨报》，此文发布不到2月后，“五四”运动爆发，并诞生了中国第一批社会主义者和由他们所建立的团体与组织。90年了，今天的中国青年和上世纪初的中国青年虽有不同的环境，但仍然面对众多相同的问题与思绪。本社值“五四”90周年之际特刊此文以觐新一代的革命青年。“努力呵！猛进呵！我们亲爱的青年！”

现代青年活动的方向

李大钊



新世纪的曙光现了！新世纪的晨钟响了！我们有热情的青年呵，快快起来！努力去作人的活动！努力去作人的活动！

青年呵！你们临开始活动以前，应该定定方向。譬如航海远行的人，必先定个目的地，中途的指针，总是指着这个方向走，才能有达到那目的地的一天。若是方向不定，随风飘转，恐怕永无达到的日子。万一能够达到，也是偶然的機會。靠着偶然机会所得的成功，究竟没有很大的价值。

我今就现代青年活动的方向，稍有陈说，望我亲爱的青年垂听！

第一，现代的青年，应该在寂寞的方面活动，不要在热闹的方面活动。近来常听人说：“我们青年要耐得过这寂寞日子”。我想这“寂寞日子”，并不是苦境，实在是一种乐境。我觉得世间一切光明，都从寂寞中发见出来。譬如天时，一年有一个冬季，是一年的寂寞日子。在此时间，万木枯黄，气象雕落，死寂冷静，都是他的特色。可是那一年中最华美的春天，不是就从这个寂寞的冬天发见出来的么？一天有一个暗夜，也是一天的寂寞日子。在此时间，万种的尘嚣嘈杂，都有个一时片刻的安息。可是一日中最光耀的曙色，不是从这寂寞的暗夜发见出来的么？热闹中所含的，都是消沉，都是散灭；黑暗寂寞中所

含的，都是发生，都是创造，都是光明。这样讲来，这寂寞日子，实在有滋味，有趣意的日子，不是忍苦受罪的日子，我俩实在乐得过，不是耐得过。况且耐得过的日子，必不长久。一个人若对于一种日子总觉得是耐得过，他的心中，必是认这寂寞日子，是一种苦境，是一种烦恼，那就很容易把他抛弃，去寻快乐日子过。因为避苦求乐，是人性的自然，勉强矜持的心，是靠不住的。譬如孀妇不再嫁，若是本着他自由的意思，那便是他的乐境，那种寂寞日子，他必乐得过得到底。若是全因为受传说偶像的拘束，风俗名教的迫胁，才不去嫁，那真是人间莫大的苦境，那种寂寞日子，他虽天天耐得过，天天总有耐不得

跟着。乐得过的是一种趣味，耐得过的是一种矜持。青年呵！我们在寂寞的方面活动，不可带着丝毫勉强矜持的意思，必须知道那里有一种真趣味，一种真光明，甘心情愿乐得过这寂寞日子，才能有这寂寞日子中寻出真趣味，获得真光明的一日。

第二，现代的青年，应该在痛苦的方面活动，不要在欢乐的方面活动。本来苦乐两境，是比较的，不是绝对的。那个苦，那个乐，全靠个人的主观去判定他，本靡有一定标准的。我从前曾发过一种谬想，以为人生的趣味就在苦中求乐，受苦是人生本分，我们青年应该练忍苦的本领。后来觉得大错，避苦求乐，是人性的自然，背着自然去做，不是勉强，就是虚伪。这忍苦的人生观，是勉强的人生观，虚伪的人生观。那求乐的人生观，才是自然的人生观，真实的人生观。我们应该顺应自然，立在真实上，求得人生的光明，不可陷入勉强、虚伪的境界，把真正人生都归幻灭。但是，求乐虽是人性的自然，苦境总缘着这乐境发生，总来缠绕，这又当怎样摆脱呢？关于此点，我却有一个新见解，可是妥当与否，我自己还未敢自信。我觉得人生求乐的方法，最好莫过于尊重劳动。一切乐境，都可由劳动得来，一切苦境，都可由劳动解脱。劳动的人，自然没有苦境跟着他。这个道理可以由精神的物质的两方面说。劳动为一切物质的富源，一切物品，都是劳动的结果。我们凭的几，坐的椅，写字用的纸笔墨砚，乃至吃的米，饮的水，穿的衣，靡有一样不是从劳动中得来。这是很容易晓得的。至于精神的方面，一切苦恼，也可以拿劳动去排除他，解脱他。这一点一般人却是多不注意。一个人一天到晚，无所事事，这个境界的本身，已竟是大苦；而在无事的时间，一切不正当的欲望，靡趣味的思索，都乘隙而生；疲敝陈腐的血分，周满于身心，一切悲苦烦恼，相因而至，于是要想个消遣的法子。这消遣的法子，除去劳动，便靡有正当的法则。吃喝嫖赌，真是苦中苦的魔窟，把宝贵的人生，都消磨在这个中间，岂不可惜！岂不可痛！堕

落在这里的人，都是不知道尊重劳动，不知道劳动中有无限的快乐，所以才误入迷途了。青年呵！你们要晓得劳动的人，实在不知道苦是什么东西。譬如身子疲乏，若去劳动一时半刻，顿得非常的爽快。隆冬的时候，若是坐着洋车出门，把浑身冻得战栗，若是步行走个十里五里，顿觉周身温暖。免苦的好法子，就是劳动。这叫作尊劳主义。这样讲来，社会上的人，若都本着这尊劳主义去达他们人生的目的，世间不就靡有什么痛苦了么？你为何又说我们要青年在痛苦方面活动呢？此问甚是。但是现在的社会，持尊劳主义的人很少，而且社会的组织不良，少数劳动的人，所得的结果，都被大多数不劳动的人掠夺一空。劳动的人，仍不免有苦痛，仍不免有悲惨，而且最苦痛最悲惨的人，恐怕就是这些劳动的人。所以我们要打起精神来，寻着那苦痛悲惨的声音走。我们要晓得痛苦的人，是些什么人？痛苦的事，是些什么事？痛苦的原因，在什么地方？要想解脱他们的苦痛，应该用什么方法？我们不能从苦痛里救出他们，还有谁可能救出他们，肯救出他们？常听假慈悲的人说，这个苦痛悲惨的地方，我们真是不忍去，不忍看。但是我们青年朋友们，却是不忍不去，不忍不看，不忍不援手，把他们提醒，大家一齐消灭这痛苦的原因呵！

第三，现代的青年，也应在黑暗的方面活动，不要专在光明的方面活动。人生的努力，总向光明的方面走，这是人类向上的自然动机，但是世间果然到了光明的机运，无一处不是光明。我们在这光明中享尽人生之乐，岂不是一大幸事？无如世间的黑暗，仍旧遍在，许多的同胞，都陷溺到黑暗中间，我们焉能独自享受光明呢？同胞都在黑暗里面，我们不去援救他们，却自找一点不沾泥土的地方，偷去安乐，偷去清洁，那种光明，究竟能算得光明么？那种幸福，究竟能算得幸福么？旧时代的青年讲修养的，犹且有“先忧后乐”的话，新时代的青年，单单做到“独善其身”、“洁身自好”的地步，能算尽了责任的人么？俄国某诗人训告他们青年

说：“毁了你的巢居，离开你的父母，你要独立自营，保信你心的清白与自然，那里有悲惨愁苦的声音，你到那里去活动。”这话真是现代青年的宝训，真是现代青年的警钟。我们睁开眼看！那些残杀同胞的兵士们，果真都是他们自己愿做这样残暴的事情么？杀人果真是他们的幸福么？他们就没有一段苦情不平，为一般人所不知道的么？他们的背后，果真没有什么东西逼他们去作杀人野兽么？那些倚门卖笑的娼妓们，果真都是他们自己愿做这样丑贱的事情么？卖笑果真是他们的幸福么？他们就没有一段苦情不平，为一般人所不知道的么？他们的背后，果真没有什么东西迫他们去作辱身的贱业么？那些监狱里的囚犯们，果真都是他们自己愿作罪恶的事么？他们做的犯法的事，果真是罪恶么？他们所受的刑罚，果真适当他们的罪恶么？他们就没有一段苦情不平，为一般人所不知道的么？他们的背后，果真没有什么东西逼他们陷于罪恶或是受了冤枉么？再者巷里街头老幼男女的乞丐们，冻馁的战抖在一堆，一种求爷叫奶的声音，最是可怜，一种秽垢愤丧的神气，最是伤心，他们果真愿作这可耻的态度丝毫不觉羞耻么？他们堕落到这个样子，果真都因为他们天生的废材么？他们就没有一段苦情不平，为一般人所不知道的么？他们的背后，果真没有什么东西逼他们不得不如此么？由此类推，社会上一切陷于罪恶、堕落、秽污、黑暗的人，都不必全是他们本身的罪过。谁都是爹娘生的，谁都有不灭的人性，我们不可把他们看作洪水猛兽，远远的躲避他们。固然在黑暗的里面，潜藏着许多恶魔毒菌，但是防疫的医生，虽有被传染的危险，也是不能不在恶疫中奋斗。青年呵！只要把你的心放在坦白清明的境界，尽管拿你的光明去照澈大千的黑暗，就是有时困于魔境，或竟作了牺牲，也必有良好的效果，发生出来。只要你的光明永不灭绝，世间的黑暗，终有灭绝的一天。

努力呵！猛进呵！我们亲爱的青年！

工人斗争 Workers and Struggles

透视保定国有一棉（依棉）工人护厂抗争

梁闻道

“资本从来到世间，每个毛孔都滴着血与肮脏的东西。”

——K·马克思

本文基于从互联网络上收集到关于“依棉集团工人罢工护厂事件”、“香港中策集团”和“保定火车站改建”等相关信息和资料写就而成的。很遗憾由于无法联系到“国有一棉”的工人或相关知情者，而且限于能力、条件和时间的限制；所以文章的内容与观点最终都是建立在已有资料的逻辑推断之上，无法予以核实。所以笔者不敢说文章完全真实正确地反映了“依棉罢工护厂事件”的整个前因后果，但相信与最终的事实真相相距不会太远。希望读者在读完本文后能和作者抱有一个相同的信念：保定的工人阶级，我们与你们在一同斗争！

昭然若揭——香港中策的“画皮”

在这种（投机）赌博中，小鱼为鲨鱼所吞掉，羊为交易所的狼所吞掉。

——K·马克思

“依棉罢工事件”发生后国内外舆论哗然；但“依棉集团”的实际东家香港中策投资有限公司（China Strategic Holding Ltd 简称“中策”）表现十分奇特，在公开层面上超然地漠然置之，既无“驳斥谣言”的声明，也无董事会出面安抚员工；而只见前台的以汪丽娟为首的管理层和保定市政府忙得四脚朝天花样百出；当然是否“中策”忙于幕后迎来送往和上下其手，我们也未可知。

假如不了解“中策”的前世今生，就不会真正明白其中的玄妙。1990年代印尼华人企业金光集团的二号继承人黄鸿年收购一家香港的日本贸易公司创立“中策”集团。黄鸿年本人1960年代曾在北京26中读书，当过红卫兵，在山西短暂插队；后回印尼继承家业并赴美读书；本人对于中国国内情况颇为熟捻，结交颇广。

除金光集团为“中策”的大股东外，香港首富李嘉诚的和记黄埔、美国摩根斯坦利集团、日本依藤忠商事等均在“中策”集团内占有相当股份。自1990年代成立之始，中策集团就专门从事对中国大陆的国有企业收购。通常手法为廉价购买国有企业51%或稍多的股份，然后将几家企业重新打包海外上市或者转卖给其他跨国集团以牟取暴利。

1990年代中期，“中策现象”曾经名噪一时，并被官方和主流媒体吹捧为“国企改革引进外资的模范”。“中策”曾经在2年内收购300家国有企业。1994年“中策”购买北京啤酒厂，未过两年，即转卖给日本朝日啤酒公司组建北京朝日啤酒公司，而“中策”的股东之一日本依藤忠商事也恰恰就是朝日啤酒的母公司，如今北京怀柔出的“北京生啤”其实都是“北京产朝日

啤酒”。此后，“中策”仅仅在分别控制杭州橡胶厂51%和太原市双喜轮胎公司55%股份后，利用中国与西方会计准则的差别，以两厂的全部资产为基础组建“中国轮胎控股有限公司”，之后在北美上市销售给西方股民套现谋利数亿。

1993年，“中策”曾经一次“打包”收购泉州41家国有企业组建“中侨”集团，许诺注入资金2.4亿元人民币；但在收购不到两年注资不过2000万人民币后，就转手以2个多亿将“中侨”集团售给马来西亚华人企业“发林集团”，从中获利2亿元人民币。当然“发林集团”也非善男信女，在将优质资产（主要为地产）掏空后，2003年前后表示无力继续经营；经过2、3年的折腾，2007年，泉州市政府不得不出面重新将“中侨”集团收归国有，而此时“中侨”集团已经实质破产，数万员工被遣散或下岗数年，集团仅拖欠员工工资、社保和补偿金数额千万。除泉州外，中策还曾试图打包收购大连的数十家企业，且为大连地方政府同意，因故未成。后黄鸿年将中策部分股份转让给香港锦兴的陈国强，而陈本人也是收购内地国有资产的高手，且是香港首富李嘉诚的好友，并控制国内南方尤其是深圳的一系列企业。2008年“中策”策划收购国企中铁集团下属的内蒙古中型煤矿和相关铁路，并操作抬升自身股票香港股市中异动，仅此收益数千万港元。

至此，所有的人都应该明白“中策”集团的“先进战略”简而言之就是“廉价购进国有企业，转手高价卖出”。这也是为什么，“中策”完成收购后，一般都不更换原有国有企业的管理层，因为它根本无心经营；留用盘根错节的旧官僚施以恩惠反更易“勾兑”。2003年，“中策”先是自行出面与保定国资委洽谈，之后以其在英属维珍群岛注册的公司“亚洲纺织”出面以“全包的方式”零价格收购保定依棉集团；而“亚纺”是个只存在公章与名称的“空壳”公司，恐怕其在维珍群岛的注册地址也只是一个收费邮箱。

“亚纺”当时承诺将在 5 年内投入 5000 万美元，这个承诺应该只是口头承诺，并未写进合同里成文。但“香港亚纺有关负责人表示，并购依棉后，将利用现代技术提升传统产业，整合依棉现有的内部资源，建立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引入科学的激励约束机制，分离优良资产实现海外上市，并以依棉为平台，并购 3-5 家国内纺织企业，争取 5 年内使“依棉”年销售额达到 15 亿元，把依棉打造成中国纺织业的“旗舰”企业”的承诺从 2005 年 9 月到今天为止还一直赫然挂在商务部的官方网站“保定商务之窗”上。

(<http://baoding.mofcom.gov.cn/aarticle/zhenwu/200509/20050900491038.html>)

而且根据 2005 年“中策”股东年报显示“2004 的 11 月中策集团发布谅解备忘录，内容关于以代价 2 亿港元收购亚纺企业有限公司 (Asso Ltd) 全部已发行股本或极其附属公司 (包括保定依靠棉集团有限公司) 之资产意向。因未有在限期或之前签订正式协议，谅解备忘录已撤消不在具有效力。

(<http://202.66.146.82/listco/hk/chinastrategic/circulars/cc060519.pdf>)

根据此报告显示，从 2004 年起“中策”已经决定撇清与“亚纺”在财务上的关系，而让其独立运作，甚或做好了牺牲“亚纺”的准备。今天不能全然说，“中策”当时收购就已经决定不准备履行注资的协议；因为其实这一协议本质上与当初的“中国轮胎控股有限公司”如出一辙。恐怕“中策”的如意算盘是再用零价格的方式收购 2、3 家类似保定依棉的国有纺织企业，然后集体打包为“亚洲纺织”集团；趁着国际股市暴涨的时候转手上市，即所谓“兑现了协议”又能套取数亿美元的现金。这也是为什么依棉工人质问 5000 万美元 5 年来到位不足 1000 万，而管理层迟迟不披露却又推诿不理；因为“中策”计划中的 5000 万美元本来就是用在 3-5 家不同企业身上，在他们看来“并购依棉一家的资金早已到位”。相信以汪丽娟为首的管理层至少对以上的桥段还是心知肚明的，既然“天下换主”，自然要听董事会的吩咐，更何况如今还拿着别人的“美元工资”。这也是为什么要“留用原管理层”，表面上看变化不大且各处关系还在；但实际上早已“偷梁换柱”，“臣虽还是旧臣，但天子则是新天子”。

可天终不遂人愿，国际上 2007 年和 2008 年“次贷泡沫”与“经济危机”接踵而来，欧美股市已经惨不忍睹；国内 2004 年之后“国企改革和 MBO”大讨论掀起，面对 20 多年的资本主义复辟，左翼激进思想在民众中渐有复苏，想要“吃免费收购餐”的机会越来越小；而且棉纺行业竞争激烈，2007 年纺织品出口退税剧减，所有纺织企业都竞争乏力，2008 和 2009 年更是全球遍起“危机风”。面对这样的情况，“亚纺”（或者说“依棉”）既上市无望，又转手困难；收购方无意经营，管理层也无心经营。“中策”决定使出“金蝉脱壳，”之计，尽快套现离场；而“依棉”剩下最后值钱的也就是——土地。

偷天换日——保定“土地的秘密”

土地所有权的前提是，一些人垄断地球的一定部分，把它作为排斥一切人的、只服从自己个人意志的领域。在这个前提下，问题就在于说明这种垄断在资本主义生产基础上的经济价值，即这种垄断在资本主义生产基础上的实现。…从一个较高级的社会经济形态的角度看，个别人对土地的私有权，和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私有权一样，是十分荒谬的。——K·马克思

在我们回到“依棉”集团的问题前，看一下保定其他几个的案例。2005 年 5 月起，保定大唐热电厂工人因市区住房违法拆迁和企业腐败屡次上访和抗议；2009 年 3 月，保定第一鞋厂工人反对政府府河段改造制定的拆迁和安置方案上访抗议。因篇幅和主题问题无法一一累述，但此类案例在保定比比皆是。而“保定依棉”的“土地的秘密”到底在哪里呢？



根据河北省官方网站公布，保定火车站改扩建开始。火车站改扩建规划面积 82 公顷，规模相当于现有车站的 6 倍，项目估算总投资 68.7 亿元。新站建成后大门朝西，目前 3 家企业的 6 个厂（场）区、近 1.4 万多平方米房屋建筑已经开拆，已拆除的百花市场位置将成为未来车站的主广场。

“依棉”土地的秘密也全在此。第一棉纺厂作为是历史悠久的老企业，其厂房和职工生活区皆位于保定市西城的向阳大街和东风路两侧，从现在的保定火车站到“依棉”厂区也不过向西几公里路，百花路农贸市场到“依棉”所在位置更不过是一箭之地。一旦新火车站和广场建成且大门进出口向西，那么“依棉”所在地区就成了寸土寸金直面新站的“白金地段”。网上所知，目前保定市区内土地出让金为每亩 100 万元左右；根据河北省政府官方的河北招商网

(<http://www.hebiic.gov.cn/projects/CqzrDetail.aspx?id=140>) 2003 年公布的国有企业依棉项目转让书，“依棉集团”在出售给“亚纺”前占地面积为 497412 平方米（约合 750 亩），仅按现今保定土地出让价格计算就是 7.5 个亿。

“中策”投入不过 7000 万，假如土地立即转手就是 7 亿到手（当然“中策”也不可能一家独享，少不下打点，但拿到大头却是无疑的）；若能待价而沽，可能收益数倍于 7 亿；若不转手，只要能将“依棉”集团彻底腾走，开发商业广场和私人住宅，则收获可能更是数十倍于此。为此我们不得不猜测“中策”甚至巴不得“依棉”生产越早难以为继越好，这样才能更容易名正言顺地实施“乾坤大挪移”手法。为了善后，管理层还玩了一个“退市进郊”的花招，而且这“进郊”也进得蹊跷。并非是“依棉”自己建厂安置员工，而是将依棉的“优良资产”再次打包卖给了另一国有企业“中纺”，由“中纺”出面来安置数百员工。



“中策”本无心经营纺织，既要“退市卖地”，当然最好是把数千万的固定资产与设备当废品处理掉，而“中纺”乐得捡个便宜，甚至其负责人能在未来的土地交易中分上一杯羹也未可知。象征性地接受数百个工人也自然成了“举手之劳”。4 年一轮回，“依棉”的少部分员工与设备又再次成为国企的一部分。完全有理由质问保定国资委，既然如此，若 4 年前直接将“依棉”打包给“中纺”岂不省事？土地、厂房、设备和员工安置由“中纺”竟数处理，国企对国有企业岂不省事？何来 4 年内近万员工 2 次遭遣散下岗？何来数亿国有资产被劫略一空？

另外蹊跷的是可别说保定国资委不知道 4 年后会有火车站扩建规划，1 个占地 82 公顷耗资 68.7 亿元的庞大项目不太会是 1 年内为了“应对经济危机”一拍脑袋就能立即立项许可和紧急上马的，显然运筹已久。既然只要依棉厂土地在，光卖土地就足以收入数亿资金，又何来经营不善非要出售给从来没有涉足过纺织行业外商的道理呢？恐怕这其中的奥妙也不难理解，利益，——中策的利益和保定某些人的利益，而其中惟独没有上万依棉员工的利益，没有中国国民的利益。

当然，“土地的秘密”并没有到此结束。1949 年革命之后，毛泽东时代的斯大林主义计划经济下，“以厂为家”绝非只是一句口号。直到 1990 年代新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彻底占据统治地位前，城市中所有的大中型国有企业和单位往往是工厂区、办事区和该“单位”

员工的住宅区混合在一起，越是历史悠久和规模庞大的企业越是如此。与之相伴的还有明确的“单位人”的意识，也就是将自己视为某一集体的一分子，而非孤立零散的个体；这一概念强化的时候不仅是员工本身，包括其家属与子女都具有强烈的“单位”归属意识。人与人的交往也先从认识其“单位 LOGO（标志）”开始。

当初被保定人称为“西郊第一厂”的“国有第一棉纺厂”更是如此。沿向阳路和东风路两侧的厂区周围遍布原“一棉”工人的居住区，数万人数十年时间与“一棉（厂子）”朝夕共处命运与共；而且不少家庭甚至是两、三代人同为一厂职工，并以此为傲。作为计划经济时代企业“小社会”的特征，“一棉”曾经拥有自己的电站、技术学校、医院、中学、小学乃至幼儿园，一个“一棉”员工完全可能出生在“一棉医院”，在“一棉幼儿园和小学”读书受教育，在“一棉的技术学校”接受技术培训，然后进入“一棉”上班，甚至最终安息在“一棉医院”中。

他或她的一生完全与“一棉”企业联系在一起，每一步人生轨迹都打上了“一棉”的烙印。对这个现象本身的是非尚且不论；但对数以千万的中国工人阶级而言，这却是他们生活中一个确凿事实。对他们而言，“企业”与“家”早已融合成了一个概念，“厂即是家，家即是厂”。失去“厂子”从某种意义上也就抹去他们人生中最光彩的那部分经历，抹杀了他们作为一个“社会人”的存在意义。

更何况作为“保定西郊第一厂”，作为曾经进过中学课本的“马恩华厂子”那份历史荣誉感。众多保定市民乃至周边群众听说“保定一棉要没了”特地坐车来凭吊就是最好的证明。对于如今每天工作 10 几个小时同时要开两三台机车的“依棉”员工来说，对于那些要靠摆小摊、捡破烂维持生计的下岗和退休“一棉”员工来说；“依棉”——“国有一棉”最后苟延残喘的遗迹（“依棉”取与“一”字同音的“依”字既保留读音，也取其“可资依靠”的含义）的彻底消失，意味着他们精神深处仅存不多的引以为傲的东西终于崩塌了。他们不再属于一个曾经有过光荣历史的团体，如今他们只是一个个孤立无助的“弱势分子”；或者说如今他们什么也不再是了。



资料显示，“一棉”旧有厂区与住宅区混杂，加上众多附属设施；若大而化之的计算，可能1个小时都走不出“一棉”的地盘。所以除去并购时的“依棉”集团的那750亩土地外，上万依棉职工的居住区（因为这些房屋都已经私有化“房改”时归属个人，所以不计算在“依棉”的占地面积内）的土地面积可能甚至远大于厂区占地面积。这又是一笔惊人的财富。

根据历史经验来看，对于手眼通天的地产商来说，拆迁零散相互没有关联的底层民众的房屋那是如摧枯拉朽般轻而易举。只要“一棉”图腾不在了，只要能将“依棉”腾空，那么“依棉”员工就无所倚仗。居民间互相的身份认同也就“淡了”，到那时只要“恐吓利诱”、“威逼欺骗”和“挑拨离间”俱上，黑道白道“武装护航”，拆几个下岗失业工人的房子还不是手到擒来。目前火车站边西大园附近的旧房拆迁早已是闹得民怨沸腾，被强迁民众将暴力拆迁比作“清政府”和“法西斯”，抗议标语直接写进了火车站边的进出通道上。2005年保定大唐热电厂住宅区拆迁后，工人迄今没有得到任何安置；在房价畸高的市区，被拆迁的失业工人又如何寻找一个容身之地？



两相映照，其实相信读者已经不难理解：“依棉”工人不自觉地或自觉地不仅是在护厂，更是在保家；不仅是在保自己的“小家”，更是在保数万保定民众的“大家”。只要“依棉”厂房存在一天，上万原“一棉”工人就能有团结和依靠的精神象征，周边庞大的居民住房拆迁就不能任意为之（即使拆了收获也不大，“一棉”庞大厂区在那里挡着）；只要现有的“依棉”得以从物质上和精神上彻底灰飞烟灭，则沮丧而失望的工人及家属不免分崩离析各奔前程。到那时，恐怕保定西城到时在“旧城改造利国利民”的大旗下，未必不是一片腥风血雨，某些人才好上下其手渔利侵占。

不过我们觉得有必要提醒某些人读一读下面的故事：《国语·周语上》记载，周厉王好“专利”，（“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周厉王，喜好独占天下出产和山泽之利，不与民利）；有臣下说，“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载也，…皆将取焉，胡可专也！…匹夫专利，

犹谓之盗，王而行之，其归鲜矣，…王弗听…”，之后就爆发了中国历史上最早有书面记载的阶级斗争“国人暴动”，“…三年，乃流王于彘”。

背水一战——“工人阶级的战歌”

罢工是工人的军事学校，他们就在这里受到训练，准备投入已不可避免的伟大的斗争中去；罢工是工人阶级各个队伍宣告自己参加伟大的工人运动的宣言。

——F·恩格斯

资本主义复辟的“改革开放”的旗帜之下，30年来新自由主义的“市场战车”所向匹靡，弗远未及。有时我在想，今后我们的后人将会如何看待我们：数以万亿计乃至十万亿计的资产、几亿人数十年的劳动成果就这样被寡廉鲜耻之輩肆无忌惮地鲸吞蚕食，数以千万的民众被盘剥压榨，而我们长久以来却一言不置，直如温顺的羔羊般甘受宰杀。真是怎一个“贱”字了得？

我们要感谢“一棉”的工人阶级，没有他们的奋力抗争，又一场瓜分国有资产和人民财富的盛宴也许就会在悄无声息中完美谢幕。他们吹响了背水一战的号角，他们的斗争为工人阶级和广大民众进行自我组织自下而上地反击私有化，捍卫全民财产开辟了道路。

（以下消息均来源于网络，包括天涯，保定之窗等网站，因信息无法一一证实，但相信基本还原事件经过，所以全面借用）

从今年2月初春节前后，当依棉集团管理层发出准备“卖厂套现”信号之时，“一棉”工人和退休工人已经开始进行相应的计划和准备。从3月初开始，就能在网络论坛上零星看见工人的公开信。而且就公开信的内容可以推知，应该经过精心准备和讨论的。其中包含几个关键问题：“中策”曾经许诺的5000万美元投资，企业欠缴4年的公积金与养老金，欠2004年被遣散数千工人的补偿金，工人过去数千万集资款，以及汪丽娟的个人经济问题，但很遗憾工人们没有土地问题放进公开信中，可能是有所顾虑，或者觉得在实践中土地的“专利”非官家得，即资方得，工人肯定无法从中获益。但殊然不知，只要能保住“依棉”，仅凭目前厂区的土地价值就足够所有“依棉”工人养老，而至于“中策”没有履行承诺又有抽逃资金（零散出售依棉土地和处理库存货物）完全可以诉请收回资产，尤其其中还涉及到职工的集资款问题。

有些“别有用心”之人在网上宣称当初工人投入的2000元并非“集资款”而是工人投入从“一棉”改制到“依棉”的股本款，应该随企业的收益自负盈亏，不是旱涝保收有赢利的。权用此言，假如这是作为员工股权投资投入改制工厂的，那么这些员工其实也就是国有一棉厂改制为“依棉集团”后的小股东，也就是说每股2600元，依棉员工总共掌握着数千万元“依棉集团”的股权。那么当初2004年，保定国资委称依棉是国有企业就是错误的结论，“依棉”集团应该属于股份企业，国有股

份占大头，员工股份占小头。在没有让小股东参与并购表决的情况下，（2004年改制没有召开股东大会也更没有表决，而即使召开的职工代表大会也暗箱操作玄机甚多，包括直接将不知何来的空白票计入赞成票中）。国资委与“中策”就敢私相授受，把所有股东的资产零价格卖“中策”；这完全是赤裸裸地侵害小股东利益。既然要保护“私权”，为什么处于弱势地位的小股东利益无法得以保障？即使在欧美资本主义国家，这些人完全会因此罚得倾家荡产和被判入狱。

假如说这些款项不是股权款，而是员工集资款，有固定收益。那么为什么在香港“中策”集团已经收购完成后，不尽快给予员工兑付偿还本息？“中策”买下了“依棉”资产，却没有对其债务进行清偿，仅凭这一点，作为债权人的数千员工就完全可以起诉“依棉”或者“中策”是“欺诈收购”。在债务偿还之前，要求对“依棉”所有资产进行保全，只要诉讼一起，那么“中策”的并购进程就不能不停下来，要么“中策”将全部许诺资金注入偿还职工集资款，要么所谓“依棉”是外商独资，产权明晰的“神话”就无法成立。但遗憾的是，当时“依棉”员工可能出于善意心存幻想或者根本没有意识到需要作此准备。

随着卖厂遣散的日期日益临近，工人们进行宣传的力度也逐渐加大。从3月中旬起，工人中间开始公开募集维权经费，很多生活困难工人都积极捐助，虽然仅是5、10元数额，但汇涓涓细流也终成大河。而且不少中下层企业干部也积极参与；一些工人中德高望重早已退休的80多岁的老员工积极参与动员和发动工人，却被某些人蔑称为“老不死的，不差你退休工资一分钱，还出来上窜下跳”。同时工人继续进行上访和网络宣传施加压力。3月25日，“依棉”员工发布“我们要工作，我们要生存”公开书。



从3月27日起，在协商无望情况，工人正式全面罢工，全厂机车同时停止工作。几乎所有的工人和退休工人都参与罢工和护厂斗争。工人封闭了厂门24小时轮值看护，禁止他人进入转移资产。近千员工前往保定市政府上访告状。保定市派出以一名刘姓副市长带队的工作组进驻“依棉”，但除了哄骗劝说，对事件解决无任何实质性进展。

为增加压力，除数千工人留在厂里继续轮班看护外，从4月2日起，2000多工人准备进京上访，为避免“破坏”与“恶意扭曲”，工人们创造性将此定位为“集体旅游”。前有“集体散步”和“集体购物”后有“集体旅游”，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的。



但这也让“俯卧撑”、“躲猫猫”和“做恶梦”之輩胆战心惊。一路上数十辆警车“保驾护航”，一名副市长全程陪同劝说；但工人也有精心准备，有人负责给“步行旅游的工人”传送食物和水，而且基本没有工人为官员和警方所诱骗回去，除少数年老体弱者不得以退出。4月2日晚，工人“进京旅游”的队伍行至徐水境内。当局出动千余武警和警察将107国道徐水段全面戒严，往来交通全部截停，不少当晚从保定去往徐水县城的车辆均被警方截回。然后警方在继续往北京方向的道路上设置由武警、警察和联防队组成的三道人墙，暂时切断公路用电；在一片漆黑中，“英勇神武”的“人民警察”手持电筒和电棍将多数工人挟持上保定方面早已派来等候的数十辆大巴，星夜送回保定。当时仍然有数百员工滞留徐水县城不退，并试图发起“第二次自行车旅游计划”，但因人数少力单，还是被当地政府集中管制后，“劝退”回保定，“政府很重视的，问题你们还是要回保定解决的。”

4月3日，河北省政府派员下来会同保定市政府进厂与工人谈判。为以示让步，政府方面下令立即停止汪丽娟的相关职务；4月4日罕见地以第一时间由新华社向海外发布英文通稿声称党委书记汪丽娟被解职，工人已劝回。（新华社稿件：Party chief sacked after textile workers' protest march）。由刘姓副市长出面承诺妥善解决职工社保和欠款问题；政府方面可以协助工人向“中策”施加压力，履行注资和索要补偿，并甚至表示可由政府出资帮助工人进行诉讼。但是在最关键的产权问题上但仍然认定“依棉”是由“亚纺”独家控制的外商独资企业，产权关系清晰明了。



一个自称为“共产主义政党”的政府为了维护“私有产权神圣不可侵犯”竟然卑躬屈膝到如此境地。因为他们所担心不是一个“依棉案”，而是假如如此例一开，将会在中国掀起多少对“国企私有化”清算的怒潮；几十年来精心策划的“市场经济架构”可能就此土崩瓦解，对于“负责任”的新兴的“资本主义大国崛起”这实在是非同小可。

4月8日，清明假期之后，政府工作组表示开始清退职工的集资款，按集资票面的2600元给员工尽快支取现金，但却没有交代清退集资款的资金从何而来。是政府掏腰包还是“中策”掏腰包？若是政府掏腰包，那不是又一次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凭什么“中策”的债务要全体纳税人来承担，若是“中策”掏腰包，为什么迄今工人们还没有见到一位“亚纺”董事会的董事出面谈判表态。这欠债一欠数年，欠得莫名其妙；这还钱一朝，也是还得糊里糊涂。政府此举是希望尽快补上因集资款带来的债务漏洞，以免重起“产权之争”。

正如托洛茨基在70年前那场经济危机时降临全球时所指出的，“在资本主义分崩离析的情况之下，群众继续过着一种被压迫的穷苦生活，且现在（1930年代世界性大萧条）较任何时候还易于陷入赤贫的深渊。群众假如不能增加或改善生活条件的话，也必须要保卫他们的每一口面包。…在争取部份要求和过渡要求的斗争中，工人现在较之以往更需要群众组织：主要是工会。…每一个布尔什维克—列宁派在一切斗争中都站在最前线的战壕里，即使这些斗争仅仅涉工人阶级的最温和的物质利益或民主权利。”

90年前李大钊所志，“试看将来之寰宇，必将是赤旗的世界！”；社会主义者坚信，“必有一天‘无产阶级万岁！’的呼声将重新响彻云霄！”

同时政府和管理层又开始加紧分化工人，催促工人尽快复工；并向部分工人许诺加威胁，“市区厂房肯定是要出让的，现在如动复工表现好的，今后优先安排就业出路；否则就只有自谋出路”。甚至在全市范围内通过其他企业和机构向“依棉”员工家属施压，要他们“好好看好家人，假如家里有人再参与集体上访，你的饭碗也危险”。到目前为止，依棉多数工人都还未正式复工，但处于观望和消极状态之中的日多。

不过毕竟因为工人的奋起抗争，还是赢回了一些本该归属于他们的东西。工人的斗争进入了僵持阶段，到底后续发展如何；我们在关注，所有关心中国工人阶级命运的社会主义者都在关注中。但“依棉”工人之前的抗争本身就是重要而正确的选择，并且由于他们的团结一致、聪明机智和坚持斗争，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今后可能在此基础上取得更大的胜利。这无论如何都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光荣，是中国工人阶级反击和挫败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政策进攻一个虽小但重大的胜利。

只有团结起来，具有明确阶级觉悟的工人阶级才有进行斗争的力量；也只有通过不断的团结斗争，才可能寻找到工人阶级实现解放的出路。斗争的最终结果将取决于众多因素：双方之间的力量对比，工人作为整体的斗争意志，工人运动领导者的战斗艺术以及外部环境的变化等等。而且限于条件，运动不免会有起伏，实际斗争也不可能一役以竟全功，甚至在必要时需要退让和妥协，需要在撤退中寻找前进的道路。但暂时的退让与妥协绝非是投降与缴械，而应该是在积蓄力量、严密组织和发动群众中随时准备投入到下一场更为重要和更为艰巨的斗争中去。

经济危机、农民工和农村

郝民



2009 年春运期间，返乡农民工

随着经济危机的不断蔓延，农村--隐藏着巨大消费能力的市场，再次成为中国政府保持其经济增长神话的“救命稻草”。

从某种意义上讲，广大的中国农民应感谢这次令人自危的经济危机。因为，只有在此时，“三农问题”、“农民工”问题才如此高频率地被提及，被重视。尽管随着这次经济危机的到来，将有约 2500 万农民工失业，1 亿多人等待就业机会。

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获得社会的一片赞美之声，但它出台的时间与国际国内背景却使之面临多重的考验。现在当整个世界经济面临巨大的困难之时，中国农村经济也无法自保。“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鼓励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加大对农业的补贴”等这些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在新的全球经济形势下中国未来经济增长乏力的问题，也无力使中国农村走出经济发展缓慢、社会问题突出等各方面的困境。同时，这次金融危机充分表明，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稍有风吹草动，农民的抗风险能力的脆弱性和收入不稳定性一览无余。本文试从以下几个方面浅谈经济危机下的中国农村。

“三农问题”与“农民工”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三农问题”一直是中国政府表述、概括中国农村问题的标志性词语。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批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农民工”逐渐成为“三农问题”词语体系的核心内容，也成为中国政府转移“三农问题”窘境的突破口。

中国改革开放 30 年经济上所取得的巨大发展，令世界为之侧目。但社会财富的增长并没有带来社会的“共同富裕”，占中国总人口 80% 以上的农村人口生活质量相对于 30 年前固然有所提高，但并没有体会到政府曾经许诺的“大河有水小河满”带来的幸福感。仍然具有影响力的工农业产品“剪刀差”价格政策，目前正在推行“家电下乡”、“农业补贴”等一系列开拓农村消费市场的政策都鲜明验证了中国农民——与其所谓的宪法上的阶级联盟“工人阶级”在为中国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同时，却被无情的抛弃、遗忘。

“农民工”的最终归宿依然是农村

由于农民工在中国经济建设，尤其是城市发展进程作用的日益提升，众多人士越来越倾向将“农民工”归纳为新社会阶层，或者工人阶级新组成部分。这种分类，体现了农民工作用的不可替代性，但却容易使人忘记农

民工的根本属性。由于二元户籍制度的存在，农民工的身份依然是农民，农民工的最终归宿依然在农村。

农民工进城不是真正的城市化，他们更多的只是城市工商业经济发展中被使用的“一次性”廉价劳动力，用完即扔，年龄大就回乡。本轮经济危机的冲击，大量农民工返回农村就是最好的解释与证明。

农民工外出打工，实际上是农村劳动力流失。尤其是在中西部地区，经济危机发生前，农村青壮年劳动力不分男女几乎全部出走，村庄里只剩下留守老人和儿童。尽管有农业税免税和各类补贴等优惠政策，农业生产还是因劳动力缺乏只能维持粗犷性经营，甚至出现大面积抛荒。这还只是对农业生产的影响，更致命的是对农村社会生活的影响。随着大批青壮年人口流入城市打工，乡村留守人口质量明显下降，农村治安和文化生活状况恶化。

由于村庄仍然是农民（包括广大最终回乡的农民工）的生存之所，并仍将在未来长期存在，劳动力流失使乡村因失去建设主体陷入衰败和解体的境地。拥有 9 亿农民的农村不可能在短短数年间完成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而且现有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发展方向也并非就是中国农村发展的“梦中天堂”。

如此看来，2500 多万农民工返回农村未必就全然是一件好事，他们有可能将是农村发展必须的主体力量。

经济危机来的“恰逢其时”

当前情况是，经济危机愈演愈烈，中国农村受到的冲击日益强烈，政府依赖农村市场拉动经济提升的程度日益加深。因此，从应对经济危机的效果来看，中国农村在扩大投资——拉动内需——刺激经济的同时，不应错失通过调整政治、经济、社会结构，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机遇。首先，村庄仍是农民生产、生活、娱乐的空间，城市化的发展并不能消除大量的村庄。要在广大农村重建社区，成立农民协会，唤醒农民权利意识。

农村组织匮乏，农民的自组织能力有限，使农村内生发展的动力不足，政治主体地位仅停留在纸面。乡村

社会基础的改善，尤其是培育农民自组织不仅仅是出于拉动内需和维护社会稳定的需要，而且要基本改变现存的城乡二元断裂结构，实现城乡一体，推动中国农村建设实现根本性变革。

其次，重视“新生代农民工”。经过近二十年的城市化，从今天开始农民工主体将逐渐过渡为第二代农民工（那些一出校门就进工厂打工的年轻人，虽然在户籍上他们仍然是农民，但从未从事过农业）和农民工第二代（那些父母是城市中长期打工的农民工的后代；他们从小在城市中生活和学习，虽然户籍上也仍是农民，但无论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还是自我身份认知都与农村没有什么联系）。

新生代农民工长期在城市生活，本身缺乏农业技能，生活方式早已习惯了城市环境，返乡后很不适应，而且他们从内心从情感认同上已经很难返回农村。况且农村的现实环境也不能满足他们的物质和精神需求。他们如何调整自己与农村社区的关系，和如何积极地或消极地去影响广大农村问题，将是一个非常现实而可能具有爆炸性的问题。

面对日益凋零的农村和沉重的压榨，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广大农民应该通过斗争拿回自己天赋的不可剥夺的政治地位和权益，并在此基础上打破劳动力和资本之间极不平衡的态势，从而有力量在经济上抗衡资本，在政治上抗争农村官僚对他们无情的剥夺。

经济危机所来“恰逢其时”，尽管在危机的冲击下，中国农民和农民工将遭受更多困难，但正如马克思所言“无产者在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得到的却将是整个世界。”

无论是“三农问题”，还是“农民工问题”，问题的出路存在于也只能存在于农民自身。惟有农民权力意识的自我觉醒，惟有农民奋起自我抗争，经济危机下的中国农村才不至于仅沦落为政府挽救经济的“救命稻草”，中国农村才有希望突破“二元”体制的束缚，中国农民——原本意义上的国家主人，才能真正成为中国社会变革的推动者。



冬季里沿街等待工作的农民

瓜德罗普岛总罢工胜利结束

——加勒比海地区工人反击的榜样

亚历克斯·乐克 (Alex Lecoq) 和迈克尔·希勒特 (Mikael Helot)

Gauche Revolutionnaire (CWI法国支部)



在法属加勒比海地区的瓜德罗普岛上，一场声势浩大的总罢工持续时间超过 6 周，并扩散到了附近的马提尼克岛上，自 3 月 5 日后甚至扩散到了非洲东部的留尼汪岛。3 月 4 日，代表该岛广大群众的‘反剥削委员会’（LKP）终于胜利与岛上的老板们达成协议。

达成的协议标志着瓜德罗普岛的劳动人民获得的重大成功，其内容包括最低收入群体的工人每月加薪 200 欧元；在航空旅行与面包的价格上，老板们也作出了让步。关于运动中提出的其他诉求仍然在继续谈判中，其中包括降低必需产品的价格。罢工中所体现的斗争意志与最终成功的鲜活例证充分说明了国际范围内工人应该如何反击资本主义危机所带来的影响。

与媒体所描写的一小块无关紧要的土地恰好相反，瓜德罗普岛大约有 44 万居民。历史上瓜德罗普岛一直是法属的‘海外领地’并且与法国大陆有着紧密联系。

1794 年，随着法国大革命的发展，岛上的奴隶制被废止了；当拿破仑·波拿巴在 1802 年掌握权力后，通过血腥镇压，重新恢复了奴隶制。因此，瓜德罗普岛普通人民的斗争影响着他们的法国同伴同样也被他们的法国同伴所影响。事实上众多目前在法国本土大陆工作的瓜德罗普岛人也在增强这一联系。然而，历史上奴隶制度和殖民镇压使得瓜德罗普岛的资本主义具有更为蛮

横强硬的特性，使它在最初的整整三周内没有对群众运动作出任何回应。

媒体努力地试图告诉我们运动必须结束，因为当地人民不再支持它，反剥削委员会是一个不民主的组织。当工人的团结充分显示他们力量的时候，统治阶级使用一切它所能使用的工具以保护自己。如果反剥削委员会领导一场新的动员，因为它的战略决策和在群众中所赢得的巨大支持将给予运动难以置信的力量，将是不可阻止的。

被剥削委员会所使用的正确策略通过家乐福工人的行动充分得以展现。（瓜德罗普岛上的家乐福超市由岛上最富有的人海耶特（Hayot）所拥有，他的个人财富达到 3 亿 5 千万欧元）。为了迫使海耶特签署反剥削委员会的协议，工人们继续罢工；这一策略被一个接一个地运用到了不同的工作场所。

萨科奇自己不得不呼吁公司老板们为了法国的国家利益接受反剥削委员的提议，尽管这并不符合当地老板们的利益。本地资本家们渴望获得短期利润的想法使他们犯下了可怕的错误。如果他们企图阻止反剥削委员会，而不接受双方之间的协议，他们将为此感到后悔。

协议

3 月 4 日晚上所签署的协议内容非常详细。它包含有 165 个段落，涵盖各种议题，从法式面包的价格直到教师受雇的条件。艾利亚·多莫特（Elie Domota），反剥削委员会的领导人，当着谈判所在地示威群众的面大声读出协议内容，并向群众询问他们是否赞成该协议。在场的人群表示同意。多莫特答复道，“同志们，我们为我们今天所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但它只是第一步！”。随后他宣布了总罢工的结束，但强调群众性动员并没有到此结束。他说，“群众性动员是赢得胜利的唯一方法”，同时他们将继续斗争以确保公司老板们履行协议，并赢得新的胜利。但问题是：最后一步是什么？

MEDEF(老板们的组织)不再是瓜德罗普岛上最强有力的组织。反剥削委员会将所有的工人阶级都集中到了一面共同的旗帜下。如果老板还傲慢地认为他们仍然能够肆意强加他们的意志，那将是个巨大的错误。

“我们进行这场运动有 40 天之久。反剥削委员会绝不会自己解散，我们还有 40 年的工作需要去做。”
——艾利亚·多莫特 (Elie Domota, 反剥削委员会 (LKP) 的领导人)

社会主义者绝对赞同这一决定。虽然总罢工已经结束了，但组织本身没有必要解散。它能够将工人阶级联合起来，组织起来，并给他们指明斗争的政治方向。只要统治阶级仍然组织起来反对我们，那么这么做就是完全必要的。法国政府给与瓜德罗普岛上老板们的信息是非常清楚的。为了补偿由总罢工而给‘贫困的’老板们所带来的损失，法国政府已经决定减免因罢工引起老板们延迟支付税款而带来的滞纳金罚款。

老板们（在罢工期间）试图象征性地使一家超级市场开门营业，并得到了数百警察的支持，但是因为群众的反应而没有得逞。这表示老板们不再能够为所欲为。帕特里克·卡拉姆 (Patrick Karam)，来自于所谓的法国‘海外机遇平等事务部’的代表在谈判期间说，“每个人都有机会赢得胜利”。与他希望相反的是群众赢了！真正的问题，使协议长期没有达成的原因就是在于，老板们不能接受他们自己的失败。甚至现在他们仍然表现傲慢，宣布接受协议后不久将进行一次大规模的裁员。如果他们敢与这样做，他们将面临另一场总罢工！

老板们在 3 月 4 日（周三）所提出的提案表明他们并不真正了解发生了什么。他们提议现协议只存在 36 个月的有效期(这段时间内政府会支付它所需承担的大部分成本)，而且协议将只有有益于更少的人群。这说明他们将企图采取任何方法拿走罢工所赢得的东西。资本主义制度从来不会让工人阶级长期保住他们斗争所赢得的成果。

马提尼克岛和留尼旺岛

在美丽的马提尼克岛上住有将近 40 万人，老板与罢工者的协议也刚刚达成。那些收入低于 1.4 倍最低工资标准的工人们将收到每月额外的 130-200 欧元的加薪。这仍然是个胜利，但没有达到罢工时的诉求。为此老板们只用支付 30-100 欧元。其余部分将来自法国政府的财政。因此最终仍将由纳税人自己在支付他们的薪水。一些工会组织，如工人总同盟 (CGT) 和工人力量 (FO) 并没有签署协议，因为他们需要咨询基层普通成员的意见，并等待关于物价问题能达成什么决定。因此罢工仍然在继续。在留尼旺岛上，由 40 个不同组织组成的联盟号召在 3 月 5 日进行一场总罢工。

社会主义选择

瓜德罗普岛总罢工所带来的重大胜利使法国资本家和萨科奇政府处于困境之中。一方面，他们试图削减法国本土工人和年轻人的工作、社会服务和生活标准，而法国工人和年轻人们正在准备反击（可见 1 月 29 日法国所发声的大规模全国性罢工）；而另一方面法属加勒比海地区工人所进行的激进群众运动已经迫使法国政府作出巨大的让步。萨科奇正面临着本土工人将会采取同样斗争手法的威胁！在即将到来的下一个全国总罢工日 3 月 19 日，瓜德罗普岛工人所取得的成功将会给予法国工人更多的信心。

在瓜德罗普岛工人罢工期间，来自法国新反资本主义党 (NPA) 的奥利佛·贝赞司诺 (Olivier Bescancenot) 曾经造访该岛向罢工工人表达了团结斗争的意愿，并正确地指出法国工人应该效仿他们的激进运动以捍卫自己的工作机会和社会服务，对抗法国老板们和萨科奇政府的进攻。然而，为了有效地反击资本主义的攻击，绝不能仅仅止步于此。虽然总罢工以清晰而有力的方式显示了工人阶级的无穷的力量并已赢得极大的成功；但只要资本主义制度仍然存在，任何已经赢得的成果都将遭到持续不断地攻击。所以，为了确保到手的胜利和反击资本家们让工人和贫苦百姓承担危机带来损失的企图，有必要寻找能完全替代资本主义制度的道路，也即是反对由追逐利润的大商业来支配多数人。为了要实现这一目标，瓜德罗普岛和其他法属加勒比海地区的工人需要拥有自己独立的政治声音；需要一个能够在斗争中代表他们并最终推进社会主义以取代危机重重的资本主义制度的群众性政党。CWI 法国支部 (GR) 正在努力奋斗使法国的新反资本主义政党 (NPA) 成为这样一个群众性政党。

唯一能保证瓜德罗普岛、马提尼克岛和国际范围内所有群众基本需求的方法就是改变现有运行社会的制度。社会主义，一个由工人民主控制经济和社会的运作制度，是唯一能满足所有人需求的可能性选择。如果老板们不准备履行他们已经签署的协议并继续妄自尊大而试图让多数群众为他们所制造的危机承担损失，那么我们必须建立一个为实现社会主义而进行的国际运动。在瓜德罗普岛和法属加勒比海地区就意味着进行群众性的动员以彻底终结本地与国际资本主义的力量建立区域性的社会主义联邦。



平等权利 Equality and Rights

“三八”节，女大学生访谈

郑志



二十世纪初，在国际范围内伴随着风起云涌的工人运动是波澜壮阔的妇女解放运动。通过数代人前赴后继的斗争，女性在社会中作为被压迫者的强烈进步性得以具体体现。每逢一年一度的国际妇女节^①，女性和男性的工人们都会举行大规模的游行。国际女性解放运动本身即是连接男女平等与争取工人现实权力的桥梁，也是反战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成为俄国革命乃至整个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的重要先锋力量。为了显示女性改变世界的决心和表达对她们的为人类进步做出的巨大成就的敬意，国际妇女节的出现在当时激烈的阶级斗争背景之下，并逐渐成为世界上广大工人阶级和被压迫阶层共同庆祝的节日。

然而近百年后的今天，在资产阶级消费主义和物欲崇拜的熏染之下，这个伟大的节日也逐渐暗淡，并被软弱化成为类似于“母亲节”或“情人节”那样无耻商人大发横财的商业“嘉年华”。在这一天中，男性示好地向女性赠送一些鲜花等小礼物以示虚假的敬意，而全然不顾现实中女性地位的日益衰退。

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侵袭、以及国际范围内工人运动的衰退；环顾四周，就如被海水逐渐侵蚀的冰山一样；所有工人争取得来和曾经拥有过的社会保障和政治权利正在日益丧失一样，女性解放运动所争取的女性点滴权利与平等也正被瓦解与消弱。资本主义乃至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下，女性被奴役、从属化和商品化的现象在中国大地上卷土重来。

我们是否还需要国际妇女节？这问题就如同我们是否还需要革命一样？

我想答案是肯定的。革命被背叛了，但革命并未死去；国际女性解放运动被曲解了，但女性解放运动也绝不会就此停步。人生来就应该是平等的，女性不应成为夫权社会中统治者的私有财产和男性手中的玩物或者商品。

以下就“女性问题”对在读女大学生的采访内容仅代表其个人观点，并能不代表本杂志的立场。重要的是希望《社会主义者》的读者们通过本文对现实中青年女性的真实想法有所了解。被采访者 Y，23 岁，大学英语专业学生，非独生子女，有兄弟。（对话内容有删节，被采访者不知访问目的）

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郑：是否觉得家长对女孩子有歧视？

Y：我并没有觉得父母有歧视，不过家中重要的事情往往都由父亲决定的。

郑：你认为女性在家庭中应该比男性承担更多的家务劳动（包括抚养孩子和照顾老人等）吗？

Y：我认为女性应该承担多些家务劳动，因为经济收入以男性为主。从古到今都是这么分工的。②

郑：缺乏相关的社会公益服务所以需要女性照看老人和孩子是否是造成女性在经济地位上从属于男性？

Y：是的，社会福利太少了，这自然会影响到工作。因为人的精力总是有限的。一方面公司应该给予女性更多的照顾，另一方面政府也应该作出各种政策倾斜。公益性服务和社会保障的健全会对女性和男性拥有平等的权利以及女性的解放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郑：你认为家庭暴力普遍吗？这是否只是家务事？

Y：很普遍，不只是行为上的暴力，也存在很多的语言暴力，还有男性在双方吵架之后经常就不做家务。③这是两个人之间的事情，是家务事。

郑：工作难找是否有毕业后就嫁人的想法？对于配偶或男朋友是否有学历、经济状况、相貌的要求？

Y：首先要有自己的经济基础，才能作为爱情的基础，当然忙于嫁人的想法在同学中也有存在，她们大都不想学习和找工作。对男友当然会有要求，相貌并不占很大的比例，学历和我差不多就可以，重要的是要有事业心、要有能力，家庭状况、经济状况这些也需要考虑，这在当今是很普遍的观点。

郑：如何看待大学生学习期间的同居与结婚？

Y：我不反对他人大学期间的同居行为，但是自己并不认同。不过假如双方都工作和经济独立之后就可以接受了。

郑：是否觉得现实中男性的经济地位比女性更高？

Y：当然，工资的高低是决定性的因素。男性当然是主力，比如要由男性来买房子，男性在家庭中的经济地位通常也更高。女性应该什么样子已经为社会、家庭、教育等各方面灌输，短期内改变不大可能，个人的努力是无法解决的。

郑：如何看待毕业后的就业前景？希望从事哪方面的工作？为什么？

Y：找工作不一定和专业一致，能找到什么算什么了，薪水和待遇是最重要的，没有太多的要求，兴趣在于培养。会参考教师和家长的意见，一方面他们有经验，另一方面他们也有更多的社会关系。

郑：你现在通过什么方式寻找工作的？是否觉得女大学生比较容易遭到歧视？

Y：是的，我现在在做家教。大多是通过朋友介绍和老师介绍，也有自己找的，通过中介、网络、留言板之类的。对女生就业要视行业而定，像家教、营销等方面女生就比较有优势。但是歧视女生的例子肯定也存在，比如很多时候认为女性不能吃苦、出差不方便等。

郑：那么你认为与男性求职者相比，女性有同等的机会成为主管或领导者吗？

Y：肯定是不同的，像主管经理、助理、专业技术人员这些大多是男性，而像秘书、会计、服务业这些岗位上以女性居多。一方面女性寻求更稳定的工作，另一方面女性往往要持家无暇顾及繁重的工作。从小受教育对男女的能力培养也不一样，也有一些体力方面的因素。女性成为主管或领导的比例很小，即使她们和男性拥有同等的工作能力，往往男性被视为可以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工作④，同时他们在社会交际中也占据主导地位，这种固化的社会定位很难被改变。

郑：为什么要读大学？女性和男性拥有同等的受教育权利吗，尤其是高等教育？

Y：首先是在父母的督促下作出决定的，在一年级开始就被告知这是唯一的出路，为了将来谋生，为了将来建立家庭和寻找配偶准备条件，有的时候我也很厌学。⑤相对男性拥有高等学历的人更多，尤其在偏远的地区

女性被视为即使考到高学历也没什么用，将来总是要持家做家务的。

郑：那么你是如何决定所选的专业的呢？社会对于两性角色的定位对你的选择有影响吗？

Y：首先也是父母的意见，要考虑社会中对于职位的需求，我倒是没有特别想要学习的专业，而且分科或专业考试的时候，很多科目是绑定的在一起的，你可能喜欢其中的某科，却又不喜欢其他的科目，最终不得不放弃。男女就业定位对我的选择影响是很大的，比如我可能会考虑教师之类保障好的行业，一些经常加班、压力大的行业就会避开。不同行业间的性别比也相差非常悬殊，比如我们英语专业的班级，女生与男生的比例是 9:1，而一些 IT、物理、技术行业男生比例比较大。

郑：教师是否有对女性的歧视？你感觉在教育过程中是否被传达了性别上的偏见？

Y：根据科目不同有所不同，一些理工科目教师更偏向男生，而一些文科的科目则是多偏向女生，还有选班干部时到了高中之后往往是男生担任管理性的职位，如班长、体委等，而女性担任学习委员、课代表之类的职位。性别上的偏见肯定是存在的，这也受整个社会环境影响。譬如对男生和女生的培养角度就不同，很少有教师会谈谈到男女平等，只有少数教师提到女生要独立。

郑：你如何看待计划生育、堕胎、性权利及生育权的问题？

Y：对计划生育还是支持的，也理解政府的强制措施；堕胎当然也支持，这是个人的自由。婚前性权利是个人的事情，并不反对，但是婚后还是应该忠于婚姻，所以经常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生育权是两个人的事，其他人不应该干涉，当然更应该尊重女性的意见。

郑：是否传统的父权制导致男女出生就不平等？譬如子随父姓，你怎样看待？

Y：的确这样，往往家庭中生了男孩就会很高兴，这种现象很普遍。男孩可以继承家族的事业和财产；像子随父姓这样的习俗我也赞成，因为毕竟父亲的经济地位比较高，占社会的主导地位，如果孩子不随父亲的姓往往会被认为家庭中的男性没有能力。

郑：怎样看待同性恋问题？

Y：我并不认识同性恋的人，认识一个女孩据说是双性恋。那是他们的自由，我并不反对；我自己并不接受，如果我的孩子有同性恋倾向，会尽力劝说他/她。

郑：平时个人的兴趣爱好是什么？是否受社会性别角色定位的限制呢？

Y：爱好有很多，像旅游、唱歌、聚会、逛街、看电影等等；限制也是很明显的，像女性往往选择书画、文艺之类的爱好，男性往往是棋牌、运动之类，还有像酒吧等娱乐场所往往都是以男性为主。其中虽然有先天因素，但父母、教育以及整个社会的影响占有更大的比重。

郑：喜欢逛街、购物或者化妆吗？

Y：即使没有钱也可以去逛街，不需要强制花钱，其实是一种很廉价的娱乐方式。化妆当然是有的，这也是表示对别人的尊重，而且也可以吸引人的注意力，毕竟外表在工作和交际中都是很重要的，尤其是在男友的问题上，这很普遍的。

郑：如何看待广告中女性形象，是否对个人有影响？

Y：当然会模仿完美的人物形象，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买杂志，努力奋斗提高地位。其中男性的形象对择偶也会产生影响，并与现实男友进行对比。对这种影响并不反感，认为学校应该增开这方面的课程，对生活有利。

郑：是否经常上网或阅读书籍、杂志和报纸，主要关注哪些内容？

Y：一般一周会上两三次网，主要是看新闻、搜索一些资料以及朋友联系。访问一些大的门户网站和看综合信息和娱乐信息。不过从来不看人民网和新华网，国外的网站也很少访问。因为学校的书报架有书报杂志，所以经常看报纸，像英文的中国日报、环球、参考、青年参考之类，对英文小说、政治、地理、心理方面的书籍比较感兴趣；偶尔也看时尚杂志，因为杂志比较贵，同学间轮流买一些。

郑：如何看待当今人的感情与性的物质化，比如“包二奶”、“小三”、“性商业化”等现象？

Y：我不赞成这些现象，这对家庭和配偶不负责任。因为个人自由，我不会去干涉别人；但我自己肯定不会找一个很有钱的男人。对女性而言，社会压力更大，她们想要寻求物质的满足和消遣，这是社会环境造成的；但我更支持依靠个人的努力。我自己是不会考虑这样事情的。个人的自尊心无法接受，家庭、社会、舆论也会有很大的压力，当然最主要的是自己不赞成。如果我婚后遇到类似的事情，会去尽力的说服第三者，这对家庭和孩子都有很坏的影响，讨厌这种角色。

郑：求职中或社会上是否遇到过性骚扰或性暴力？

Y：我并没有遇到过，但是听说过这种现象。这是对女性地位和权利的侵害，但如果不是很过分，大多数女性还是会选择忍气吞声。如果很过分的话，要是我肯定会报警，应该把它说出来让公众知道。自己的权利还是只能靠自己去争取。

郑：如何理解那些涉及女性的侮辱性语言攻击？

Y：现实生活中，侮辱性词语就会很常见，我很不喜欢，厌烦经常说脏话的人。如果是男性的话偶尔还可以接受，但是女孩的话，就不是一个称职的女人，因为这些脏话中大多是对女性的轻蔑和侵犯为主。

郑：你认为两性在法律上是平等的吗？或者法律对女性的保护是否足够？男女是否有同等机会参与政治？

Y：我认为不是，至少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而且法律往往只是一种形式，公司经常会不执行法律条例。比

如对于产假缺乏相应的补贴，女性会受很大影响。男女在当前不可能有同等机会参与政治，在社交中舆论对女性的压迫很大，教育、家庭、社会都会对你施加影响。女性只有联合起来向政府施加压力，才能争取自己的地位，当然我认为这目前并不是特别重要。

郑：据你所知女性的权益受到损害时，是否有社会力量支持女性争取自己的权利？是否需要自组女性的团体组织以维护女性权益？是否需要民众的基本权利？

Y：我知道教育界有一部分人维护女性权利，至于妇联没有印象他们做些什么。需要有社会的力量保护，有灵活的各种团体提出女性的主张，仅靠政府指派的部门是不够的，他们往往不了解具体的情况，这些只有群众自己才最清楚。在涉及利益时我们有必要联合起来，维护自己的权力，显示团结的力量，因此支持自由结社和选取代表的权利。

郑：是否关注国际政治或者社会问题？为什么？

Y：我以前并不太关心，但现在不得不关心了，因为你各方面的信息落后就会被人看不起。越是接触环境广的人就越是关注这些也可以增加知识，这在求职上会有很大的帮助，也可以提高个人的素质，得到社会的认可。在其中个人的喜好并不是占主导地位的，而是现实的生活需要，会对个人有帮助。

郑：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对女性有何影响？

Y：我认为马克思主义教育还是有必要的，但学校里教的太不透彻，非常的朦胧，很少联系实际生活。学校现在对这方面的教育也并不重视，实用科目占更大比例。坦白说我对这两个概念并不是很了解，不过印象还比较好。社会主义社会对女性争取权利还是有积极作用，至少现在比过去好很多，这就是一种进步。

后记，

①“国际妇女节”的翻译并不好，更确切的说是“妇女”这个词本身并不好。现在大多数女性不喜欢被称为妇女，一方面是这会显得年纪比较大，更重要的是汉字“妇”本身就代表了一种从属于男性的社会地位，是几千年的封建文化下残留下来的积习。关于“38”节应该有更好的称呼，当然我没有权利改变，所以沿用惯例的名称。

②史前社会中，人类两性分工并非如此，“男主外，女主内”的现象只存在于私有制形成后的父权社会中。为父权制度的存在，几千年来统治阶级一直宣传这一观点。

③因为男性在家庭的经济来源方面是主力，所以就有了这样的资本，而女性所做的家务劳动因为没有经济收入，所以不能被平等的重视。

④女性寻求稳定工作从一方面也说明了社会保障的极度缺失，而男性被视为可以把更多精力投入工作的背后往往是众多女性的家务劳动被无视。

⑤Y同学从小就是一个学习成绩很好的学生，但即使她也不免会厌学；所以“厌学”并非是少数学生不用功的问题，而是现有教育制度本身带来的问题。

平等权利 *Equality and Rights*

“为反对第8项修正案而斗争”

婚姻平等运动的下一步是什么？

社会主义选择组织 —— 工人国际委员会（CWI）美国支部

布兰顿·麦德森（Brandon Madsen）



2008 年 11 月 15 日美国加利福尼亚反第 8 项修正案大游行

去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州议会投票通过了“第 8 项修正案”，仅在加州最高法院允许同性婚姻六个月之后，再次修改州宪法禁止了同性婚姻；这一天对于支持婚姻平等和 LGBT（同性恋-Lesbian & Gay, 双性恋-Bisexual 及变性者-Transition）平权的运动来说是一个挫折。与之相伴的是亚利桑那州、佛罗里达州与阿肯色州也都相继通过了反对同性恋的法律。

然而，“第 8 项修正案”并没有使得婚姻平等运动丧失斗志，反而进一步加强了人们的反抗情绪。十一天之后的 11 月 15 日，全美至少 213 个城市共有超过 13 万人涌上街头，举行了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为支持同性恋权利而进行的游行。这次大型的群众游行使婚姻平等的问题成为报刊杂志的头条新闻，并给美国各地众多 LGBT 平权运动的活动家与支持者们提升信心。

11 月 15 日游行活动主要是通过 JoinTheImpact.com 网站组织的，这是由草根 LGBT 活动家们在“第 8 项修正提案”通过之后数日内建立起来的网站。他们基本上绕过了主流的 LGBT 组织而独立活动，因为主流组织通常采用非常软弱式的方式以劝说个别的政治家，而希望能实现某种“自上而下”的改变，而并不是通过大规模的运动动员群众来实现目标。

这次 LGBT 平权运动在力度与力量方面的大幅度提升反映了他们在一个新时代中日益增长的信心。2004 年当禁止同性恋合法婚姻的法律在美国 11 个州通过的时候，当时并没有发生任何大规模的群众性抗议活动。但随着共和党在大选中的失败与美国历史上第一个黑人总统的当选，都使 LGBT 运动产生了新的信心并对对进步性变化有了更高的期望。

绝不依赖民主党

我们应该利用对“第8项修正提案”的愤怒和由此而引发的群众性的能量来将11月15日开始的大规模游行活动扩大到全国，并在全国范围内动员各地群众维护所有地区的同性婚姻权利。

这场运动应该要求加州最高法院以违反宪法中权利平等的原则为由在3月召开的听证会中推翻“第8项修正提案”。但是我们不能依靠法院或者是政治家们来为我们赢得这次斗争的胜利。与之相反我们必须动员群众将公众的压力施加于法院与政府机构之上，并且明确地向他们表示现实中对于婚姻平等的支持。

我们应该记住，当年最高法院也只是在一个强大的妇女运动与大规模的群众性的游行活动的政治压力之下才通过支持女性堕胎合法的Roe Wade提案的。1992年，最高法院甚至明确表示，它不可能推翻堕胎合法化的提案，因为否则将遭到来自社会公众大规模的反弹。（《华盛顿邮报》1992年7月1日）

这也就是为什么LGBT运动应该采取大规模群众运动的方式而不是依赖于民主党的政治家们带来进步。譬如说，奥巴马虽然支持推翻克林顿执政期间通过的反对同性恋的“捍卫婚姻法案”，但是他却依然反对同性婚姻。而支持“第8项修正提案”的反动人士们恰恰就是利用这一点来为他们的政治游说增加支持率。

这个典型的案例充分揭露了为商业利益服务的政治家们如何以通过牺牲我们的基本人权以增加他们的投票支持率的丑恶嘴脸。这一点也通过奥巴马选择以反对同性恋而著名的加州牧师华里克作为主持自己总统就职典礼仪式的牧师而得到充分说明，华里克是帮助“第8项修正提案”顺利通过的政治运动中一股举足轻重的政治与财政力量。这是一次非常明显地利用右翼福音派基督徒来反对LGBT团体群众的基本人权的政治阴谋。

还有就是民主党的领导人们企图将这场运动从争取婚姻平等权利淡化为“更现实的”要求“公民自由结合”的诉求。然而根据美国统计总署的报告显示，有1138种社会福利项目是基于婚姻关系的，而同性伴侣则无法享有这些福利。只要存在“公民自由结合”状态，对于LGBT群众而言，他们就无法充分享受所有婚姻带来的社会福利，而只能处于“二等公民”的地位，这就如同一个现代版的“平等的隔离”政策尝试。

完全平等是可以实现的

与其将自己“画地为牢”地局限在由统治当局所划定的所谓“现实目标”的圈子里面，我们不如大胆地通过动员数以百万计的群众走上街头去推进整场运动。

近年来我们看到美国社会对于LGBT平权运动的态度上的明显的转变与对同性婚姻越来越多的支持率。譬如说，尽管支持“第8项修正提案”的运动采用了恐吓的策略与官方反对“第8项修正提案”运动显得软弱无能，“第8项修正提案”仅仅以4%的微弱优势得以通过；相比之下，内容与之类似的“第22项休整提案”在2000年是以23%的大优势得以通过。

一些左翼人士认为我们应该着重于推翻整个婚姻制度本身。社会主义者反对政府与资本主义社会迫使人们通过婚姻以获得众多经济福利项目和使他们之间关系合法化而为社会认可。我们认为政府根本就没有权力来决定人际关系间哪些是有法律效力的，哪些是没有法律效力的。但是，只要国家仍然将一些特殊的权利与婚姻关系在法律层面上相联系，那么为实现同性的婚姻权利而进行的政治斗争就依然是非常重要的。

为了赢得同性恋合法婚姻的权利，我们应该指出那些反对同性合法婚姻的人，也往往正是那些破坏妇女、工人与有色人种的公民权利的反动人士。只有通过激进的群众性斗争，将LGBT平权运动与其它为争取平等、民主和更好的工作与生活条件的运动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实现胜利。

11月15日的运动仅仅只是一个开始。在2009年，我们必须团结起来继续为实现正义与平等而进行斗争，直至使所有的人与家庭，不论性别、性取向与婚姻状态，都可以真正成为他们自己生活的主人。

（原文为英文，来自于工人国际委员会(CWI)美国支部的网站 www.socialistalternative.org，本社翻译）



加利福尼亚州议会前抗议的人群

电影评论 Film Review

百万富翁走了，但贫民窟却仍在那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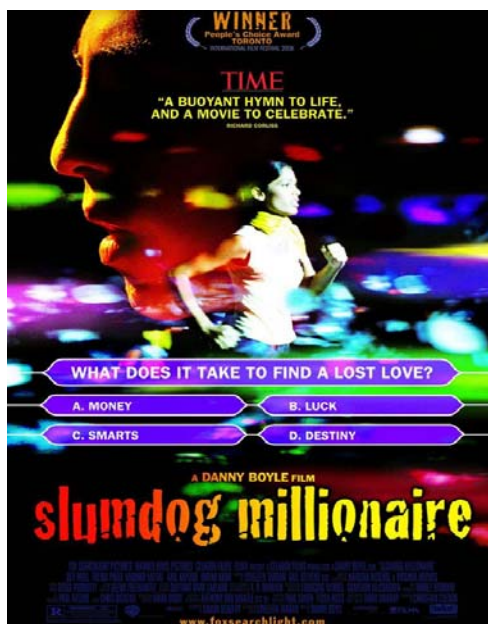
——浅谈电影《贫民窟的百万富翁》

梁闻道

“的确，英国在印度斯坦造成社会革命完全是被极卑鄙的利益驱使的，在谋取这些利益的方式上也很愚钝。但是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如果亚洲的社会状况没有一个根本的革命，人类能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

——卡尔·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

《贫民窟里的百万富翁》：西方梦中之“城市童话”和东方“城市童话”之梦



在导演与摄影师老道的技巧之下，《贫民窟的百万富翁》这部电影中孟买贫民窟如此具有美感，包括它的公共厕所在内；就连粪便在落日余晖中也显得几许“灿烂辉煌”，给人一种“特和谐、特盛世”的感觉。

难怪一方面在孟买放映这部电影时，上座率不过两三成；另一方面英国王储查尔斯王子却要将电影中贫民窟房屋作为伦敦解决住房问题的推荐样式。说白了，这部“城市童话”并非是“秀”给现实中生活在贫民窟中观众看的，而主要是演绎给遥远西方的观众看的。否则这部“城市童话”又怎会一举囊括8个奥斯卡奖和4个金球奖呢？

所以，孟买的上座率到底有多少，本无足轻重；（当然孟买中产阶层观看影片的上座率还是有所关联的，不过这些“西方化的东方人”却与本地的贫民窟没有什么

关联）。也许是因为现实生活“异化”带来的无聊、烦闷与扭曲，人们总不太愿意花时间与金钱观赏自己现实生活的“拷贝”，而更愿意接受那些远离自己的传奇、神话乃至谎言。所以，对于亿万印度民众而言，这部电影是如此消极而无趣，也难怪上座率有限。

距离产生美，“美”是如此不切实际，所以对于“美的本体”而言尤显残酷，因为“美”本就是他们的不幸。

贫民窟里出个把百万富翁本不足为奇。更何况是一个象孟买贫民窟这样，有八百万居民、历史悠久、文化殊异、声名远播，在全世界也是数一数二的贫民窟，出个把百万富翁更不足为奇。不用说孟买贫民窟出一个百万富翁，即使出十个、百个又是如何？但对于八百万孟买的贫民而言，这都显得是如此凤毛麟角，由于这是仅有的偶然，也就是无关宏旨的。假如说非要相信贫民窟孩子奋斗成功的故事，那我宁可相信主人公哥哥通过替黑帮老大收保护费、开赌场和贩毒而终于“奋斗”成为一名“新时代的成功先富人士”，这样的故事更符合逻辑，也更具有合理性与现实依据。

虽然电影标榜着“真实与合理”的逻辑，而显然更为狡诈与阴险。将本已浑浑噩噩、血腥粗俗、没有希望的生活重新“扭曲”成一出“明亮而温暖的‘城市童话’”，但显然这个“童话”其实与当地住民没有什么关系。

所以，眼光锐利的孟买民众对此“贩卖技巧”不屑一顾，估计他们甚至认为这远不如本土出产的那些“夸张庸俗、歌舞升平，金碧辉煌”又冗长到让人瞌睡的“宝莱坞”电影。因为当他们步行几小时，坐进简陋的电影院又花上几个小时观赏精致到虚假的电影时，至少是一目了然地看透其中“真实的不真实”，也明白无非是在痛苦而又难耐的人生中多做一个小小的美梦而已。

但《贫民窟里的百万富翁》编造的“温暖的城市童话”总是需要有“买单者”。更何况为了炫耀“所谓的真实”，“聪明的资本”还大量采用当地的实景和挑选土生土长的本色演员，譬如扮演主角儿童时代的男女小演员就是真实来自贫民窟的孩子。当这些“本色演出”的孩子们远赴美国参加完富丽堂皇的奥斯卡颁奖典礼之后，又回到自己在贫民窟里四壁皆空的家中，又一个“美丽肥皂泡的破灭”，又一个现实中犀利的对比。

电影完全是用一个异域的背景讲述着典型“好莱坞式的美国梦”，印度莫名其妙的听天由命和达观消极的文化外衣之下包裹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功利主义和消费主义的逻辑内核。贯穿全剧始终的线索是主人公回答印度化的“Who Wants To Be A Millionaire”（谁想成为一个百万富翁）电视抢答节目。

与其说这一线索看似巧妙而用心地将主人公人生历程的片段一一贯穿起来，不如说它利用巧合接着运气，运气接着巧合匪夷所思地将全球化下的“印度美国梦”搭建出来。贫民窟的肮脏、民族冲突的血腥、底层民众的愚昧，一切都成为炫耀悲惨的“卖点”。

主人公兄弟冒充泰姬陵的导游，骗得一对美国夫妇的游览车被拆得只剩个外壳还用砖给架着；本地司机将主人公要一顿痛打之时，那对夫妇站出来围护时不忘说道：“我们是美国人，美国人”。恐怕没有一个场景比这更具有讽刺性。当美国的军队横扫亚洲相邻的最贫穷（阿富汗与巴基斯坦边境地带）和最富有地区（科威特和沙特的中东产油国）的时候，也高竖着“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的旗帜，然后也不忘得意满地加上一句“We are Americans。（我们是美国人）”。

几分钟前，还是沉浸在印度具有千年历史的歌舞妓与盲人乞讨文化之中，几分钟后就是主人公在现代化外包服务公司（Outsourcing Service），通过互联网为大洋彼岸的美国消费者提供“邻里服务（Neighbourhood Service）”。一边是窝居数百万人的贫民窟正在疯狂扩大，一边是黑帮老大用犯罪收入所获得的别墅、跑车和漂亮而年轻的情妇。“美国梦”不变地建立在“数千年剥削与奴役所带来的血与肮脏”之上。

《三个火枪手》中第三个火枪手叫什么名字？多么莫名其妙而又全球化的问题。如主人公般，东方生吞活剥不甚了了地吸收了“西方精华”，全力地摹仿却又一知半解。生活在贫民窟中的居民通过信号不清的电视与生活在千里之外富足安康的同胞观看着同一个电视节目。虽然这个问题的答案与他们的日常生活本无干系，但如此无关紧要的要素却成为了作为一个“现代人必不可少的常识”。20 世纪的“媒体之神”，——电视，终于宗教化地完成“普天拜物膜拜”的“丰功伟绩”。

始于片头而呼应于片尾的“It's written”，仿佛将“Who Wants To Be A Millionaire”线索完美地贯穿始终。但我总觉得其本意恐怕与主流媒体所翻译的“命中

注定”截然不同，因为整部电影并非是什么《圣经约书》，所以这里的“It's written"自也应该就是它的本义——写就的。说白了，整个故事——就是“编的”。

西方的，东方的；昨天的，今天的，现实的，幻像的，世界就是如此错乱。归根结底，《贫民窟里的百万富翁》是一部典型的“好莱坞”电影，是一出给西方人看的“城市童话”，尤其是给千千万万处于经济危机袭击之下胆战心惊的“西方或者西方化的资产阶级市民”看的电影。

又是据说，在上一个世界性大萧条期间，也就是 1930 年代，美国百业凋零但唯独电影业却大行其道，一直保持繁荣昌盛。人们考究其原由就是在于：处于经济危机之下的普通民众焦虑、绝望、冲动、疯狂，而作为“银幕童话”的电影恰好如“富寿膏”一般能安抚人群的失落，惰化人民的愤怒，消弥反抗者的斗志。

尽管地下室仍然冰冷异常，明天的伙食尚无着落，未来的希望暗昧不明，但银幕中“美好的幻像”却使人们暂时忘却一切不愉快。《贫民窟里百万富翁》在今天又一次起到了类似的作用，当然毕竟“与时俱进的”手法显得更为巧妙——悲惨是用来炫耀的，同情是用来销售的，人性温暖是克隆的，奋斗成功是虚假的。

故事的结局皆大欢喜——罪人遭到惩罚，犯错者自食其果，好人修成正果，穷书生一夜富贵，有情人终成眷属，然后在结尾处加上一段貌似异域风情，其实充满流行文化的印度青春歌舞，这也绝非是对于“宝莱坞”的简单摹仿，而是进行了恰到好处地“改头换面”；几乎所有“城市童话”的经典结局在这里都得到体现了。

作为“大煞风景”者，我还是要提出那个被问烂了问题呢？“公主与王子终于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之后呢？”

回到现实世界中，据说扮演主人公的小演员回家后，因为不从父训被打了，引来印度媒体的殷切关注，但不知道在这位“小演员”出名之前，可曾有几如此这般关切这位贫民窟儿童的人权？孟买市政府还决定要免费给小演员们的家庭各提供一套“现代化的公寓，在这座平均房价约 5000 美元一平方米的都市中，一套免费“现代化”的公寓恐是绝对的“德政”。但孟买全市贫民窟里有超过 800 万居民，全印度有 4 亿人每天生活费用不足 1.25 美元，7、8 亿人没有干净的饮水和电力、超过 4 亿印度人是文盲，不知道印度政府和孟买政府能为他们提供些什么？

是的，也许…“贫民窟里的百万富翁”可以离开，但贫民窟却还在那里！只要社会没有改变，那么它将永远地存在那里……

我们的立场

工人国际委员会（CWI）和中国劳工论坛（chinaworker.info）主张国际民主社会主义。我们反对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对公共资源的掠夺和因此产生的不平等。同时也反对过去中国和俄罗斯所谓的“社会主义”，实质上一党专制的官僚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只能来自于广大的基层群众之中，是真正由劳动者对社会经济进行民主控制与管理。从以上基本原则出发，我们提出如下主张：

- ✎ 结束一党专制！实现全面民主社会，全国普选无经济特权的全民代表。
- ✎ 支持独立的、民主的和战斗的工会。捍卫工人自组、罢工和抗议的权利。
- ✎ 支持自由结社！支持建立独立的全新工人政党为实现民主社会主义而斗争。
- ✎ 反对血汗工厂！支持工会斗争：确保 8 小时工作制，确保工人收入，确保由工人管理生产安全与劳动健康。
- ✎ 全面实现免费医疗、免费教育和其他社会保障；重建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全国普遍性的退休保障体系：人人都有养老金！
- ✎ 反对‘豆腐渣’工程！支持建立紧急的全民普惠的廉租房和公共服务项目。没收黑心地产商聚敛的私人财富—由工人民主控制和管理建筑行业。
- ✎ 实现男女平等和城乡平等。废止户籍制度。废止强迫性的计划生育政策。
- ✎ 反对种族主义和民族沙文主义。支持宗教信仰与文化自由。反对建立在性别，残疾，性取向，年龄等基础上的一切形式的歧视现象。
- ✎ 在国有土地的基础上，建立民主的农村自治委员会；由农民自己决定当地的土地分配。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重建农业集体化生产；国家承担农村基本设施的建设并向农民提供免息和低息贷款。
- ✎ 国有化所有主要工业、银行和金融机构，由工人进行民主控制与管理。彻底改变经济政策，实现以满足社会需求为目标的可持续地生态生产。
- ✎ 建立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和民主的社会主义生产计划。由来自于各地区的工厂委员会、农村自治委员会和消费者团体的民选代表共同制定满足人民生活需求的生产计划。
- ✎ 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国际工人的团结。为实现真正的国际民主社会主义而奋斗！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社会主义者》杂志社—中国劳工论坛

www.chinaworker.info

Email: shehuizhuyizhe@gmail.com

香港深水埗大南街

大陆售价：RMB 10.00 香港售价：HK\$ 25.00

